滕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滕縣文史資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滕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滕县文史

董一博同志为本辑题词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北京

目　录

落木萧萧思先君……孔祥瑛（1）
爱国将领孙兰峰先生……白　震（48）
王铭章师长的简历……（77）
王铭章师长牺牲的前后……李少昆（77）

何一萍同志事略……董一博（84）
跟随陈毅军长转战山东……宋晓亭（88）
滕县抗日三老人……周乐亭（94）
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史略……党史办（99）

简述高熙喆的两片奏折……詹剑石（109）
生氏兄弟修志记……李广星（121）

柳琴戏在滕县的发展……宋琦　董广元（126）
滕县汉画像石……刘继忠（142）
滕县华北弘道院……龙厚昙（155）

古薛史琐议……张知寒（174）
有关“临城劫车案”报刊资料辑要……耿献桂（187）

落木萧萧思先君

·孔祥瑛·



孔繁霨先生遗像

家父讳繁霨字云生，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光绪十一年乙酉七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滕县东龙岗村贫苦家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歿于山西省平遥县，终年八十四岁。今年正值诞生百年祭辰。天寒岁暮，落木萧萧，缅怀音容，哀思曷已。

家父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历次运动，生平事迹非仅是个人际遇，也是我国近代史长河中之一粟。爰书此文以应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非仅寄陟岵之思也。

一九八五年秋于北京。

一、苦难童年·少年自励·从军救国

我父亲出生的时代，正如中山先生所说，是“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时代。十九世纪末页，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订立多种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者踢开了昏聩清廷闭关自守的大门，用强权划分势力范围，以图瓜分中国。我国人民生活在黑暗、贫穷、苛捐、外债，重重灾难之中。父亲出生在东龙岗村的贫苦农家。沉重的剥削、微薄的收成、顽固的封建陋习（出嫁姑娘要极丰厚的妆奁，家里接连陪嫁了两代的姑奶奶），使一家数口终年不得温饱，常时炊尽粮绝，只能煮芋头秧子汤喝。记得父亲曾对我们说，芋头叶子、秧子上有细细的毛刺，喝到肚里“抓闹”得难受，那汤实在难以下咽。我的祖母脾气倔强，虽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谆谆教导父亲说：“冻死迎风站，饿死打嗝嗬！”表现出山东劳动妇女勤苦耐劳坚强的性格。

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满清政府大举外债，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在一八九五——一八九九年间，更加上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遍及全国，其中山东受灾面积最大；一八九九年黄河决口，山东淹死十六万人。龙岗受到蝗灾，记得父亲说过，蝗虫（即蚂蚱）飞来象漫天乌云，落到地里一片沙沙声，把庄稼吃得精光，老乡们只有哭天抢地，毫无办法。正在这灾荒

年月，祖父病逝。原已无衣无食，埋葬了祖父，更是债台高筑。对父亲来说，童年并没有欢愉，人生旅途的开始就这般艰辛。祖母决心让父亲外出谋生，对父亲说："走吧，到外边找个活路。"祖母整治了一些粗茶淡饭，请来了四邻八舍的乡亲们。父亲感谢大家的帮助，说："父债子还，只要我孔繁霖在，今天受到叔叔大爷们的恩典，将来一定报还。"当时秦忠鑫老大爷带头把借据烧了，说："大兄弟，这点儿债就算了，你尽管放心出门，只要俺家有"糊涂"（是老家的一种饮食，类似稀粥，多是用高粱等面煮的）喝，就不能饿着老嫂子（指我祖母）。"我父亲双膝下跪，对乡亲们一一磕头。隔了几日，父亲和祖母抱头痛哭，辞别了生长养育的故乡，家里留下一个病弱的弟弟和两个陪嫁出去而遇人不淑又回住娘家的姐姐。一九三四年寒假，父亲对我说起这段往事还禁不住涕泪纵横，既感恩于乡亲们淳厚的爱护之情，又感伤于当年生活的辛酸。

山东人走投无路就离乡背井闯关东，父亲没有到关东，却到了山西大同，投奔一位作镇台的族叔。一个乡下穷孩子找到大官衙门，遭受种种冷遇和奚落，自不必说了。大同在雁门关外，风劲地寒，十冬腊月衣破衾单，冻得夜不成眠，以致于落下终身不治的寒腿病。父亲记得祖母的教诲，人穷志不能短，活就要活得硬气，强忍着百般屈辱，但要谋自立之路。在衙门里看到族兄弟少爷们入塾读书，很是羡慕，决心自学，刻苦勤奋，努力摄取知识。东龙岗是穷乡僻壤，生活贫困，耳目闭塞；大同是当时晋北

重镇，父亲在那里才知道了什么甲午之战、戊戌变法等等，又由耳闻目睹，逐渐认识到满清政府的昏庸、民穷国弱、列强宰割的现实。可以说，投奔到大同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

父亲激于单纯的爱国心，以为弱国图强要有武备，以军救国，自己要从军。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山西筹设武备学堂，为培养下级军官，父亲考取入学，时年十七岁。一九〇四年毕业，清政府决定选派大批青年学生留日，分配给山西五十人的考选名额，其中武备学堂有二十名，父亲考选录取，得到山西的公费，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受中、高级军事培育。一九〇四年七月，由武备学堂职员吴春康带领赴日，同去的有温寿泉、闫锡山、马开崧、乔煦、黄国梁、井介福、荣炳、张呈祥、荣福桐、李大魁、张瑜、焦纯礼、金善宝、金凤巢等。

因此，父亲祖籍山东，却和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
光复太原·燕晋联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页，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各地建立新式学堂，兴起留学运动，特别是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富强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日本，形成了留学日本的高潮。据统计在一九〇六年左右，中国的留日学生达八千人之多。父亲到日本去正是这个时期。

在民族危机深重，反动的满清政府彻底卖国投降的情况下，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爱国团体，出版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在宣传民主思想最有力的有陈天华、章炳麟、邹容等人。我父亲当时受他们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满、爱国救民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七月下旬，由中山先生提议召开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的联合会，讨论成立“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问题。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总章和宣言，推选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等人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同盟会的成立，把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以领导革命斗争，这是符合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除甘肃省无人外，内地十七省都有代表参加。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父亲加入同盟会，由张继主盟①，是早期的盟员，属于山西分会。自同盟会成立到一九〇七年前后，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很激烈，父亲坚决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革命、民主、平均地权、反对保皇，反对“开明专制”和封建土地制。这一时期，父亲积极追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一批毕业生，由清廷陆军部召回国，在北京举行考试后，父亲和温寿泉、闫锡山、马开崧、黄国梁等人都被派回山西为新军骨干。当时

山西的旧军制已改编为新军，革命人士在新军中的实力日渐增强。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大受鼓舞。陕西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一日）在西安起义，光复了陕西全省。山西的形势紧迫，一方面是清廷抚台陆钟琦严加防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积极部署。十月末，我父亲和温寿泉、黄国梁、闫锡山、赵戴文、南桂馨、乔煦等人连日密商（当时黄国梁是清军八十五标标统，军队分驻新南门外狄村、岗山村一带。闫锡山是八十六标标统，他早已和太原的的清廷大衙门和立宪派咨议局头子梁善济等人有拉拢，当时心怀观望）。十月二十九日（农历九月初八）清晨，黄部姚以价（音介jiè）率军发难，起义军由新南门冲入城内（辛亥革命后新南门即命名为首义门），占领子弹库、军装库、藩库，攻入抚台衙门，击毙陆抚台，太原城守尉增禧（满人）树起白旗缴械投降，顺利地推翻满清政权，太原光复成功。参加起义的各主要人员，当天在省咨议局集合开会，决定成立山西军政府，由闫的帮伙控制会场，闫锡山攫取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黄国梁为参谋部部长，父亲是参谋部副部长。翌年成立督军府，父亲改任参谋司司长，掌管军队教育与作战计划事宜。

光复战役中，一部分军官带头抢了藩库的存银，各处兵士趁机抢掠，闹市富商区的羊市街、柳巷、帽儿巷、估衣街等地被抢劫杀烧，火光烛天，全城大乱。父亲参加巡逻弹压，他对这种

骇人的景象很是困惑。几经弹压，秩序稍定，但藩库既被抢劫，军费无着，暂发军用券以维持，而军用券不能兑现，军心不稳。当时太谷县、祁县有几家著名开银号的大财东，父亲被派到太谷另有人被派到祁县去借饷，共借到白银数十万两，收兑军用券，军心大定。父亲认为应言而有信，既是借就应还，以后送还时，大财东们说革命是义举，他们愿捐饷赞助，不肯收纳，这笔钱财闫锡山就用作大汉银行的资本了。父亲在太谷老财主家第一次见到用贵重的田黄石（价同黄金）当砖头块垫床腿，也不免引起震惊，他实在意想不到剥削生活竟能奢侈到这般地步。

山西继武昌、西安之后起义，清廷因近在肘腋大为惊恐，极思镇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急调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一八九九年肄业于东京日本士官学校与黄兴共同创立兴华会，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者之一。当时他是北洋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六镇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基础上扩建的，吴禄贞以延吉筹边有功膺此重任②，但小站之徒阴谋掣肘。十一月四日吴禄贞到石家庄，密派参谋何燧到娘子关，与山西起义军司令官姚以价联系。十一月五日与闫锡山在娘子关正太车站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决定组织“燕晋联军”，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闫锡山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共同出兵回师北京。欢谈至晚各回防地。当晚午夜，吴禄贞不幸被自己的卫队长马惠田击杀于办公室（时年三十

二岁）。马蕙田受袁世凯收买，并将吴的头颅割去向袁世凯请功。

我父亲由太原到娘子关参加了这次会见。当时闫锡山满腹狐疑，到正太车站之前先对驻军做了埋伏和安排，而吴禄贞不带一兵一卒坦然前来，对闫说："我是来同你一起革命的，不是来作巡抚的。"吴侃侃而谈，分析形势说："袁世凯是有阴谋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毒瘤，此贼不除后患无穷。我们和滦州张绍曾、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要先一步赶到北京，袁世凯的计划就完全破产。"吴禄贞比我父亲长五岁，父亲对他的坦荡气度、卓越才识很是敬佩，对他的被害深为哀悼。一九一二年三月四日临时大总统孙文签发"奖恤吴禄贞等令"，吴之死使燕晋联军未及成立而失败，实是很大损失。

袁世凯于十一月十三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即由湖北回京，操纵满清政府，竭力镇压革命。清兵进攻山西，破娘子关迫太原。闫锡山要放弃太原，赵戴文赞同；温寿泉反对，力主闫不要离开太原，以免动摇军心，我父亲赞同。结果闫锡山带着赵戴文于十二月十二日化装北逃，后来栖身于包头。温寿泉和我父亲坐镇太原，以后温寿泉也带了一些人到晋南活动，我父亲留驻太原，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斡旋应付，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闫锡山才从忻州返回太原。

三、和闫锡山的龃龉

在日本时闫锡山伪装进步并不暴露他的本性，使人很难了解他。父亲只觉得对比之下，温寿泉为人宽厚诚恳，有见识，有学业专长，值得敬重，因而和他缔金兰之交，结为换帖弟兄。

回到山西，在太原光复的前后，闫锡山逐渐显露出他耍两面派的手腕，一面以革命派自居聚集同盟会的势力，一面又与山西立宪派梁善济、清廷官僚姚锡光、谷如墉等勾结。及到娘子关与吴禄贞晤谈，相形之下，吴禄贞坦然磊落，而闫锡山狡诈叵测，父亲逐渐对他有了看法。燕晋联军失败，娘子关吃紧，父亲认为要顾全革命大局，固守起义据点，不应离弃，而闫锡山却化了装骑着小毛驴急匆匆地跑了。这是父亲和闫锡山最初的意见分歧。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太原，十九日参加群众欢迎大会，二十日在参谋司举行山西军界欢迎会，当时父亲是参谋司司长，主持接待。中山先生视察了山西的铁路、矿藏等；观察了闫锡山的人品后评论说："吾行南北，见起义将领无如闫之庸鄙者，非特庸鄙也，其人实谲祟，曷足以语革命！"足见中山先生识人之睿智。

闫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投靠袁世凯，并将自己的父亲作为人质长住北京，以示忠心。一九一三年袁就任正式大总统后积极筹划当皇帝。父亲劝诫闫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

现在你又拥戴袁世凯当皇帝，革命不是白革了么？不能做这种违反历史潮流违反革命的事。”闫锡山不听，反而和北洋军阀一起通电辱骂黄兴、胡汉民等。“洪宪”短命，闫又投靠段祺瑞。

一九一七年，山西军队扩编为四个旅，父亲是第三混成旅少将旅长，其它三人是商震、马开崧和赵戴文。这年七月张勋带领“辫子兵”到北京准备复辟，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南方各省纷纷声讨，父亲力主响应，被任命为讨伐张勋的指挥官，带领军队由太原经石家庄进驻长辛店，先头部队到达宣武门外。七月十二日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复辟丑剧结束，父亲率兵返回太原。

张勋复辟失败，北京政权完全由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祺瑞掌握。段祺瑞不恢复国会而且废弃“临时约法”③。中山先生号召护法，反对段的伪共和，西南的唐继尧等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起兵反段，称为“护法运动”。段祺瑞电令闫锡山出兵。父亲极力劝阻说，中山先生是同盟会领袖，领导了辛亥革命，所签署的“临时约法”是为了给人民以民主。现在却要依附于段祺瑞通缉中山先生、“征讨”护法运动，实在是背叛了革命；不可积极参予，应予拖延缓冲。闫锡山不听，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带领军队并带炮兵营周玳到湖南参加“征讨护法运动”，结果在湘潭全军覆没被缴了械。

一九三一年山西省银行钞票剧烈贬值，由于闫锡山搜刮民财扩充军备，大量印发钞票不能兑现。当时父亲和一些人士极力建议早日定价回收省钞，免得老百姓受坑害太苦。闫锡山却别有打

算，不予采纳，直到票子跌到最低价值时，他另发新票，以一比二十收兑旧票，使许多商号和家庭顷刻破产。人们拥挤在山西省银行门前，哭喊叫骂，有焚烧旧票子的，有自杀的，人民无限愤慨。

一九三二年，闫锡山计划修筑同蒲铁路，北起大同南抵风陵渡，全长约八百五十余公里。为了保卫土皇帝的宝座和实力，闫要把铁路修成窄轨。父亲主张应修成标准轨，有利于开发山西的物资和加强国内运输线的联系，这正触犯了闫锡山不可告人的心病。所以闫锡山把同蒲路的修筑计划、工程指导等都由他自己的绥靖公署直接掌握，而为了箝制父亲的发言权，却封给一个“同蒲路筑路督办”的空头衔，用他的外甥张某为襄办领着实权。后来，张某以枕木贪污案发，有些朋友为父亲担心，劝他到外地避避风，父亲自知清白，心中坦然不为所动；筑路工程中有许多人和这贪污案有牵连，父亲丝毫无染。

由于多次的意见分歧，必然是龃龉隔阂，貌不合而神也离。依父亲直言不讳的脾气，又不会曲意奉承，闫锡山和他的帮伙自然心中不满，但是因为父亲是太原光复的主要军事人员之一，更因为父亲为人耿介，清廉自持，抓不到什么把柄，无可借口，不便惩处，局面维持下来；但是父亲的处境显然是相当困难了。

四、寄人篱下

闫锡山帮伙是极端排外的，而父亲却是以外省人寄居山西。

当年太原光复起义的主力是新军八十五标，标统为黄国梁，起义成功在省咨议局聚议时，有部分同志推选黄国梁作都督，闫帮伙立刻反对说："黄国梁是外省人（陕西），不行！"他们不仅毫不掩饰地排外，而且铲除异已极端阴狠凶残，不择手段，对山西各地起义的志士横加逼迫残害。比如，夺取首义门的八十五标二营营长姚以价，被迫远走他乡；大同起义的革命同志被迫害只留下一个宋世杰为骑兵营长，最后闫锡山还是假手他的镇北镇守使张汉杰把宋残杀在小校场。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山先生到太原，一再发表演说，极力号召团结奋斗，不谋私利，建设国家。并且明确提出山西应当注意实业，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可考虑仿行西法，利用外国资本等。这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给人以鼓舞。父亲满怀热情和理想，认为既然革命成功，就可以根据中山先生的倡导，致力建设。山西得天独厚，有极丰富的矿产资源，又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可逐步实现"三民主义"。但是，在闫锡山把山西做为自己搜刮统治的地盘的威慑下，父亲的"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梦幻。

一九二四年九月直（吴佩孚）奉（张作霖）开战，闫锡山先

表中立，从旁观望，到十一月间，伺机以图得渔人之利，立刻出兵。父亲被派为总指挥，带四个旅约七千人开赴石家庄。接着闫锡山又改派他的镇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左翼军总司令名义到石家庄指挥。张声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借军法将父亲手下的两个旅长刘树藩、龚凤山砍头，并悬首营门示众，杀气腾腾，使我父亲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不测或致丧命刀下；使父亲当时深切感到外乡人寄人篱下的绝境。

父亲是职业军人，他历任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和军长。在日本士官学校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军人就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因此他只能服从、接受任务，而不得不斡旋于你争我夺的军阀之间。但是他本着爱护人民的赤子之情，愿在出生入死中尽自己的一分力。

一九二七年六月，闫锡山悬挂青天白日旗后，虚于应付送走了张作霖派来谈联合的代表，九月即部署军队袭击奉军。当时张作霖是“安国大元帅”驻军北京。在京汉、京绥两线上出击的各路大军都相继失利：商震占领宣化又退回大同；中路警卫团出龙泉关到达唐县损失惨重撤回山西；原拟在保定北京之间截断铁路而直取北京的傅作义，于十月中占领涿州，因联络中断苦守三月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中为奉军改编。闫锡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蒋介石联合作战的，即所谓国民党革命军北伐。一九二八年三月，“总司令”蒋介石指令各集团军（蒋、冯玉祥、闫、李宗仁）共同“讨奉”，令闫军沿京绥、京汉以西地区前进，各集团军会师京

津。闫锡山和蒋介石都想利用我父亲和张汉卿(学良)的交谊，说动张作霖撤出北京。蒋介石接连发来几封急电。父亲再三思量，从个人来说，此事成败难卜，如若不成功，可能身首异处；从大局和人民来说，如若功成，可化干戈为玉帛，使北京古都免毁于战火，保护北京上百万人民保全身家性命，自己虽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五月底，父亲先到南京再到上海，化名马先生乘船北上，随行副官王镇典一人。行踪虽慎密，但到天津一下船，奉军已派人等候迎接。抵京后住鲍家街鲍宅④，即和张氏父子昼夜磋谈。最后，张作霖接受了我父亲的劝说，六月四日彻夜鸡犬不惊，奉军全部撤走，张作霖也于清晨乘京奉线火车出山海关。北京人民一夜安眠，天明开门上街，大兵们都不见了，实出意外，无不额首相庆，免却了一场毁灭性的兵灾。当然奉军的撤退也有其历史条件，但对我父亲来说，他认为冒着万分危险，出入于刀枪斧钺之下，能保护了北京和人民，是个人生平为人民做的第一大好事，确实从心底感到欣慰。

奉军既退，各路大军争夺京津，闫军急行挺进于六月八日进占北京。这时闫锡山的势力已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及京、津两市，要和蒋介石平分秋色了。“北伐胜利”，蒋、闫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总之，我父亲既没有“政客”的野心，更没有“政客”覆手云雨的伎俩，而被驱遣利用奔走于军阀们混战的角鹿场，这实是有违初衷的。他回想当年满腔热血追随中山先生闹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革命到目前也并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皇帝换

成了军阀；新军阀又代替了旧军阀；更没有什么“民生”，老百姓依然沉沦于不可聊生的深渊！回想当年一同抛头颅起义的同志们，而今已大多消慵，沉缅于捞钱盖公馆、捧戏子、吃喝嫖赌、强占良田营造花园别墅。岁月流逝仅不过十几年啊。回想当年自己风华正茂，也有一番“大梦谁先觉”的抱负，而今寄人篱下，爱国之心未得抒发，为国为民无所奉献，实有愧于初衷！

父亲既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更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思想，必然不理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必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分析现实、展望未来。他只见到在中国大地上由于腐败的政治、纷争的战火所掀腾的浊浪和无尽的黑暗与灾难，看不到前途，而倘佯于我国历史车轮颠簸前进的坎坷旅途，困惑于那复杂、纷扰、重重矛盾之中。

这是个人的苦闷？时代的症结？历史发展的必然？

五、矢志办学

由于幼年失学，虽然刻苦自励以及东渡留学，但父亲总觉得自己对祖国的文化没有丰实的系统的学习，深以为憾。少年时请别人画扇面说“牧马桃林”，后来知道说错了（应是归马华山、放牛桃林”）⑤，徒惹故作风雅之讥，终身引以为耻。所以生活稍得安定就买书读书，平生也最爱书，凡商务、中华以及各书局出版的国学历史舆地等著作，必定预约购置，以后又收集善本、碑帖

以及宋元以来画卷册页扇面，七·七事变我们弃家南逃，悉遭日寇焚掠一空。父亲对学者是很敬重的，曾邀请我县颜兰亭先生到太原讲学并奉赠《皇清经解》等；对山西大学的名教授郭象升（字可稼，文章家），李亮工（文字学家，曾从章太炎先生学“小学”），执礼恭谨。三十年代初卸职家居，和名士柯璜、湖南学者周震麟、书画家北京傅心畬及四川张善孖、张大千昆仲，过从密切，谈文史论书画，酬酢聚叙以为乐事。

在家庭教育方面，对儿子女儿平等对待，一样受教育，同时管教严肃，我家不随听戏、宴饮、打牌、串门时尚，我们在寒暑假中也另安排功课，父亲日日检查，背诵、书写不用心必受责罚。我们的学习条件百倍于父亲少年时代，自应珍惜努力。

父亲感受最深的是在日本，他看到明治维新以后，不仅武备强悍，生产发达，且对教育事业也有很多建树。明治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重大政策之一是“文明开化”，广义地说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狭义地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和普及。当时办教育以小学为基础，进而普及国民教育，以期作到“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明确实施近代教育的目的是：“国之所以富强安康，无不缘于世间文明人才艺之巨大发展，而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在二十世纪十年代末，日本小学教育日益普及，就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强，同时改进充实中高等教育，振兴实业教育，造就科技骨干

力量。父亲认识到教育是建设国家的基础。对比自己的家乡——贫穷、愚昧、无知，他感到痛心。

父亲决心办学，要让乡亲们的子弟有机会念书学文化，不要再象自己的幼年。父亲说："过去的学校都是为有钱的人办的，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我主张把学校办到农村去，让乡亲的孩子端着糊涂，拿着煎饼来上学。"直到一九二六年前后，父亲才有能力办学，创办了"龙岗小学"（当时滕县级索区还根本没有学校）。开始时只有两个班，到一九二九年添建两排校舍，增至四个班。来就读的学童除龙岗本村的，远及级索、西湖边的村镇，学生最多时有二百余名。学校经费每月约需三百元，除县上小额补助外，全由父亲独力负担。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王乾四，翌年由孔繁达继任。教师有刁可诚（字墨泉）、陈慕唐各位先生。父亲认为学校要办好，要有好教师，要为教师提高教学创造条件。学生要学习，教师更要学习，图书设备很重要。所以，父亲为小学购买了《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纲鉴》、《康熙字典》以及各种图书、教学挂图、历代法帖拓片等。务使教师备课有参考，学习有资料，学生课外有读物。为聘请优秀教师，购买教学设备，不惜代价。以后学校发展，校舍扩充到三十余间，除教室以外，有办公室、宿舍、餐室、图书室、游艺室等。鼎盛时期，四方学生前来就读，有四百余人。毕业的学生有王德溥、孔繁迈、陈培美（字仲甫）、陈正人（字静波）、李玉[illegible]等。抗战期间滕县沦陷龙岗小学停办。据闻现在已于原校址恢

复扩建为级索镇东龙岗小学，有学生六、七百人，教师三十余位。

一九四七年春，父亲又筹建“繁霨中学”，在济南成立校董会，由颜德馨、孔冠英、孔繁迈负责，颜为驻校常务董事。同年九月间招生开学。中学建在滕县城里原当典街当铺旧址，有房舍十六间，是利用旧房修葺的，操场借用文庙前的广场。中学班两班学生１１０人，三年毕业。补习班两班学生八十余人，修业年限暂定一年。学生入学交五十斤面粉作为一学期的学费，贫困者可以减免，考试名列前三名者免交学费。教师工资每月四百斤粮食。父亲将全部田产约二百亩捐献，田亩收入作为中学基金，其他不足经费仍由父亲负担。父亲曾到学校与师生见面，他鼓励青年们要肩负国家的重任；他要求教师要为国育才。他讲求实干，反对虚伪，提倡“把学生培养成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不要成为穿大褂子的伪君子”；他崇尚俭朴，反对奢华，说：“教育学生要穿粗布衣，不要讲穿戴”。他梗直不阿，要求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一九四八年六月，滕县将届解放，国民党当局组织学校南迁，滕县的学校相继迁到徐州，被南京教育部收容，一起开到南京，改编为“岱南中学”了，以后未能复校。

除办学之外，父亲对一些上进好学的青年也特别爱护提携。从我记事起到抗战前夕，在太原家中经年不断有老家来的乡亲们和求学的年青人，我记得的有和福村杨旭庭、仓沟村狄国杰、龙岗李香畦、孔繁达、满思廉、王晁、秦仲养等诸位。父亲资助安排

他们进入太原的平民中学、进山中学和太原国立师范等校学习。仲养哥是忠鑫老大爷的二儿子，身体不好，父亲接待他长时间在我家住着治疗养病，并接忠鑫老大爷到太原游玩。父亲常对我们说：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对于秦家的恩典，对于故乡深厚的情谊，父亲总觉得难以报答，矢志办学，希望家乡困苦的少年们能学习文化受教育，成人成才，也只是表达他的心意于万一吧。我家赁居刘房东（太原的大房产主之一）的房子在北仓巷住了三十余年，巷口有一所私立尚志女校，每年都定时捐送款额。不仅自己办学，对山西地方上的学校和其它公益事业，父亲从来都是乐于赞助的。

六、美好的愿望—建设桑梓·改革河东盐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闫锡山进占北京后，蒋介石为了笼络闫锡山，对他所推荐到南京政府去的人都给以重要地位，如赵戴文提升为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朱绶光代理军政部长等。我父亲拒绝了“市长”、“省长”等高官，愿回到山东为桑梓服务，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同一时期调到山东的有陈名豫（字雪南，曾参加广州起义，滕县七里沟人）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后又任工商厅长；李庆施（字子善，曾参加巴黎和约拒签斗争等，滕县西南张汪镇五所楼人）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三人都是滕县人，乡闾一时称为盛事。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陈调元，他北

伐中在安徽投降了蒋介石，想得到河北省的地盘作省主席，闫锡山不同意；陈调元又想当热河省主席也未得到，蒋介石安排他到山东去。

一九二九年年初，父亲到济南接任建设厅长，很是高兴，因自祖父去世，穷困无着投奔大同而寄居山西依人篱下，算来已近三十年了。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国家政治纷扰，军阀混战，经历了多少风云；自已也已从无知少年成长为在人生道路上的跋涉者。但自已眷念家乡的深情从未减退，能调回山东为乡亲父老们做一些事，实在太庆幸了。父亲到济南接任时，只带了一位副官王镇典，再没有任何私人和衙门班底。父亲考虑到要进行建设工作就需要有真才实学、有见识、有抱负的人，共同筹商擘划力行，必须延揽人才。经多方了解联系，父亲礼聘华北水利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张含英，任第一科科长，孔令灿为第二科科长，宋文田为工程师。父亲憧憬着在山东的建设事业上能有所贡献。

山东全省面积约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在历史上是个兵连祸结，灾害无尽，贫困多难的省份。一九二八——一九三0年间，山东大旱灾，严重受灾的有四十八县，受灾人口达四百一十余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2.8%⑥，鲁南、鲁西禾稼无存，再加上兵匪抢劫，十室九空，灾民以石屑充饥，继而饥人相食，饿殍载道，百里之内无人烟。黄河下游和铁路沿线，旱蝗风雨，天灾尤重；直鲁军阀作战，兵燹更深。春夏大旱，秋苗又被蝗虫

吃尽，数百万人望哺嗷嗷，三冬已至冻馁交迫，将何以度岁？

父亲正是在这个时期到的山东，面对着这样的现实，真是心中如焚。

建设，从何入手呢？建设，不能是粉饰升平，是要造福人民啊！

父亲悉心搜集资料并实地察访，研究分析山东近代所受灾害情况，总结出影响最大的是水、旱涝，黄河运河洪水和海潮。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水旱灾十分严重，以全省107州县计算，平均每年受灾三十余县，其中主要的是水灾，灾情最重的是旱，而涝又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水旱涝之间有相关的条件、规律和影响。从地域上说水、旱、涝都以鲁西鲁北平原为重，从原因上说降水量少时，坡水径流难以利用，遂成旱灾；相反的因坡缓径流下泄慢，地下水位高，土壤蓄力小，加上九湖被黄河浸流淤积，削弱调节能力，降水量大时又积涝而成水灾。在马颊河、徒骇河流域，从聊城、临邑、商河、阳信到沾化，小清河流域的长清、历城、章丘等县都是水旱更迭。涝灾也和黄运洪灾相联，重灾地区是沿黄河、运河两岸及滨湖地区，涉及鲁西平原六十余州县，其主要成因是黄河改道造成水系紊乱，灾情严重，影响深远。至于潮灾地区在渤海沿岸昌邑、潍县、寿光、利津、沾化，无棣等县，而胶莱河口至马颊河口，一般平原地势平缓，坡度在万分之一左右，同样潮位能内侵数十里至百里以上。这一带平原不仅有大量农田粮棉丰产，而且有大量荒地可以利用。潮灾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父亲深深体会到人的作用：由于明清非科学的“治黄保运”，破坏了原来的水系，造成严重的黄水洪灾。这说明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形成灾祸。降水量小而旱灾必多，但是泗水、莱芜、宁阳等县，对引用水源和井灌有一定的历史和经验，这一地区虽然降水量小而旱灾极少。同时旱灾出现在夏季最频繁，而特大旱灾都是在头一年秋冬干旱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冬灌保墒的措施很重要。这说明了人对自然抗争的力量。鲁北鲁西地区既是旱灾区又是水灾区，看来矛盾而其统一的根源是坡缓径流问题，若能解决径流问题就能控制灾害。这说明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大有可为。

父亲经过调查研究后，由建设厅提出一些设想和计划：

一、首先要治水，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进行有系统有步骤的勘测治理；在黄河口平原地带筑堤防潮。对徒骇河、小清河疏濬河道，改建闸门。按清一统志记载，小清河在五代时原为巨流。多年淤废，现在只有孝妇河来汇，河身狭小，河岸又低，易于冲决，所以旱时涸而断流，涝时溢而成灾，亟待治理。

二、打井，利用径流。在鲁西鲁北地区普遍打井，推广泗水、莱芜等县井灌经验，以防旱灾；开沟引渠多方利用径流，治旱防涝。

三、开展公路建设。计划在全省修筑公路，形成一个公路网。父亲认为要开发生产，物畅其流，开拓物资、精神生活，“交通”是必要的积极条件。

四、建设通讯网。计划在全省各县架设电话线，形成一个通讯网络。

五、植树。计划在全省大面积的植树，防治水土流失。丘陵地区种果树核桃栗子等。平原地区种桃李杨榆槐柳等，一般的三年可以成林结果，花开似锦，果实累累，绿树浓荫，既美化了大地又富了人民。

这些计划和愿望总是美好的吧!?

一九三0年冬由于父亲只求实干受到很多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刮地皮的省主席陈调元，再加上军阀之间的派系斗争，陈调元对父亲下了“通缉令”，父亲只得仓皇逃命，离开了短暂一驻的山东，留下了自已要为故乡父老忝尽绵薄的衷心遐想。所遗职务由第二科科长孔令灿代理交卸。厅长的工作结束了，但是作为一个山东人的耿耿忠心却不会结束。父亲不认识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建设”正是为“粉饰升平”，使他倍加沮丧；已非寄人篱下，在自已故乡的土地上竟也不能一展宏图，这绵绵遗憾也是不会结束的。父亲在任期间只开始了小清河的治理工程和修筑烟潍公路。虽然一切未能如愿实现，但所拟计划对山东以后的建设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父亲接任河东盐运使，驻节运城。运城位于山西省西南角，是在茫茫黄土高原边缘，连绵不断的土塬、山梁、沟壑中的一块盆地，以涑水河谷为中心，北峙吕梁山，东界中条山，黄河环绕西、南，与陕西、河南两省接境。在中条山北

麓，运城与安邑接壤处有一个盐池，长约三十公里，宽约数公里，这就是潞盐或称解盐、河东盐的产地。左传成六年："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杜预注："猗氏盐池是"，山海经称为"盐阪之泽"都是指的运城这个盐池。史书记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蒲坂和安邑就是现在运城地区的永济和夏县。近年在夏县发现五千年前新石器晚期和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足证远古的祖先们已在这里定居並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河东盐池在全国算是最小的，但是它和祖国的文化一样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造福于晋陕豫亿万人民的盐池。

河东盐池造盐仍依世代相传的老法，完全用人工、靠天时。每年初春盐工入池，治畦淘沟，然后灌水浇晒，到八、九月结束。气候风向最有关系，有正南风正东风时一夜就可结盐，盐花结晶，皎洁如编贝；若得小雨，颗粒更鲜明，俗称雨水盐；若雨多阳光不足，则盐色青暗；若遇东北风、西南风，盐花不浮，满畦像煮沸的稀粥，味苦色恶，不能食用，只可刮弃畦外，等待风向转变重新注水收种。古诗《南风歌》有："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正是记叙了自然气候对河东盐池的关系和盐工人民靠天吃饭的热切愿望。

父亲掌理河东盐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改革：

一、注意气象。在盐运使署内饬专人注意气象变化，作一些预报工作，及时和盐场联系，以避免生产的损失。

二、革除积弊。在盐场旧有例行不成文规定，盐商可代公务

人员“买盐”，公务人员转手居奇获利；又如沿河口岸关卡风陵渡、茅津渡的查验员，以查验为名，从盐包里用筒抽盐营私等等。父亲定出法则，摈除一切贪赃枉法、走私中饱等弊端，但经查出严肃惩处。因为父亲廉洁自持，公生明，廉生威，在任期内尽除积弊陋规。

三、提高盐产质量。土法种盐很不科学，而盐质优劣关系到千家万户人民的健康。因此增设化验员，对每一畦盐都要进行检验鉴定，规定杂质不得超过5%，并组织人力研究改进晒盐技术。

四、改进包装。多少年来沿用麻包装盐，长途驳转，经骡驮、大车、脚伕、沿途住店偷盗，掺沙拌土，污染变质，损失很大。因此规定改用布袋包装，盐斤出场时由场署派员监督用机器缝线扎口。严禁偷拆，以保证质量。

五、修筑环池马路。盐池东、西、中三场，环池约七十公里。原有土路行旅不便，阴雨泥泞，污染盐池。一九三五年到任当年，即由场署督率两营缉私兵，修筑环池马路，盐商可骑自行车往来，车辆运输均称方便。

六、计划兴修轻便铁道。河东盐供应晋陕豫三省，但运输维艰。从运城直达本省最近的口岸猗氏县，也要起旱路三十公里。到河南口岸的一条运输线是由盐池出场装卸到解县，再由骡驮转运四十五公里到曲里，再渡黄河车运豫岸。运陕西的一条路线是由运城装大车起旱路到五十余公里外的黄河口，再换船水运五十余公里到潼关起旱。这么周折，遇有雨雪更多损失。父亲决意由盐

池到运城修筑轻便铁路和同蒲路衔接，并有支线延伸到各重要口岸，以改进运输条件，节约人力物力，保证质量。在任期内已请到同蒲路工程师住在运城，进行测量计划，定出方案，并已设仓备料，准备定期开工。

七、改良硝池滩。在解县境盐池边缘形成硝池滩，周围约二十余公里，每在旱季水涸，硝盐茫茫，贫苦人民刮取食用，大有害健康。父亲计划请专家研究治硝，改良土壤变为农田或养殖场。同时硝是工业原料，大可利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平津，侵略者的铁蹄踏向华北广大腹地，国事危急，父亲积极组织力量抢运盐斤，将几十万斤河东盐转运到晋陕豫各口岸，山西沦陷后，陕西、河南的人民也没缺盐。我是十月初由运城南行赶到长沙临时大学上课的，临行前的几个月里，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灯光通宵达旦，盐运使署里上下人员紧张奔忙，回忆起来景象如昨，现在才体会到父亲当时的担子该是多么沉重。

父亲在任不足三年，对改革盐政有许多设想。河东盐池虽小，盐务行政上的积弊等情况，与国内各大盐池大多雷同。历届盐运使都是尽力搜刮，私囊充满就匆匆离任，再来一位新任，重新搜刮。河东的上一任盐运使崔某，到任两年刮走二十多万，离任当寓公去了，在山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父亲想的是改革盐政，他有许多设想，拟在河东盐政上有所建树，以推动全国的盐政改革：建立制度，加强管理，涓滴归公，增益国库，改进生产，提高

质量，造福人民。但是，抗战的烽火破坏了他的设想。其实，即使不是抗战，他的“改革”也是无望的．因为河东盐运使是由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的，财政部要税收，盐运使要“听命中央”；而河东盐池是在山西境内，闫锡山认为理所当然这是他囊中的财富，随时“征用军费”。这个盐运使必须侍奉两头，却得不到任何人对改革的关心和支持。更主要的是在那混混沌沌上下交相欺骗，贪污成风的社会，岂有个人所能为力的什么“改革”!?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侵入山西，太原已很吃紧，父亲一面赶紧结束公务办交待，亏欠了三千元。一面迎送由太原南来过黄河逃难的，一批批携带财富眷属的官老爷们（当时有一位司令员带了几十箱装着金条的子弹箱）。最后一件工作是太谷铭贤学校的师生家属南迁四川，两批共有二百余人，十月里先后到运城汇合，父亲接待他们住下，还在文庙里上了几天课。到十一月，安排了骡驮、大车、木船，送他们由茅津渡过黄河到潼关安全南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了。

七、从抗战到解放——到敌后抗日·动员吴化文起义·动员傅作义起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严重打击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三个月内消灭中国的迷梦，全国人心振奋。但是闫锡山却怕共产党吃了他，利用抗战的招牌，

表面上讲“统战”，骨子里却大搞排除异己反共的勾当，先后成立什么动员会、同志会、进步社等一系列地方帮派，开展法西斯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决定与闫锡山决裂，毅然于十一月里和母亲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们离开运城，随行的是王镇典带了几隻衣物箱子。在风陵渡乘大木船过黄河到西安，这里已有一些从太原南来的人家寄住。父亲估计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中原是会沦于敌手的，同时他相信中国是不会灭亡的，一定要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赢得胜利。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从我国历史上看，炎黄子孙是有志气有骨气有韧性的，几千年来承受了多少灾难，终竟能挺直脊梁骨站起来，况且日寇侵略我们是非正义的，必然“寡助”。因此，他也作长远打算，决定带家到四川去。这时父亲还考虑到华东的局势也不好，如果山东失守，日本占领曲阜，孔氏宗庙沦于敌手，奉祀官孔德成必将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胁利用，影响恶劣。因此，父亲打电报给孔祥熙转国民政府，急速安排解决这个问题。

从西安到郑州转武汉，火车拥挤不堪，地方上的交通工具、物资被征用备战，车站上集结着待发的士兵，人们寄希望于士兵，可是传来的却都是国民党打败仗的恶耗。买不到船票，只能暂住客店，却意外地遇到久无音讯而汇集的亲友。多亏王镇典四出奔走才弄到去宜昌的船票，轮船上比火车还挤，一间舱里不知装了多少人，小孩子们只能睡在桌子底下。一路南行，逃难，难逃！人们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离开了家乡故土，突然被抛

入这混杂的人流中，惶惑不安，苦闷烦躁，陌生的旅伴为一点小事就会大吵大闹，再加上坏人趁机偷盗拐骗，又造成多少的不幸。在那战祸笼罩的年代，能保住一家老小的平安就是大万幸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父亲带领一家总算平安到达重庆。但是，离开了山西也是没有出路的。况且物价飞涨，官僚、奸商囤积倒把，带着一群要吃穿要求学的孩子，父亲的担子真不轻啊。记得那几年在重庆有山东老乡们开的实业公司，照顾父亲入个股，可以周转补贴家用，还有龙岗的乡亲王兴伦哥等同志，时常接济我家送些面粉来。

在重庆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武汉失守后更为频仍。只要雾散天晴，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各个信号点，一挂起红气球，人们就惊惶失措扶老携幼地四散奔逃，东、南、西、北，哪里有安全港呢？接着是：嘶叫的警报——日本重轰炸机队的沉重轰鸣，一片火光和震撼大地的爆炸声。被炸的地区烟尘滚滚，瓦砾遍地，尸骸枕藉，无家可归的人悲痛泣绝。月明星稀的夜晚，一样带来灾祸。为“跑警报”（当时的术语），父亲又把家从两路口搬到江北寸滩镇乡下（到重庆要坐嘉陵江轮渡）。有一次父亲到重庆山东驻渝办事处去，遇上敌机轰炸，把一家吓坏了，幸好傍晚平安归来。那次石灰市大轰炸，死伤万余人。

一九四〇年秋，父亲接受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任命，这本是空名，可以坐在重庆拿干薪，但是父亲对国民党达官贵人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很是气愤，他决意到敌后去。正巧这时我的四

叔公钱穆老教授由江苏到成都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到乡下我家小住，两位老人谈书说史议论国事，并到附近老农的瓜棚下闲坐，很是欢畅。现在四叔公在台北已九十二岁高龄，和我父亲只几日相会，无缘再见了。送走了四叔公，父亲即偕秘书长王立哉⑧启程到安徽阜阳（山东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去。路途遥远，出川后要穿过湖北、河南，到界首折向阜阳，乘船坐车起旱路，还要穿越日伪军的警戒线，实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在山东解放区，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党领导下于沂南青驼寺隆重举行了山东第一次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决定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出范铭枢⑨为参议长，参议员八十一人。我家住重庆江北寸滩乡下，恰巧范老的亲属也住江北寸滩镇上。父亲和范老及李澄之、霍世廉等参议员都是熟朋友，到阜阳后和他们联络互通声气。父亲和党合作，动员人民抗日打游击，抢种抢收搞生产，打击鬼子的扫荡，随时转移坚壁清野。有一次敌人突然袭击，大家来不及躲避，只得跑上附近的小山，忽然起了迷漫大雾，才幸免于难。在阜阳常有山东流亡出来的学生，父亲都按文化程度妥为安排，并给以生活上的照顾，制作衣服被褥，发给助学金，使他们没有一个失学流浪的。家乡来人也带来家乡的信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后，日军五十余万人侵入山东，但只能控制大城市港口和交通线，党领导人民在广大城乡进行救亡图存的抗日活动。在滕县一带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是鲁南地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旅长董

尧卿，秘书长刘元甫）⑩当时是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⑪所部；父亲请龙岗老家管事的要尽力支持，贡献物资粮秣，帮助解决困难，并说明抗日武装是打击敌人保护百姓的啊。在阜阳，父亲也特别注意小孩子们的教育，想方设法使孩子们能上学认字念书，茅屋、破庙、村公所都可以作课堂，没有教科书就编写 油 印，讲说抗日，使小孩子认清敌我。当时敌后人民的生活很艰苦，父亲和老乡们一同吃地瓜干醃苦菜。老乡们却忍苦受难，出人出力支援抗战。父亲一再向重庆国民政府申请救济，杳无回音。

一九四三年任期届满，父亲在阜阳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岁月后，又几经跋涉回到重庆向蒋介石述职，一再恳切陈说山东的抗战形势和人民疾苦，要求政府给以具体支持和关怀。又说参议会将改选，自已年老难以胜任，建议另选贤能。蒋介石不解答别的，只说："还请您再辛苦一次。当然还请您去，当然还请您去！"蒋介石知道我父亲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咀上说得客气，心里一定在咒骂"娘希皮！"所以不久发表了第二届的临时参议会议长是ＣＣ派的裴明远（他并不去阜阳），接着何应钦给送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委任状，父亲当时就把委任状撕了，说："我本来就是两个中将了，不稀罕这个。"耻于在那个只拉壮丁、克扣士兵粮饷、打败仗的国防部下当个什么吃闲饭的参议。

在重庆还曾由"奉祀官"孔德成陪同去看望孔祥熙，随行的有妹婿华武驿和大弟祥琦，是司令员李仙洲派车送到渝郊新开寺的。当时孔受攻击辞职闲住。在车中德成说："他如今是门庭冷

落车马稀了。”父亲说：“要让他好好想想，这对他是很大的教训。”到新开寺山上，孔在门口迎候。父亲对他陈述敌后人民生活的艰苦，物资困难，花生衣也要四、五角钱一斤（掺在杂粮里吃），中央一定要救济。”孔祥熙嗯嗯地不搭碴儿，只是说人们对他误会，大肆攻击高春如，他现在闲居了。高春如即高秉方，是孔的亲信，任财政部直接税局局长，掌握税收大权，贪污舞弊，声名狼藉，在重庆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父亲说：“高春如实在太不像话了，庸之，你要好好想想。”这种谈话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国民党的头子们谁会惦记着吃糠咽菜坚持抗战的老百姓呢！

当芦沟桥的炮声震开了我国抗日战争的史页，父亲就很兴奋，在他朦胧的意识中以为这会是我们国家民族振兴的契机。所以在抗战时期，别人都向安全的大后方转移，他却以花甲之年奔赴阜阳山区，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老乡参加艰苦的抗日工作。他痛恨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说：“这样的政府怎能领导抗战，这样的政权是长不了的！”却又消极地体会到个人的无能为力，只求生活恬淡，自己读书写回忆录，而又漠视了亿万人民奋起抗战不可摧毁的力量。于是深居简出，在江北寸滩乡下一直住到抗战结束。这样的矛盾，正是由于他的思想的局限。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这是全国人民八年抗战，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用无

比的代价、用血和泪换得的胜利，这正是亿万人民所向往的！父亲极为兴奋激动，急不可待地隻身由重庆经南京于年底前回到济南，他想象中抗战胜利后应有一番新气象。当时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已于九月一日由日伪军护送进入济南，日伪蒋合流“交防”，窃取胜利果实。全国各地的“接收大员”蜂舞，天上飞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抢的是房子、车子、妻子、金子、票子（美钞），号称“五子登科”，山东也是闹得乌烟瘴气。这又是父亲完全所意想不到的。为了装样子，山东成立了什么“清查委员会”父亲任主任委员。在官老爷们想这本是点卯的事，息事宁人而已。父亲却秉公不苟地查起来，在社会上揭发控诉。四七年暑假我到济时，父亲拿出几大本清查贪污案件的资料证据，认真地给我讲说。父亲疾恶如仇，这是正义的好事吧，却开罪于何思源和地方上的某些人士，能有什么作用呢?!

一九四五年“八·--五”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确指出：“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主席商讨国是。毛主席于八月二十八日到重庆。十月十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签署协定。解放日报于十月十九日发表社论《必须实现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派出山东军区司令员邝任农到济南参加停战三人小组，并派鲁中军区司

令员王道也到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军队中将官的策反瓦解工作。王道同志和我父亲相识；当时我父亲任济南汇丰面粉公司董事长⑫住在公司对王道同志给以掩护，并商讨对吴化文进行联络策反的打算。当时吴化文是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驻军在徐州、临城、兖州一带，和我父亲有多次书信往还。在抗日战争以前，我父亲就和他相识。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阴谋发动内战。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刘邓大军十二万余人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揭开全国战略进攻序幕。八月中旬，华东野战军由陈毅同志、粟裕同志率领八个纵队，许世友同志、谭震林同志率领四个纵队，分别负责外线、内线作战任务，挺进山东。为配合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刘贯一部长，调派王道同志和特派联络员李勇烈同志一同到鲁南地区滕县活动。当时，我父亲正巧回滕县访视繁霨中学校务。经王道同志介绍李勇烈和我父亲相识。他们了解到我父亲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爱护贫困的乡亲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是一位开明的爱国人士。为贯彻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政策，王、李二同志主动多次和我父亲晤谈。有一次在滕县西关一家私宅中会晤，研究了对吴化文进行策反工作，王道同志又谈到山东解放战争的形势。我父亲说："中国历代帝王以至蒋介石政权的兴亡，皆是'顺民者兴，逆民者亡'。当前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国民党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这种局势的发展，终将导致全民共诛之。"父亲

表示愿意动员吴化文起义，并将吴化文商讨寻求光明的多次信函交给两同志。这种爱国民主思想，受到华东局地下党组织的重视。

以后，父亲返回济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华东局指示具体分工，王道同志负责徐州、滕县一带地区的活动，李勇烈同志负责对吴化文的策反活动。一九四八年年初，李勇烈同志潜来济南，父亲给以多方面的协助。当时吴化文的部队已调至济南，驻守在商埠飞机场防区，八十四师师部设在亚细亚公司。父亲和李勇烈同志屡次到亚细亚公司去，吴都是置酒相待。有一次吴化文谈到西北军的遭遇时，沉重地说："山东二韩、大韩（指韩复榘）被蒋介石杀了，二韩（指韩多峰）手无寸铁，寓居济南，老总（指冯玉祥）被赶出国考察，只待在千佛山下度日（指王占亭）了！我吴化文还有三万弟兄三万杆枪，蒋介石用我是异已，杀我又无机，他用这绝计，调遣我在鲁豫两省和共军作战，最后待我失掉兵权再杀之。人生，难啊！"我父亲郑重地对他讲山东和全国的形势，肯定几个月内济南必将陷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围之中。严肃地劝诫他："要走王道、高树勋的道路，不要徘徊观望；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何去何从要当机立断。"吴化文很激动握着我父亲的双手说："绍周（自称）近年备受排挤，审时度势，多承老前辈开导，决不辜负指点爱护的心意。"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向济南进攻。吴化文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劝导，加强了选择光明道路，投靠共产党的思想，终于在九月十九日起义。这正是关键时刻，对解放济南的战

役，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济南解放了。二十五日，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布告，对济南各界人士约法七章，宣布："本军保护城市各阶层人士生命财产，民主自由，望全体市民严守秩序，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秋毫无犯，父亲亲眼看到了革命的人民子弟兵。九月二十六日，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同志是主任，曾山同志是付主任。

曾山同志和傅作义有过接触：当傅作义在晋西北任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时，曾山、程子华同志曾与之会见；傅作义后转移到绥西河套时，曾山同志和肖克、续范亭同志都到五原柳林与之会见过。曾山同志也了解我父亲和傅作义的交谊和渊源；傅作义是山西人。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五年山西成立军事教导团，训练有文化的青年和选拔出的士兵，以后山西扩军即以这批学员为基干。父亲是参谋司司长兼教育团团长，当时傅作义是学员。一九一七年父亲任第三混成旅旅长，傅作义是排长。一九二四年父亲任第二师师长辖第三、四旅，傅作义是第四旅第八团团长。自三〇年后父亲虽然离开军界息影并门，傅作义仍时相过从尊为长者，父亲则称他宜生以示平易。曾山同志将我父亲的情况向刘贯一同志反映，当时刘贯一同志是华东局（驻青州，即益都），统战部部长、国军部部长、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军区联部部长。刘贯一同志即向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汇

报派我父亲策动傅作义起义。十一月，刘贯一同志派交际处管易文处长(现任职国务院参事室)从济南邀请我父亲到青州，商谈到北平的策反工作。我父亲介绍了对傅作义的了解和估计，分析了傅部下几个师长的情况——都是西北军，有的曾是山西教导团的学员；提出研究：如何向傅作义动员，是否能带电台，怎样和党联系等问题。刘贯一同志电呈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中央军委复电：通知前线指挥部各方面，对我父亲的工作给以方便；因道路阻梗，为安全起见不能带电台，用口信联络。刘贯一同志曾山同志转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派我父亲到北平。

解放战争时傅作义是华北“剿匪”总司令，掌握着六十万军队，操生杀予夺大权，在中南海内居仁堂勤政殿办公，真是煊赫一时，炙手可热，要和他谈“起义”，岂是易事？父亲想到倘能化干戈为玉帛，保全古都的文物建筑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毁于战火，自已但能尽一分力是有意义的，不应顾虑困难和个人安危，特别是曾山同志的诚恳嘱托，深深感到共产党对自已的信任，决定接受这严正的任务。十一月由济南动身，携滕县老乡杨旭庭和二弟祥璋随行作助手。当时铁路不通，化了装坐大车，逐段起旱路，进入河北省境先到泊头，和共产党的城工部联系，由负责人刘仁同志安排通行到北平。进城后父亲住在西城绒线胡同苏体仁宅内作掩护，杨旭庭出外找关系。

父亲到北平，正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傅作义由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返回的时候，虽然傅作义没有接受

蒋介石让他南撤封作“东南战区司令”的圈套，也明确感到他的军队从绥远、张家口、宣化到北平所列的长蛇阵是不利的负担，但是还幻想着即使万一还可退回绥远老窝去，那里有他的地盘和多年经营的财富，现在怎甘心谈“和”呢。直到十二月五日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十二日他的丰台、通县等外围据点相继失守，平津铁路中断，北平完全处于包围之中，城里的几十万军队全靠空投补充给养，北海湖面结冰即空投点。他的思想波动，苦闷彷徨，他还想固守平津，为保存实力，部署放弃张家口，命令嫡系部队三十五军撤回北平郊区。他的部署还未落实，十二月二十二日，解放军即以凌厉的攻势围歼了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二十四日又攻克张家口和击歼怀来南窜的两个师，傅作义的直属部队大都被歼灭了，这时他在万分沮丧之余才逐渐冷静下来，认清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起义谈和，但是还有重重顾虑：怕像当俘虏一样的丢面子，如何改编全部军队，自己的财产能否保全，家属子女在重庆是否安全等等，往复踌躇。父亲对傅作义一再推心置腹喻以大义。这时策反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功到垂成。十二月廿四日由我爱人钱伟长同志骑自行车经石景山到良乡（同行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系教师董寿箓同志），找到解放军总部，汇报我父亲的工作情况和清华情况，受到叶剑英、张宗麟、钱俊瑞几位同志的亲切接待并给以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由绥远飞平，父亲和邓见面，大有进展。这期间父亲又让弟弟到良乡向解放军总

部口信汇报，以父亲的印鉴为凭证。其时海淀已解放，出了西直门就是解放区了。待到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⑬，全歼守敌十三万；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平解放北平的大局已定。一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平古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北平城内近百万人民放下了惊恐忐忑的悬念。北平和平解放，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加速了绥远、湖南、西康、云南等省的起义，大力促成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解放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举行隆重的解放军入城式，万民空巷夹道欢呼，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站在军用卡车上，由正阳门缓缓驶进，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挥手。父亲在路边挤在欢欣沸腾的人群中，他是多么的激动啊，想起一九二七年那次来北京，二十二年了，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国历史的车轮终于辗过了万千阻险，走上了新的道路。

城郊交通恢复，父亲到清华园在我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春节后俏然仍回济南去（杨旭庭和二弟已先回济南复命）。父亲认为傅作义的起义是共产党英明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政策和无坚不摧的解放军兵临城下的胜利，是国民党腐朽无救土崩瓦解大势所趋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只是很好地完成了共产党交给的任务，无愧于国家（祖宗和子孙），做了一件舒心的事。至于有关动员傅作义的具细过程，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亲友和家人炫耀过，而是对组织负责，在一九五〇年九月民革党员登记表上，“参加工

作”项下，写明：“济南解放后，奉华东军区之命赴北京联络傅作义商洽起义工作。”介绍人吴赤云、范予遂两同志注明意见：“我所知道的，孔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奉华东军区之命赴北京策反傅作义起义工作。”这份登记表保存在北京民革中央组织部的档卷中⑮。

北京啊，北京，肃穆的故宫，美丽的祈年殿，北大学府的红楼，微波涟漪的北海，御河桥畔的依依垂柳，千万家和乐融融的四合院，你们愿为我父亲忠诚的拳拳爱国赤心作见证吧！

八、党 的 关 怀

一九四九年三月，父亲回到了济南，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奔波、紧张、劳累，大病一场。在病中得到中共中央由毛泽东署名发出的通知，邀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父亲心情非常激动，自认为不过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一份力，竟受此殊荣，实不敢求得名利，愿留居故乡。党的胸怀多么宽厚博大，对任何人的涓滴之功都是十分珍视的。刘贯一同志和父亲会面，刘贯一同志当时任山东分局秘书长，得董必武老首长和周恩来副主席通知说，孔繁霨先生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作了大量工作，他不愿留在中央，愿回老家，要好好安排。此后，对我父亲不仅给以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给以多方关怀，选他为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第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并选为

团结委员。父亲得到很好的条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接受党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立场有了很大的转变，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不理解到同情，从支持到拥护。

一九五七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一日在济南受诬以反革命被逮捕，后解到太原关押判刑十五年。文化大革命中转押到平遥县劳教所，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病逝，以戴罪之囚葬于平遥县城关公社丰泽大队地里。父亲在监狱里曾被评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

父亲被判刑的罪因是“杀害王瀛烈士”。王瀛同志是大革命时国共合作期间，在山西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叛变之后，闫锡山与蒋介石勾结镇压革命。七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清党，闫锡山改组省党部成立清党委员会，通缉共产党人。所有被通缉的同志多已离开太原未遭毒手，只有王瀛、朱志翰夫妇二人到武汉开会后返回太原，在晋北被扣捕，即由特种军事法庭审讯，判处王瀛同志死刑，十月十一日执行。一九六〇年，山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浮夸风假造事端，诬证我父亲是杀害王瀛烈士的罪人。

一九八〇年根据党中央〔55〕号文件精神，山西省高级法院认真复查，彻底查清：一九二七年通缉共产党人的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会的负责人，是CC派的梁永泰、苗培成、韩克温、李冠洋等人，执行枪决王瀛烈士的特刑庭庭长是马骏和卫戍司令荣

鸿胪。史实俱在，证据确凿，我父亲和王瀛烈士的被害，毫无关联，而被诬陷。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对父亲“宣告无罪”。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山东省委批复山东省政协党组，对父亲错划问题予以改正；十一月三日山东省政协党组正式通告撤销以前的一切有关决定，对父亲“恢复政治名誉”。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民革山东省委决定撤销其开除父亲党籍的决定，并正式呈报民革中央：“孔繁霨错案得到改正平反”！

党的胸怀多么宽厚博大，党的政策多么熠耀光辉，对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党都给以深切关怀，对二十年前的冤假错案都不遗余力地认真复审核查，层层落实，有错必纠，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动人心弦的气魄和力量！我的父亲是深深地得到党的温煦关怀，受到党的政策光辉照耀的亿万人民中的一个，他在黄泉之下也可以舒心安眠了⑯。

〔作者附记〕

故乡滕县县政协委员会敦促邀约我整理先父的生平事迹。故乡父兄的淳厚情谊和对先父的尊重，使我深受感动，决心接受了这一任务。

我想，一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它却反映了历史的一瞬息。我的父亲生活在中国近代史大变革的时代，也许他是同辈人中的或一典型。

他的经历和近代史的事事相联，因此，在记叙中为了要说明时代背景，不得不繁言絮语。为了说明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实，岁月湮远，务求真确翔实，又不得不多方核查、征询有关资料，曾阅读《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山东史志资料》、《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资料》、《孙中山先生年谱》、《中山选集》、《闫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闫锡山早年回忆录》、《张学良将军轶事》及各省有关文史资料等。但愿对读者能有点滴之力，则亦不惮繁琐之讥了。

在记叙过程中，承县政协委员会调研科同志寄阅重要资料；还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有赵俊卿同志、陈慕唐同志、孔繁迈同志、李勇烈同志；在亲属中有姨父崔观澜、表弟霆钧、妹婿徐葆初和华武驿、祥琦弟、祥琏妹，并此志谢。特别是老乡长刘元甫同志，积极协助搜求资料，提供线索，并热诚给我鼓励，使我能克服困难坚持完篇，是我无任感荷而不忘的。更重要的是刘贯一同志⑰在病中不惮辛劳，谈话回忆补充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具体体现了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革命历史实事求是的高度负责精神，怎能不使人从心底油然钦仰呢。

一九八五年初稿

一九八六年五月修订

注　　释：

①见《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此书原由同盟会东京本部刘揆一保管，后由会计何天炯保

管。一九三九年由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入《革命文献》第二辑。因我父亲是外省人，山西出版的《山西早期同盟会员录》不录名。

②一九〇七年吴禄贞任清廷督办吉林边防大臣，压倒强敌，迫使日本人正式承认延边是我国领土。

③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经参议院通过，十一日由临时大总统孙文签署公布。

④鲍贵卿的宅邸，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孙总理奉安，孙夫人到京迎榇即住鲍宅，我们临时让出。

⑤典出于武王伐纣后偃武修文的故事。

⑥见《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二年69—70页。

⑦运城旧属解(音hai)州，古潞安府，又在黄河以东，故称。

⑧王立哉先生是诸城人，民主革命者，一九八五年在台湾去世。

⑨范老于1915年五四时期，任山东省立曲阜师范校长，是开明学者，在校内不露声色地传播民主思想；为人正直不阿。张宗昌作督办，教育厅状元厅长王寿彭指令教学生读经，范老拒不执行，毅然辞职。

⑩孔昭同原为福建兴泉永镇守使，1934年父亲回滕县承邀晤。抗战时组织抗日武装曾配合一一五师686团攻占白彦据点。

⑪一一五师政委是罗荣桓，代师长是陈光。于1938年

１２月接受中央军委指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令，率师部及６８６团向山东挺进。

⑫在辛亥革命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和欧洲列强对中国经济压迫的暂时放松，山东的民族工业较清末十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载１９１６年山东注册的工厂、公司有７８５家。济南的汇丰面粉公司是在１９１８年成立的，创始人是穆伯仁、后来在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期间公司受到极大损失，濒于倒闭，我父亲给以大力支持，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济南，被推为董事长，整顿公司业务。

⑬在此前后，闫锡山曾六次给傅作义电报，勉以“只有牺牲奋斗，万不敢侥幸共存”。见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闫锡山早年回忆》附录，《闫锡山传略》。

⑭一九八四年我的弟弟出差到呼和浩特，会到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周钧同志。周老告诉弟说：“《古都春晓》（是写傅作义起义前后的话剧）中那位动员傅起义的老先生就是你父亲”。周钧同志原系傅作义部下旅长，随傅起义，五十年代曾任绥远专员。现已离休，年逾八十高龄。

⑮在这登记表的“社会关系”项下，父亲写明“与刘民生、李澄之、苗海南、范予遂、张雪门、吴赤云、熊观民、董一博、张象冬、赵毅生、李济深、武和轩、傅作义、孙兰峰、邓宝珊、张含英、钱伟长诸同志皆甚相知。”

⑯由曲阜孔府管理委员会档案室，查得：《孔子世家谱》初

集卷七之一、之二—第五、滕阳户。明洪武年间，孔子五十七代一人閤（字正伯，处士，子—公温），由曲阜迁滕县。七十三代庆𬬸（字焕章，子二繁霨，繁露）（见三十六页）。七十四代繁霨，字云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山西参谋司司长，陆军中将，三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勋五位，陆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山西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山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山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山西警卫军总司令，晋绥训练总监，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建设厅厅长。子三，祥琦、祥琤、祥瑾。见（六十九页），（《孔子世家谱》系1930—1937年修订）。

⑰刘贯一同志已离休，现受中央军委总政委托任新四军及华中、华东、红军工作史总编委，并任中央党史征集核心小组成员。

作者简介

孔祥瑛：是孔繁霨老先生的长女，现年七十二岁。一九三九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在校期间曾担任《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并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毕业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曾任重庆清华中学教师及四川省立图书馆辅导部编纂。解放初，参加北京市郊四清工作、发起组织清华大学家庭妇女会、参加北京市妇女联合委员会工作。一九五一年后任北京清华附中校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现已退休，任上海清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及基金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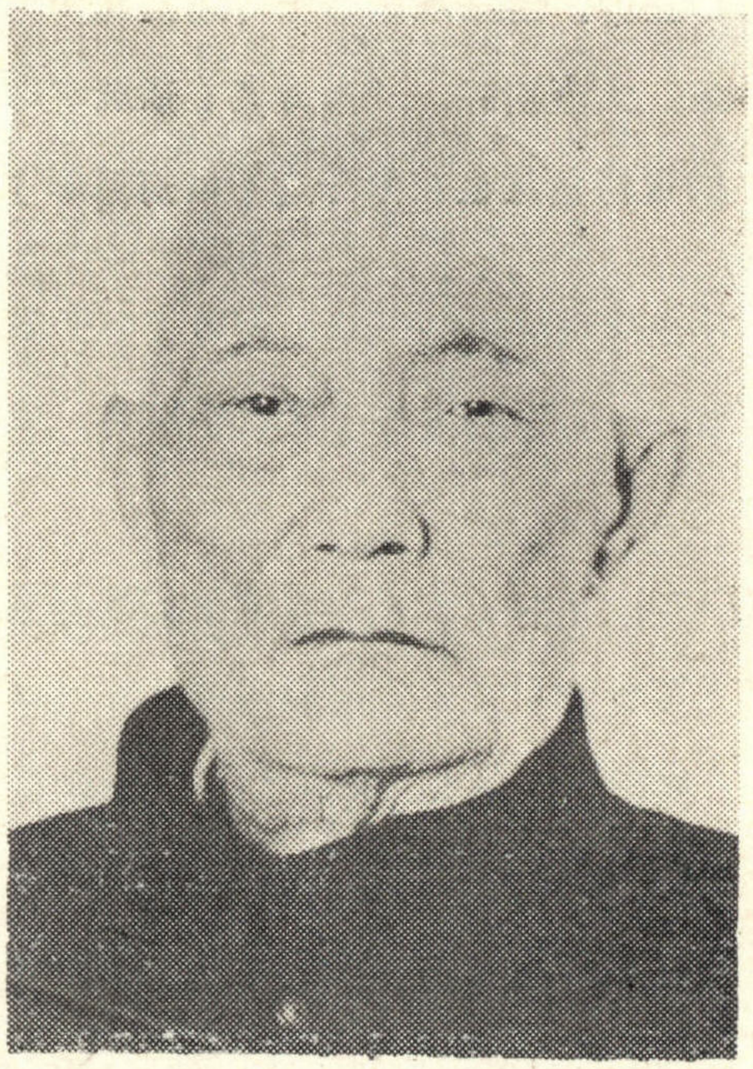
会委员，并从事古籍整理工作。

补记：近得王昭建同志回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何思源等军政“劫收”大员，竟相贪污。国民党政府派出所谓“检查团”到各省佯为检查，掩饰贪污。派到山东的检查团团长是张继（国民党中委），在济南召开大会，何思源和“各界代表”纷纷登台。当张继轻描淡写地提到贪污时，我父亲突然在台下站起来，大声疾呼：“张溥老（张继字溥泉），你别说啦，山东最大的贪污犯就坐在你身边（指何思源）！”

爱国将军孙兰峰先生

白　震

一九三六年冬，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曾亲临内蒙古采访声震中外的百灵庙、大庙之战。盛赞此次战役为“不平常的胜利”，“超军事的战争”。当时任傅作义部二一一旅旅长兼前线副总指挥（总指挥系孙长胜）孙兰峰将军，亲临前线，以装甲车队冲破敌阵，全歼日伪军，一举收复百灵庙。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自陕北革命圣地延安，发来祝贺电；



孙兰峰同志

并派南汉宸同志率代表团到绥远，向傅部抗日官兵献以“为国御侮”的锦旗。在日寇侵我河山，人民惨遭蹂躏，国家面临危亡的严重时刻，孙兰峰将军大战百灵庙，和董其武将军收复绥东红格尔图的胜利一样在中国华北抗战史中，谱写了誉满中外的篇章。

一、在艰苦锤炼中成长

孙兰峰，字畹九，一八九五年农历十月一日，生于山东省滕县姜屯镇大彦村一个饔飧难继，贫苦的榨油工人的家庭里。其父金銮，母亲王氏，有子女六人。孙将军排行为二。由于祖遗薄田仅有一亩半，加以人口多，农村榨油工人的收入又极为菲薄，拼命劳动，仍摆脱不了全家半年糠菜、半年粮的饥寒生活。后来，又租种了本县鲁姓大地主土地七亩，由其父母工余耕种。全家八口，依然终岁不得温饱。至孙将军十岁时，才托人说情，伴读于张姓的家塾中，至十五岁，因生计所迫，辍学种田。五年的家塾学习，他已粗通文字，儒家的“仁政”思想，亦深入脑际。对封建势力横行乡里，虽敢怒不敢言，但忠诚耿直，坚强不屈的性格，已在一个受苦的年轻人心中孕育而成了。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胜利了。民国肇造，民气复苏，当时政府也以三民主义为标榜，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据孙兰峰将军的记忆，一九一二年他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了。由于向地主交租受到百般挑剔和凌辱，内心极度愤慨。他想：“革命”既然“成功”了，为什么“平均地权”还只是个口号呢？

二、受到傅作义将军的青睐

各省起义军纷纷招募士兵，孙兰峰毅然弃农从军。几经辗转，

始至晋军闫锡山部，编入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松属下以谢廉为团长的第四团二营。因其一贯勤奋吃苦，从而受到当时任营长的傅作义的青睐，被提拔为排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闫锡山以其亲信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总指挥，率黄金桂、谢廉、柳树藩、龚风山、付存怀等五个旅，出兵石家庄，反直助奉，攻占京汉北段。当时，傅作义以一个营的兵力，布置适当，以少胜多，控制石家庄全市局势，深合兵法之要。深得亲自巡视防务的张培梅的赞许，立即报请傅为第四团团长，勇敢善战的孙兰峰也被擢任该团连长。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晋军助奉反直，受到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的忌恨，晋军连续二年受到冯的围攻。一九二六年，晋军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勾结，联合攻冯，冯不支，退守南口。冯自己也取道外蒙古赴苏考查。在与冯军作战中，晋军曾一度处于劣势，晋北十二县，多被冯军攻克。傅作义坚守天镇，抵御冯部三四倍于傅的兵力的攻击，坚守三个月之久，并乘冯部师劳无功，全部败北之际，又转守为攻，尾追冯军于归绥城下，迫使冯军中韩复榘、石友三部向晋军投降，徐永昌的国民三军，也投靠了晋军，使局势为之一变。一九二七年闫锡山投北伐战争之机，窃取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称号。傅作义被擢升为第四旅旅长，又继为第四师中将师长，孙兰峰也由连长被晋升为独立第三十六团少校营长。“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孙将军从此更加刻苦自励，整军经武。

三、在北伐战争中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是年秋，闫锡山投机北伐，宣布易帜，自称北方军总司令，兵分三路，向奉军攻击。闫锡山率右路，商震率左路；傅作义部是中路的先头部队，经太岳山区，挺进平汉路北段，一举攻占了涿州城。不意奉军突以优势兵力攻下石家庄，晋军主力随呈岌岌可危之势。傅作义的七千人马亦被奉军围困于涿州城，傅作义以其真知灼见，率孙兰峰等，从容安排，军民同仇，不仅使涿州固若金汤，而且机动出击，屡断平汉路交通，使张作霖背若刺芒。孙兰峰以其刚强的毅力，与官兵们一块在战壕里滚爬，吃酒糟，捕雀鸟，并几次率部潜出城外，成功地袭击奉军据点，坚持八十八天之久，受到傅将军和官兵们的称誉。天津名儒樊之山曾有诗以赠：“新收涿州七千人，燕南百日立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孙兰峰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创业肱股。由是更加英雄惜英雄了。

一九二八年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并恢复了第四师，经统一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三师，辖九个团。以独立三十六团团长袁庆曾升为天津宪兵司令，所遗团长一缺，由孙兰峰升任。张学良因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挥师进关，直趋平津，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将晋军缩编为五个军，其中包括傅作义的原第十军缩编为第三十五军。到一九三一年张学良荐傅作义接替李培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在频繁的部队改编、人事更迭中，孙兰峰甘

为傅将军的马前一卒，坚持整军经武，不稍懈怠。不仅深入士兵群众，与大家一块吃苦，而且自学不懈，重读四书五经和各种兵法，以及清朝胡林翼、左宗棠等治军语录，并写下治军日记，军事、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得到相应提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将军能如此勤奋好学，确是难能可贵的。

四、剿匪安民，受人称誉

多年的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绥远广大农村，如同人间地狱。巨匪王英、李根车、杨猴小、苏雨生四大匪众，成千上万，枪马齐全，横行全省。傅作义坚定决心，组织民众，断匪弹源。遴选所部精锐孙兰峰等团，配以骑兵和汽车，长途突袭。匪徒逃至沙漠追至沙漠，避至山沟追至山沟。不到三月，绥远大治。乌合之众，悉被剿除或星散。原绥远省的河套、后山等是匪患严重的地区，一时出现了小康局面。武川县商民群众，无不额首称庆，并镂刻石碑，记载孙兰峰将军剿匪安民的功绩。立于该县闹市，以作永久纪念。笔者在一九五二年还亲睹这一石碑在武川街头耸立。

五、为国御侮，威震青山

“一、二八”上海抗战后，日寇侵热河、攻长城，华北局势危急。全国爱国军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抗战。傅作义将军立即请缨抗战，被任命为华北军第七集团军总指挥，率五十九军及李服膺的六十一军，开至张家口，全军官兵以每小时二十华里的速度

进军昌平。司令部设在小汤山的肖家营。孙兰峰是四二一团团长。军纪严明，军民关系极好。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拂晓，激烈的战斗全面开始。敌以飞机十五架，坦克十余辆，野炮三十门，掩护步兵福田等部，凶猛地扑向我军阵地。我军以近战狠打的战法，用伏枪、伏炮、白刃肉搏，接连打退日寇的四次冲击。四二一团六连仅余班长张恒顺一人，犹抱着机枪射击，十一连范长胜双腿被炸，仍向敌人投掷炸弹，安春山、段聚宝连，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坚守石厂阵地，没有后退一步。张惠源连牺牲殆尽。其英勇壮烈，真是可歌可泣。孙将军在傅作义将军亲自向他领导的四二一团做战斗动员后，他就一马当先，率全团官兵跑步增援二一〇旅阵地右后方的苏家口，把骄横的日本兵打得弃甲曳兵而逃，全部收复了失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何应钦、熊彬和日寇签订无耻的塘沽协定。傅部的抗日官兵，声泪俱下，忍痛撤出了洒满战士殷红血迹的阵地。据孙将军记忆，此次战役，我军牺牲三百六十七人，伤二百八十四人。为纪念这些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们，以傅作义名义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由胡适撰写碑文，由钱玄同书写。巍峨的丰碑，至今仍竖立在呼和浩特城北的大青山下。孙将军至今还可背诵出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一段：

“这里长眠了三百六十七个中国的好儿男，
他们把他们的鲜血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是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怎样才能报答烈士的鲜血！

六、收复百灵庙，重创日伪军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发表了抗日救国政治纲领，鼓舞着全国爱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当时，继东三省沦丧，热河失陷，及“华北特殊化”，察北六县又沦敌手。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纠结惯匪王英之流，在内蒙重镇——百灵庙，组织了所谓蒙古军政府，西北防共自治军，妄图建立一条以隔绝中苏联系可能性的防共地带，进而占绥远，侵宁夏，实现其早经预谋的所谓满蒙政策。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傅作义将军，下定决心，伺机给日寇侵略军以打击。绥远抗日的序幕，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首先在红格尔图拉开。董其武将军以出奇兵、袭敌后，分路包抄，直捣敌军司令部的战术，以连续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把日酋田中隆吉亲率的五千侵略兵，打了个落花流水。生俘日伪官兵三百余人，收复了红格尔图、土牧尔台等地，为百灵庙大战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百灵庙依山傍水，是与外蒙接壤的草原重镇，也是日寇妄图封锁中国大陆的一个立足点，是有二十年历史的敌盛岛特务机关根据地。据此，敌人可以南窥乌兰花、武川、陶林，西向固阳，进而逼向省会绥远（现呼和浩特）。目的是十分险恶的。

这一战役正指挥是孙长胜，副指挥是孙兰峰，孙兰峰也是亲

临第一线的指挥员。在作战计划中，他曾清醒地估计到：我们是以徒步疲劳之师，当敌人骄逸之马；以仅能果腹之粮，当山积之备；涉千里之荒原，敌环抱之险境，以不相等之兵力，袭有备之强敌，其武器装备皆优于我，而且白雪飘飘，气温在零下四十度。这是一场艰险的战斗。但孙将军和全体将士们更清楚，我们不是坐视国破家亡的胆小鬼，更不是孤军抗战，它有千百万人民支持。在傅作义将军“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动”的精心谋划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秘密行动，全军身披白披风，潜伏在百灵庙前的环山中。于夜十一时，枪炮齐发，杀声四起，我军身冒敌人在女儿山上吐出的交叉火舌，不顾伤亡之枕藉，置生死于度外，以一当十，冲锋陷阵。孙将军遵傅先生之命，在庙东南高地，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女儿山上之阵地；以装甲军冲向庙东南山口。全军浴血奋战，张振基连以三分之二之牺牲，才夺下了山头阵地。骑兵也进击占领飞机场，全歼守敌。敌酋乘车逃跑，仅以身免。十二月四日，又取得阻击敌人反扑的胜利。敌弃尸六百多具，生俘敌军二百余人。敌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安华亭、王子修等率所属四个师反正，并杀死了日本特务要员二十余人。此次取得的空前大捷，大长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正气。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历史新一页。

由于共产党人，在蒙汉军内，长期隐蔽工作。蒙族爱国青年云继先等同志，先后发动全体保安队八百多人，举行了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德王多年经营的伪蒙军基本被摧毁。这为傅军收复百灵

庙也起了积极作用。

百灵庙之战的胜利，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共产党、毛主席备加关怀，还自延安打来祝捷电报，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之先声。”並派员到前线献旗慰问，受到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全体抗日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国内各群众团体、青年学生、全国人民都给予极大的支持，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以及贺幛和锦旗，如雪片飞来，捐款、物资及远来的大卡车，源源而至。全国各地派来的战地慰问团，亦络绎不绝。正如孙将军自己所说：“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绥远抗战不是孤军。这次胜利，鼓舞和教育了我，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欢迎。”

七、在八年的抗战中

1、从驰援南口到忻口会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振奋了全民抗战的士气。这时傅作义将军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孙兰峰将军也率二一一旅随傅总司令杀向抗日第一线。

当时平绥线东段的作战部署是：

一、中央军汤恩伯部守南口；

二、汤军高桂滋部进击独石口；

三、傅部二一八旅董其武部夺取日寇及蒙奸李守信军已侵占

察北重镇商都城；宋哲元所属之刘汝明部，自张家口北攻张北县。

形成北攻南守之势，以达牵制日寇循平绥线西进之目的。傅作义驻守大同，预计将和敌人进行会战。日寇东条英机纵队妄图腰截孔家庄车站以断平绥铁路交通，进而歼击傅部南退部队。孙兰峰旅长洞察其奸，当机立断。令其刘景新团在孔家庄下车，以怒涛排壑之势，仰攻万全南山之敌，虽伤亡枕藉，犹再接再厉。鲁乐山连余众不及十人，景亮清、张振基连浴血而前，谢兰恩副团长英勇牺牲，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次战斗，迟滞了敌人的西犯，争取了从容布防的时间。孙将军为掩护南口撤退大军立了一功。

日酋坂垣征四郎，率其第四师团抢占南口后，即西犯平型关。杨爱元第六集团军正在那里应战。傅将军领导孙兰峰和董其武两个旅，后又增加马延寿独七旅，配合八路军抄袭了平型关正面坂垣师团的后方，战绩辉煌。陈长捷、郭宗汾等军，又狠狠打击了敌人，扭转了不利态势。但日寇铃木、酒井、川岸、几谷等旅团又犯雁门关、茹越口。守军二〇三旅梁鉴堂旅长阵亡。姜玉贞旅苦战原平，几至覆没。傅部奉命，全军转移至忻口与敌周旋，情况十分严重。

忻口会战是第二战区的一个大战役。左翼由十四集团军卫立煌指挥中央军在忻县大白水村占领阵地；河南省地方军刘茂恩部，配备在滹沱河东高地；云中河南岸由傅作义率董其武、孙兰峰旅布防；郝梦麟和陈长捷为前敌正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红沟的石窑洞内。一九三七年十月初，会战拉开了序幕。敌坂

垣师团约五万余人疯狂向忻口入侵。董其武旅首先阻击敌人先头部队于原平地区及旧河北村。战斗异常激烈。在董其武旅长指挥下，全军以一当十，奋勇冲杀，予敌以重创。董旅长身受重伤，血染右臂，犹裹创指挥，坚守阵地。号称勇将的孙兰峰将军，与日军争夺南花环阵地，率二一一旅官兵，继我军已有八团之众的严重伤亡之后，前仆后继，迎着日军的密集炮火，分路猛攻。压制了敌人的疯狂攻势，一举稳住了南花环阵地。是当时人所称道的胜利军。在我军八十多门大炮猛烈轰击下，敌伤亡惨重，陈尸累累，至十月十日，争夺二〇四高地时，尽管大雨滂沱，饥寒难忍，但我军斗志昂扬。二〇四高地曾三易其手，最终仍被我军占领。不意中央军二十六路、二十七路的孙连仲、冯钦哉、李家钰部，溃败于娘子关。致使浴血二十三天的忻口之战，终以弃守而告终。

2、奋力守太原

傅作义将军率部並配合友军战南口，攻万全，抄袭平型关，血战忻口镇，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又率三十五军（副军长陈炳谦、参谋长叶启杰等）及二一一旅、二一八旅和六十一军二一三旅陈长捷、董其武、孙兰峰、杨维垣，正大护路军孙越，七十三师王思田部，及李柏庆、郝庆隆、刘振衡，炮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部，坚守太原城。董其武、孙兰峰所部在东北城布防，杨维垣部在南城布防，陈长捷等部以东西山为阵地。其它各部陈庆华旅在西山汾河一线。在一无得力野战部队，二无反

击、逆袭的强大预备队的情况下（其它一些晋军也有规避作战绕城而过的）傅将军临危不惧，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孙兰峰将军还记得傅作义军长当时所讲的“我们如同装在棺材里，只等加盖子了”的话。这标志了守城将士要和日寇决一死战的钢铁意志。孙将军说：“当时我军就凭着这股劲抗战的。”

日军凭其优势装备，迅速扑向太原地区，以飞机狂轰滥炸，大炮猛烈射击作掩护，以坦克、步兵猛攻东北城。两军相蹙，伤亡惨重。鏖战至两日半，敌人未能越我雷池一步。置此生死之际，副军长曾延毅竟弃城而去。大家也闹不清外出的是“傅军长”还是“副军长”，影响很坏。而且在日军优势兵力攻击下，我军伤亡过重，众寡难敌，城防几处被攻破，情况逆转，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据孙将军回忆，傅将军当时曾说：“太原被围前，周恩来将军曾对我说‘傅将军是守城名将。但抗战是持久的。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周将军这些话，对傅将军启发很大。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忻口左地区中央军总指挥卫立煌，在率部向晋南临汾、隰县、吉县及安泽、沁水山区大撤退时，对傅孤守太原，亦觉欠妥。特授以“适机转移”的手令。以防闫锡山反噬一口，重演李服膺军长盘山被杀的故伎。副军长陈炳谦等，又严厉的驳斥了参谋长叶启杰“要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的书生之见。并特地把杨维垣旅长请到司令部征求了撤退太原的意见。后决定放弃太原城，渡汾河南撤。由于城门早已用沙袋堵死，只能开一个缝缝，一路纵队始能通过，不

少人都是缒城而下，日军以猛烈炮火追袭，秩序纷然。傅、董、孙、杨诸人冒着严寒与战士一起涉渡汾河，沿西山撤向文水、交城、石楼地区。折将损兵，损失极大。在文水，傅亲到临汾向二战区长官闫锡山作了汇报。重新整编了三十五军。傅仍自任三十五军军长，陈炳谦、马延寿任副军长；张濯清任参谋长；董其武长一〇一师；刘奉宾长七十三师，杨维垣副之；这时的孙将军也同时长二一一旅。全军集中柳林一带整训。进行战术检讨，总结经验，准备继续战斗。

3、受到共产党的真诚援助

抗战初期的一系列战斗，流血牺牲，教育了傅、董、孙诸将军，他们认识到："旧军队必须改造，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党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的片面性和旧的战略战术，也必须以军队与群众相结合，及找胜利避不利的战略战术来代替。那一种死拼硬打，孤军作战的办法，是应该扭转了。"为此傅作义将军求教于共产党、毛主席，数次派周北峰同志前往延安，受到党的亲切关怀。先后派几十名共产党员到傅部搞部队政治工作。傅还三次派总参议袁庆曾、于存斋等人到西安招考大、中毕业生，为部队注入新血液。同时建立以傅作义为主任的政治工作委员会，周北峰、陈炳谦、袁庆曾、张濯清、董其武、孙兰峰、周钧、于纯斋等为委员。並任命周钧为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潘纪文为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党员鲁志浩曾任孙兰峰领导的二一一旅政治部主任。陕北公学学生康保安曾任董其武师政

治主任，当时的进步青年彭光祖曾任七十三师政治主任。中共党员李刚、王庆贞、冼依、黄剑拓、梁建一等分别任三十五军各师、旅、团政治主任。连一级，均派有政治指导员、政治助理员。並确定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保持严明的军风纪；实行军民合作；实施经济公开；瓦解敌伪军五项部队政治工作纲领。还订定了军民关系的十项纪律。孙将军清楚地记得，旅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鲁志浩同志，在部队里为实现部队政治工作五项纲领的任务，所做的艰苦努力。死气沉沉的部队，一下子出现了军民团结，上下一心的新局面。孙将军还说："接连的艰苦战斗，造成了严重的兵额不足、物资补充不上的情况，共产党还通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给我们动员补充了几千名新战士。在八路军当时物资並不充裕的条件下，又给我们补给了单棉军衣、军鞋等物资。这一无私的援助，为傅部抗战壮大了实力。"这些，孙将军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4、晋西之战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南攻韩侯岭，直下晋西南，如入无人之境，同蒲铁路完全为敌人所控制。闫锡山率部逃到了吉县一带山区；卫立煌、孙蔚如、曾万钟、冯钦哉以及裴昌辉诸军，大都退入中条山区。风陵渡以东，此时已是万马齐喑，有组织的抵抗日寇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的三十五军等部，均转驻文水、交城一带。闫锡山不顾傅部的连续作战和遭受的重大伤亡，又给傅作义以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的名义。傅部进驻临县

及三交镇以后，决心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孙将军奉命反攻离石县城，董其武师及七十三师绕到大武镇以东，奇袭离石並歼击大武镇和圣村之敌。当孙将军亲率两个团扑近离石城时，敌人尚在梦乡，四二二团分别抢占城南龙山、城北风山，张惠源营阻击汾阳增援之敌，李民济营已迅即占领东南城墙，安春山营堵击了南门。把日伪军打个措手不及，死伤累累。在七十三师一九七旅王思田旅长指挥下，一举攻入大武镇。董其武师四二五团不顾严重伤亡，狠狠打击圣村之敌。我一个班据守山头小庙，坚不退却，吸引了几倍之敌，苦战一整天，歼敌几十名，于晚间由周福臣率领全班，从庙后悬崖中缒兵而下。成为全军学习的孤胆英雄。强袭离石的晋西之战，给敌人以攻其不备的打击。也是学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开始。成为在抗战初期二战区以守为攻的典范。

5、反攻绥远

为了配合三八年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在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傅作义部不顾晋西之战的疲劳，喘息未定，即励兵秣马，乘敌后方空虚之时，率三十五军北上，反攻绥远城。孙兰峰旅一马当先，王思田旅前赴后继，以密切配合和安排，奇袭绥南和林、清水河两县及据点拉麻盖。全军以一当十，连陷敌巢。董其武师，指向绥城。由于邵得禄营贻误戎机，攻击归绥南郊一间房村顿挫，使日寇援军及时赶来，造成功亏一篑的结果。孙将军为阻击驰援和林之敌，严令安春山营在察屹洞与日军岩田骑兵联

队，短兵相接，反复冲杀，敌不支，遗尸二十余具，仓皇逃去。张进修、张振基两营又绕敌后方，成功的抄袭了敌人的马桩子，使敌人损失惨重。日寇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纠结大同、平鲁、包头等地之敌，分进合击清水河。我军在大、小双墩与敌鏖战，夺回了山头，並令张进修营，夜袭韭菜庄的日军指挥所。安春山营伏击了水泉营据点的敌人，取得了胜利。由于策应台儿庄之战目的已达，我军主动撤至晋西北三岔镇。董其武师司令部设在大村，以避不利找胜利，集小胜为大胜的战法，严防和袭扰朔县、宁武、神池之敌，曾先后发生过朔县西山双花岭、大虫窝之战，日军旋即退去。军部及七十三师，转进至河曲、唐家会、平泉、箩圈堡一带整训。开办了著名的战时军政干部训练团，轮训在职干部，进一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振奋士气，增加战斗力。

6、一百一十五天的绥西抗战

蒋介石以中央政府军委会委员长的名义，于一九三八年冬，在陕西武功亲自主持了西北、华北高级将领会议。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也应召出席。会上重要决定之一，就是升任傅作义为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在绥西五原成立副司令长官部，统一指挥驻绥西部队。傅部董其武师、孙兰峰旅、炮兵团、王子修部（原七十三师闫锡山不许带走）等，也自晋西北于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开赴五原。孙将军已是傅作义兼军长的三十五军下辖之三十一师师长，另两个师是一〇一董其武师，三十二袁庆荣师。除三十五军外，

傅还统率归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指挥的邓宝珊、马占山、张励生、门炳岳等军及白海风等师，共约六万余人。为了统一政治认识，研讨战略战术，加强民众组训，在河套百川堡开办了抗战建国讨论会，所属部队排以上军政干部分批参加，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实现了傅作义在绥远省“党政军一元化”的夙愿。无疑，从此，蒋介石控制傅部，也日趋严密。原来在晋西北、河套地区那一种蓬蓬勃勃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逐步被扼杀。代替它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蒋介石还派其侍从室主任秘书张彝鼎中将，为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老牌CC分子苏寿余为少将副主任，以及上校衔特务李俊秀、胡肇封等一帮人马，都蜂拥而来。原三十五军的政工人员，大都被送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兰州西北训练团受训，实际就是审查。如原七十三师政治主任彭光祖，在兰州受训后就被扣留，原一〇一师政治主任、陕北公学学生康保安在重庆受训时，被迫填了加入三青团、国民党的两张申请书，其它进步同志的遭迁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也到河套，以种种手段迫令傅作义清党。有功于抗战的共产党人、进步青年潘纪文、鲁志浩、王怡然、冼依、李刚、梁建一、王庆臻、黄剑拓、冉志恒、左青、李忠等几十名同志。在坚持工作到五原战役胜利后，被迫由傅先生发给护照、路费，以开会名义，经石咀山至三边返回了延安。但这些同志们坦白、磊落的襟怀，艰苦朴素的作风，像一粒粒待发的种子，深深的埋藏在我军广大官兵的心中。孙将军至

今谈起来，还是情感凝重，感慨系之。

下面略述绥西作战情况：

反攻包头。傅作义部，一九三九年在河套地区五百里平原上经一年的整军经武和补充训练。其嫡系的步、骑、炮兵，总计已达三万余人。兵强马壮，粮广弹足。已是一支可观的部队。地方上，在绥远省各级动员委员会的努力下，民众有了组织，治安也比较安定局势是大好的。日寇只是在包头以西，北自高台梁经大生泉、颠波寺庙到黄河南北约二百华里为线，除了偶而有局部战斗外，前线基本是安谧的。

为了配合湘北大战，吸引华北日军于西北战场，以减轻南战场的压力，蒋介石曾令傅部东攻固阳之高台梁据点。但傅将军以广阔的视野，无畏的魄力，认为进攻区区之高台梁，吸引不了敌人的主力，于是主动请缨，不怕牺牲。一定要反攻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包头市。那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塞上荒原，朔风凛冽，雪花如席。气温在零下四十度。傅将军率主力董其武的一〇一师，孙兰峰的三十一师，袁庆荣的三十二师，及门炳岳、马腾蛟、徐子珍、马秉仁、刘振衡、王子修等所部，总共约三万余人，由孙兰峰将军担任攻城总指挥，以安春山团为攻城突击队。夜行昼伏，在乌拉山前后向包头市分进合击。此次大战，击毁敌汽车一百多辆，打死打伤敌人三百余人，毙敌联队长二名，生俘伪团长肖振瀛及伪军一部，虏获大量军用物资。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我军的胜利信心。在战斗中，包头市人民抬伤员、

送茶饭、当向导、运子弹之事不可胜记。不少伤兵还在包头人民掩护下治愈伤患后，又送回河套我军。其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转战绥西，反攻包头一役，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弱胜强的一次胜利的尝试。但日寇是不甘罢休的。他从同蒲、平绥线，七拼八凑了三万多人、汽车千辆，伪蒙军六个师，由二十六师团长黑田生德中将和骑兵团长小鸟吉藏等，统一指挥，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疯狂的向河套反扑。妄想一口吞掉我军。敌人这一行径，早为傅部所预料。傅作义将军，当即在五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针对当时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形势，制定了“找胜利，避不利”的作战方针。避其锋芒，避开交通要道，避免与敌主力决战。收回拳头，诱敌深入。在黄河北、阴山南的五百里河套与敌周旋。采用了分割围歼，打其侧翼，阻击、伏击等战法。各自为战，扑捉战机，集小胜为大胜。决不挂免战牌，决不西逃宁夏。为了达此目的，在部队中抽出部分政工人员，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情报，威胁敌侧，袭扰敌后，截敌粮弹。叫敌人来不得好来，走不得好走。旧历除夕的前一天，战幕在西山咀、马七渡口、乌镇三个据点拉开。董其武师在乌镇冒着敌人的陆空联合攻击，掩护全军，向黄河边沿运动。夜晚诱敌至折桂乡，由三〇三王赞臣团，把敌人狠狠的顶了一下。在堡子里全歼攻入之敌。当敌汽车部队尾追我军至狼山湾，石板箱屹旦时，我军已沿着黄土拉亥渠畔，转进至河南岸李奇屹旦了。叫敌人疲于奔命，捉不着我军主力。傅将军以其远见卓识，向孙将军面授

机宜，让孙率三十一师，秘密行动，人无声，马衔枚，埋伏于敌侧狼山偏东之乌拉壕两米多高的芦苇丛中，瞅准时机，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在三女店、黑石虎之间，我军又揪住敌人一侧，烧毁敌汽车十余辆，毙敌百余。后我军旋即转进至狼山，待机再战。从而受到傅的嘉许。坚持七十多天。使敌之实力，消耗殆尽，敌之主力，疲于奔命。达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削弱敌人的目的。

五原大捷。五原为塞上名城，它面黄河，背阴山；渠道纵横，沃野无际；东襟绥包，西控宁夏。是西北重要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午夜，反攻五原的第一炮打响了。部队极端秘密地渡过义和渠，穿十大股，以奇袭的行动，兵自天降似地夺城关，占隘口，抢占制高点，封锁敌退路。暴风雨般的轻、重机枪、大炮和战士的冲杀声，同时扑向各个预定目标。敌虽睡梦初醒，但也拼死抵抗。经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司令部等七个坚固据点，均已攻下。敌指挥中枢失去作用，防御体系全线崩溃。在五原平市官钱局，敌人精心修筑的坚固据点里，敌寇犹作困兽之斗，拒不投降，妄图守点待援。孙将军临危不惧，勇冠三军，亲赴前线，冒着十二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从容指挥。部队长王雷震、安春山等，身先士卒率部强攻据点，当地群众手执铁锹勇敢参战，送茶饭、救伤员的男男女女，在炮火下来回往返。副指挥袁庆荣在指挥作战中，光荣负伤。团长贾晏

如、营长赵寿江英勇牺牲。赵营仅余六人，仍严守阵地，沉着应战。李良才连几乎全连牺牲，没有一个后退一步。在对敌分割包围，猛攻狠打下，敌军阵地一片火海，七零八落。至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也就是战斗开始后的第四天下午，日伪军在五原新旧两城的各个据点，已全部被摧毁，敌人分别被歼灭。五原街头，敌尸横陈，一群群俘虏在老百姓的怒目而视下，被押解到集中地。染遍战士鲜血的红旗，在我军占领后的阵地上舒卷。

五原大战敌中将指挥官水川伊夫、金腾少将、大齐大佐被击毙。全部日军被歼灭，伪蒙军六个师，王英伪绥西联军，日特务机关、宪兵等全部就歼。毙敌三千余人，生俘三百余人。获大炮十六门，各种枪枝几千枝。仅安华亭旅就缴获枪栏千余条，俘获大量物资。大汉奸全喜亭亦被我就地正法。当时国民政府各部委，各战区，各团体，海外华侨、学校、知名人士等等，纷纷慰问。贺电、锦幛、红旗、贺函、赞词，如雪片飞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还不远千里，亲自到河套前线慰问。国民党政府隆重的授给傅作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连蒋介石也以手启电，称誉傅部“部曲同心”、“开抗战反攻之先河”。但傅将军并不介怀于个人名利，而是功不自居，归美部属。对所颁青天白日勋章，谦辞不受。向当时的中央政府，上了著名的谦辞勋章电。电文中有：“我军反攻绥远，望见城中灯火而不能达；奇袭包头，既入城矣而不能守。绥远父老箪食壶浆，以迎我师，而不能慰其心”的名句。孙老虽年已耄耋，但提及往事，是以“高山仰止”

的态度，十分尊敬和爱戴傅作义将军。他常说："生我者父母，救我、教我者中国共产党"，而"领我走上爱国之路的是傅作义先生。"提及董、孙二将军在五原大捷的英雄业绩时，孙老谦虚的笑笑说："五原大捷，包括反攻包头，绥西之战，历时一百一十五天的战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是绥远各族人民全力支持抗战的胜利；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大青山根据地，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军兵力的结果；是傅将军忠忱爱国，坚决抗日的精神体现。当然也是和全体爱国官兵流血牺牲所分不开的。至于董其武将军和我以及袁庆荣将军等，只不过是执行中国人民的意志，追随各部爱国官兵之后的普通一兵而已。没有以上的种种因素，任何胜利的取得，都是不可能的。"孙老的话，是谦虚的，更是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八、抗日胜利——"9·19"光荣起义

五原战役后，傅作义将军在原有部队基础上，报请扩编为三个军，即傅自兼军长的三十五军，暂三军由孙兰峰任军长，暂四军由董其武任军长。袁庆荣晋升为中将师长，安春山、郭景云、王雷震均提为师长，团长王赞臣晋升为副师长。有关师、团、营、连、排、士兵均有晋升，并论功行赏，或授以勋章（孙老被授以宝鼎勋章）奖章。当时兵力充实，军心振奋。傅作义将军提出的"完成反攻准备，迎接艰苦战斗"的口号，继续整军，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孙兰峰将军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时期里，又相继担任过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第十二战区抗战胜利战区受降官，张垣绥署骑兵总指挥，第十一兵团中将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要职。笔者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以外交联络官名义，奉命随受降官孙兰峰将军（大同有特派员陈光斗、王雷震二将军参加）。在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地接受日本残余部队的投降。当时孙将军胸佩勋章，在集宁车站大厅就座，严肃地教训来自大同迎接孙将军的日本少佐，要他认识侵华罪行。特别是在大同饭店，日本留守军官头，宴请孙将军的情况，更是历历在目。当孙将军发现有妓女侍酒时，认为是受了极大的侮辱，顿时怒火中烧，以曾为抗战而受伤致残的左脚，踢翻满桌酒菜，大骂日本大佐混蛋、拂袖而去。这凛然正气，受到在场的人们赞扬。据知从北伐战争到八年抗战，孙将军曾九次负伤，鲜血洒遍了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他以自己一贯的刚正不阿的精神和肝胆照人、勇于自我牺牲的模范行动，为广大官兵树立了榜样。“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我们对久负盛誉，为士兵群众所亲切称道的“孙将军”，是非常景仰的。

历史总不是笔直的。孙老曾不胜感慨地说：“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蒋介石错误的戡乱政策，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同室操戈，箕豆相煎的可悲局面。而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蒋介石的这一可耻政策。那阵子，在蒋管区，是万家墨面，路有饿殍，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我们的队伍是在农村为地

主阶级看家，在城市为豪门和贪官污吏保镖。使千百万人民在饱受八年日寇蹂躏之苦后，重陷于国民党发动的战乱饥荒之中。”每念及此，孙老是倍加痛心的。孙老继续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以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感召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使我和董其武将军一起，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傅作义将军率部于北平起义之后，断然拒绝了蒋介石、闫锡山派其军令部长徐永昌两次来绥，以分化、破坏的伎俩及高官厚禄的引诱和拉拢。在傅作义将军的亲自组织领导下，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绥远省率部通电起义。从此，结束了我们为反动的戡乱政策效命的可悲历史，光荣的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毛主席在亲自草拟的给“9·19”起义通电的复电中，亲切的勉励董、孙所部军政人员要：“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还受到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来电勉励。孙、董二将军都被邀作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董因工作需要请假）。孙老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缅怀风采，铭记教益，几十年来如春风化雨，滋润和激励着孙老在共产党指引的新长征道上，追随党和人民，风里雨里，已胜利的走了三十六年。孙老现已九十高龄，身体是有些今不如昔了，但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对祖国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表现出坚强的信

心。一九八五年元旦前夕，孙老高兴地对笔者说："像我这样年已九十的人，已经亲眼看到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共产党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辉煌成就。作为一个老兵，感到非常自豪。台湾当局应审时度势，捐弃前嫌。在'一国两制'的精神指导下，早日实现大统一、大团结，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愿望。那才是百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兴旺发达，持续不懈为之奋斗的大目标啊！"笔者作为曾长期追随傅、董、孙诸将军，解放后又工作在董、孙二将军身边的一员来说，聆听了孙老的一席话，再一次温习了爱国主义的一课，深刻受到了教育。我衷心祝愿董老、孙老长寿。祝愿他们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有历史性贡献。

孙将军起义后，历任原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历届委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为人民事业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古人说："老树春深更著花"。在革命大家庭里，孙老是老当益壮，生活感到异常温暖。特别是两个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的英明政策，使我们国家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兴旺发达的大好景象，因而使孙老更是常常想着党，想着人民，想着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凝结他一生治军、从政的历史经验，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共

产党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一定会更加强大。”

在去年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9·19”起义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孙老还做了录音讲话，并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以《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为题的文章，体现了孙老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关心祖国统一的思想。

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

·孙兰峰·

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指导下，著名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引导董其武将军和我以及原绥远省傅作义将军部下的广大官兵、军政人员，于绝境逢生，弃暗投明。毅然举行了光荣的原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从而，人民免涂炭，士兵免流血，家属免失散，结束了我们的部队在所谓“勘乱”战争中。在农村为地主阶级看家，在城市为豪门和贪官污吏保镖的耻辱历史。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我们开始走向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里程。兹值“九、一九”和平起义三十五周年的纪念的日子，我们热烈欢呼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欢呼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重大发展的胜利，并由衷的向中国共产党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礼。

参加原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的广大官兵、军政人员，在走过的三十五年的里程中，在各级党委的耐心教育、亲切关怀下，绝大多数人，政治思想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工作中，或者是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都和广大群众一起顶风雨，战险阻，接受考验，做出成绩，甚至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古人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广大起义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风风雨雨，坚持战斗，没有辜负党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也没有违背我们光荣起义的革命初衷。作为领衔签字起义的董其武将军和我自己，都十分感谢共产党的深厚恩情，并向为人民事业劳绩卓著的全体起义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谢意。更希望大家牢记胡耀邦总书记“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坚持四项原则，努力做好工作，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大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党中央对傅作义将军、董其武将军领导的起义官兵和广大起义的军政人员，给予深切关怀、很高评价，不少的同志已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仍担任着重要职务，委以重任，这时十分令人感奋的事。

现在，我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为人民效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党没有忘记我，仍给我很高的政治荣誉，继续担任着政

协全国委员会的常委、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对我十分关怀，经常问寒问暖。中央来内蒙古的领导同志，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顾委高克林，中央统战部童小鹏、江平、洛布桑等同志，用极其热情的语言鼓励我，抽出时间亲自到我的住所看望，使我愧不敢当。因为生我者父母，救我、教我者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也没有起义人员的光辉前途。但我给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三十多年来的道路，虽然也经过了一些小小曲折，但我始终不渝的认为，“九、一九”率部起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一光荣历史，坚定不移的走好这条光明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坚决进行了拨乱反正，作出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了解，抓紧解决。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爱国人士，也同样在政治上得到了适当安排，生活上得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原绥远“九，一九”光荣起义，标志着党的“绥远方式”的光辉胜利。今天我们要争取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长期分裂的痛苦。同心协力，振兴中华，是海峡两岸人

民和爱国侨胞的共同心愿。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阐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从一九八一年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九点内容，到最近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受到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正如三十五年前人民拥护“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一样。当然，有一些人会产生一些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原绥远省起义前，我同样也是产生过这样那样的疑虑，解除疑虑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用事实说话。欢迎在台湾的同仁们、同学们，来大陆观光考查，探亲访友，祭祖扫墓，而且保证来去自由。我深信，只要是炎黄子孙，谁都愿禹甸同心，共振中华的！

值此原绥远省“九·一九”光荣起义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我愿再次向在台故旧，表达衷心的思念之情。“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希望远方亲人，要度时审势，在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中做出贡献，写下为后世子孙所铭记不忘的光荣历史。（此文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内蒙古日报》第二版）。

〔作者简介〕

白震，男，现年六十六岁，河南省唐河县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曾追随傅作义将军先后在董其武、孙兰峰所部做抗日部队政治工作，并任孙将军领导的第十一兵团（后改为第九兵团）司令部少将处长，在共产党、毛主席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英明决策教育引导下，率部参加了由傅作义将军亲自组织并有董其武、孙兰峰二将军领导的原绥远省1949年“9·19”光荣起义。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内蒙政协文史委员。

王铭章师长略历

王师长名铭章，字之钟，四川新都县人，出生于一八九三年。由四川陆军小学校入陆军部四川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排连营团长。民国十二年任旅长。民国十四年升任四川陆军第十三师师长。民国十七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嗣兼成都卫戍司令。民国二十二年任川陕边区左翼“剿匪”纵队司令，指挥第一师、第四师、第五师、独立师，第三路独立旅各部。民国二十四年，奉调赴峨山受训，授陆军少将，旋改任陆军二十二师师长。民国二十五年率部入陕甘“剿匪”，因功授陆军中将，给四等云麾勋章。民国廿六年率部赴晋抗战，旋调赴津浦线北段临城、滕县等地抗敌，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在滕县据城死守殉国。

摘自新民报中华民国廿七年三月廿二日

王铭章师长阵亡的前后

何　燮　荣

抗战初期，在滕县保卫战中，我随王铭章师长在城内东街指挥巷战分手后他因只有少数士兵，不能抵御日军的攻击，乃即率同师部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辛甲等及一些卫士转赴西门，企图在那里掌握到一些部队后，继续指挥作战。殊知还未接近西门时，敌人已完全将西门占领，正据城楼向我官兵四面扫射中。

不得已他们一伙又转向北门，在西、北门之间登上城墙，判断形势，但受到敌人侧射，炮弹飞来，王师长腹部中弹，于是几名卫士只好用绑腿把他系住缒下城来。几名卫士跳城下来搀扶他，这时已占领西关之敌人，又向他们扫射，王师长又次中弹，身边卫士除一人外，当即全部阵亡。参谋长赵渭宾亦阵亡。这个仅有的卫士眼见师长阵亡，立即把他的私章摸出，脱下他的大衣，把他掩盖后突围出来。这个卫士和我们见面时，距王师长阵亡大约仅有一小时余。王师长阵亡时，年仅四十五岁。

孙震总司令奉命寻找王铭章师长遗体，即派了几名得力士兵，潜赴滕县城郊探询情况。由于我军在山西时，闫锡山居功诿过，指责川军作战不力，军纪败坏，因而在转入山东战场时，上下相诫，严整军纪，政工人员也大卖力气，所以在滕县境内，军民关系极好。当这几名士兵化装潜入滕县城时，群众都极愿相助。因此当我军突围后，由红十字会出面各处掩埋尸体，在掩埋中，发现一具尸体，其形象显然与众不同，料定必是一位指挥官员，故对掩埋的地点，记得比较清楚。入夜后，就由几名红十字会人员带了几名士兵，将尸体悄悄挖出，乘夜抢运，把忠骸运回徐州。

发掘尸体时，距王师长牺牲时间已隔半月左右。运回的尸体已近腐烂模糊。但经众人相识辨认，其体型特别是他镶的假牙还在，又还有金质袖扣一颗，证明寻回的尸体，就是王铭章师长的遗体。

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王师长的殉国通令褒奖：

1、追赠为陆军上将；

2、明令褒扬，举行国葬，拨款一万二千元治丧；

3、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4、所有随征阵亡将士从优议卹（少将参谋长赵渭宾八千元，上校参谋长邹慕陶、团长王麟各五千元，依次均从优议恤。）

由于王师长之壮烈牺牲，为抗战以来所鲜见，对民族气节和前方士气都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所以当其灵柩运回四川时，所经之处，军政机关及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自动前往祭奠迎送，极为哀痛。遗体在其原籍新都安葬。该县办有“铭章中学”，成都市少城公园内树立铜像以作纪念（后被拆除）。

附录（一）：

1、滕县保卫战结束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呈军委会陈述经过：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呈蒋介石报告川军邓、孙部死战滕县经过，原电云：“此次我廿二集团军邓孙部，自本月十四日拂晓起于滕县以北界河东西地区，受优势敌军之压迫，该军奋勇抗战，是日于黄川北山等处予敌以劫伤后，卒被敌炮火摧毁阵地，我警戒部队亦有牺牲。当晚于普阳山前进阵地及右翼龙山，中间界河、左翼大、小坞各主要阵地，予敌伤亡尤大。十五、十六两

日我坚守普阳山、龙山、北沙河、大山诸阵地，在敌步炮空不断轰炸下作殊死战，前仆后继，牺牲惨烈。至十六日晚，普阳山、龙山两处各约一团之守兵，全部殉国，阵地始陷。同时北沙河守兵被迫退守滕县，左翼小坞我军亦突围加入滕县守御，苦战撑拒。迄十七日下午五时半城垣遭摧毁后，被敌突入，激烈巷战。我官兵除少数冲出外，余均洒尽最后一滴血。此十四日至十七日该部抗战经过之概略情形也。计是役伤亡官兵不下万人，阵亡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象贤、邹慕陶、团长王麟等，负伤师长陈离、旅长吕康、王志远，副旅长汪朝廉等，其余团营以下伤亡人数尚在清查中。查该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官兵浴血苦战达三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适时赶到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除死事诸员另案请恤外，特送饬即将收容各部开赴钧电指定之△△△△。惟该部残破之余，人员装备损失甚大，非经过相当时间之整顿补充，难于使用。职默查该部官兵，不屈不挠之精神，曾不因失败而稍减，且报国之忱，更加坚强，如蒙钧座鉴其忠忱，予以补充接济，不独该部奋发图报，誓供驱策，亦足以励来兹也。谨电呈察，伏乞示遵。职李宗仁叩马参三徐印。”

王铭章师长抗日阵亡寻尸纪实

——卫士李少昆回忆

一、我和王铭章师长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王铭章师长由四川德阳出川抗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徐州外围滕县战役中，我是王师长的警卫副官，率领师长卫士担任保卫工作。

二、滕县战役概况：

我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由简头集和砀山附近出发进驻滕县，师部驻西门外电灯公司。日军向滕县进迫，于三月十二日师部移驻城内。此时日军已近至县城郊区，集团军总部严令我师固守县城。自十五日，到十七日拂晓，日军大举攻城。开始以炮兵及飞机轰炸炮击，重点在东门。当时我师部队尚未集结，正陆续向县城转移中。师长在此时能使用的部队仅严翊一个整营及师直属部队。严营与日军激战，严负伤，师长率直属部队亲临现场指挥。入暮沉寂，增援部队王团到达，与敌作攻防战。十六日王团长阵亡，吕旅长负伤。十七日拂晓后，已开始巷战，逐街逐房争夺。城内经过日军轰炸炮击，几已夷为平地。午后师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左臂中弹。此时师长曾亲至电台嘱廖台长发电求援，並要求

增援部队须经北门独角山前进……。至午，部队死伤惨重，各师直属部队已使用殆尽，旋又急电求援。至黄昏，敌已由南门迂回至西门，大事已不可为，旋又发电一通，叹援兵不至，哀战况垂危，唯一死以报孙总，以报国家。电台毁了，接着后退，被迫撤至西门口城壕附近，敌在城楼居高临下，王师长身中两弹（腹部及生殖器附近）伤情严重，血流如注，仍大呼“抵住，抵住，死守滕县！”我取出白药已灌不进口，我也惊呆了，敌人还在城楼猛射。入暮后敌入射击转弱，我以手拭王师长，觉得身手已渐凉，我想把他背走，王师长又胖又重，这时只有我和卫士陈洪恩（陈也已负伤），敌巡逻部队不断出现，並乱打枪，不得已我把尸体移至壕侧，取出他的私章，拣了几块烂木板盖住，我和陈流着眼泪离开了王铭章师长的遗体，寻找部队去了。

参谋长赵象贤，副官长罗辛甲也在壕沟附近阵亡的。

三、寻尸经过：

回到总部，把王师长阵亡实况呈明。旋奉令率三人返回滕县城郊寻找尸体。到了城郊，因敌人警戒森严，难以接近，就隐藏在农民陈召福家中，又结识了居民王泥工，经过三、四天仍无法靠拢城郊，钱也用完了，刘、王二人及附近农民听说是找王师长尸体的，都表示愿意协助。于是，我立即返回总部，将情形据实呈报。第二次又率领六、七人化装并暗藏武器，再返滕县附近。住刘召福和附近农民家中。经过五、六天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

由我和同行人员並伙同农民至城边壕沟，当时我亲手 掩 盖处，把土挖开，逐一检视。先发现赵参谋长尸体，移放一边，再继续找，我一眼发现了师长的衣服，仔细翻视，确实是师长王铭章无误，随即用土把其他尸体埋好，农民们又把赵参谋长埋了。他们不同意同时运走两具尸体，运走也确实困难。我们只好把王师长尸体连夜抢运回徐州总部（尸体基本完好，因天气还尚冷，局部略有腐烂），然后又经郑州、武汉、运回成都，我都参加护送。

四、王师长与滕县军民关系的回忆：

当我寻尸到滕县附近农民家，群众听说了都十分悲痛，並发誓定要把尸首找到。若无刘、王二人和其它群众的协助，要想接近城郊是困难的。在我回忆中不能不对老乡们万分感激，这也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军民关系。

五、结　　尾：

四十多年了，我是个文盲，又无记载可供参考，仅凭记忆，差错难免。但我还是很乐意拉拉杂杂地回忆出来，吐出了四十多年的积愫我也就万分愉快了。

（编后附记：上述三篇文章及附录，均系当事人的自述。文中观点及材料均尊重原述未作改动，三篇文章中个别细节的异同，皆亦仍其旧。附此说明。）

何一萍同志事略

·董一博·

何一萍同志，又名何冰如，河南省孟县人。一九三七年秋初，由河南省委派往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分配在枣庄矿区做地下工作。

是年十月，边区特委改组，郭子化同志任书记，张光中同志任组织部长。何一萍同志任宣传部长，陶鸿盈、褚耀彬等同志任委员。此时，日寇在我北方已攻陷平、津，渡黄河，占济南，侵及两下店。鲁南人民忧痛国破家亡，同仇敌忾，渴望建立自己的武装，英勇杀敌！我鲁南特委为了便于发动群众，组军抗战，决定“以他人的名义，组织我们的武装”。何一萍、朱道南等同志参加并领导了以旧军人杨士元、民主人士孔昭同为主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组军抗日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边区特委领导枣庄工人开展增资运动。何一萍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组织枣庄地下党，团结广大矿工，争取中间力量，向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资本家全部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也是我党在枣庄历次工人运动中一次最完满的胜利，广泛地扩大了党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春，特委决定成立“鲁南中心县委”，何一萍同志兼任县委书记，开展滕、峄、临、郯、费等县的工作。三月十八日，日寇疯狂地侵占我枣庄，何一萍同志和地下党全体同志领导矿区工人及广大群众组织了有秩序的撤退，并在峄县西北之墓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武装。四月郭子化同志派我和张光中同志晋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司令李明扬，取得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合法名义。五月一日，“鲁南人民抗日勇义队”正式成立，张光中同志任队长，何一萍同志任政委。滕、峄、临、郯、费、沛等县的抗日武装会师于墓山。

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处在敌后的伪顽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滕县国民党地主武装申宪武以抗战为名，行反共反人民之实，网罗流氓土匪、地主恶霸，勾结日伪，破坏抗日，奸淫、掳掠，鱼肉人民，在滕东山区称霸一方。人民群众惨遭荼毒，无不视为虎狼蛇蝎，纷纷要求我党我军为民除害，为了拯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我特委决定对申逆进行讨伐，组织了以童陆生同志为首的讨伐申逆指挥部。“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是这次战役的主力，何一萍同志是当时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军事组织上的非凡的才智和战斗指挥上的英勇果断，与战士同甘共苦，甚为感人。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我军全线出击，猛烈击退了对我军形成包围的来犯之敌，直逼申顽刘广田部的老巢—东江。但是，在初战告捷的数日之后，何一萍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前沿阵地侦察，不幸中敌弹，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何一萍同志幼年丧父，家境贫困，母亲以针线活路维持生

活，培养他读书。一萍同志从幼年就是家中的半劳动力。及长，就担起了家庭重担。尽管他聪敏勤奋，刻苦学习，但贫困迫使他中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不得不去当一名小学教员。他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用教员的微薄收入供奉母亲。在学校，他是个好教员；在乡里，他又是个好孝子。因调往山东工作，无法供养母亲，当他以无限慨叹离开家乡时，母亲却慈爱地抚摸着他，用果断的言词宽慰他说，国亡家破，现在不是顾家的时候，要紧的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土。一萍同志每每念及母亲的高风亮节和大义精神，总是默默遐想，久久不能平静。

一萍同志为人明达勇毅，刻苦朴诚。对同志谦逊和祥，对工作一丝不苟，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而对缺点错误，总是首先检查自己应负的责任，并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生活俭朴刻苦，到山东工作后，每月虽仅有三元生活费，还千方百计节约下来，救济贫苦的工农同志。

一萍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和学习坚定无畏的精神以及待人接物挚诚感人的革命魅力，成为人们倾倒敬佩的榜样。常见他两只眼睛熬得布满血丝，却仍发奋伏案工作，偶尔伸伸膀背以驱散疲劳。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更是这样。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他这种忘我革命精神无不衷心敬佩。尤其他那诚挚的阶级情谊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他牺牲后，同志们无不哀惜垂泪，许多同志抚摸着他的遗体热泪滚滚，痛哭失声，深感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战友。

一萍同志牺牲的第三天，在战争风云弥漫的南塘，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当时的花圈挽联挂满了会场，悲壮激情的挽词，凝聚着一萍同志的革命精神。

一萍同志安厝在滕县东南之南塘以南约二华里处，每年多有战友扫墓，青年儿童往奠墓碑。其壮烈事迹和革命遗风在我鲁南人民群众中闪耀着永不泯灭的光辉。

现在忆及他的音容笑貌，为党为人民献出了他的青春年华，不禁长思向往：

墓山有灵长恨千古疆场，洒血大业来成身先死；英灵回眸当惊六月南塘，飞雪青史永垂贯长虹。

跟随陈毅军长转战山东

华东二级战斗英雄、二等乙级
革命残废军人　　宋晓亭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跟党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士、老党员，我心情格外激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四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要把陈毅军长在山东留下的足迹，创建的光辉业绩作一简要回顾，以表达对陈毅同志的怀念。

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山东的。他走遍了沂蒙山区，他的足迹也留在枣庄、滕县（原滕沛县）的徐庄、善堌固、沃里、马村、柴胡店、宋村、马坡以及微山湖畔。陈毅同志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接着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和山东主力部队合编成山东野战军，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帅了山东的人民武装。那时我在山东野战军工作。陈毅同志曾三次接见我，鼓励我，后在华东野战军，当我为人民解放战争又立下了战功时，他奖给我终身携带的自卫手枪。每一回忆起在那南征北战岁月里，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令人崇敬的陈毅军长的形象。

一九四一年春，我由王有持、马宗沛和周永孝同志的介绍，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和新开辟的游击区进行疯狂“扫荡”、“蚕食”，筑碉堡、建据点、修公路、挖

封锁沟，妄图阻止我抗日部队的活动。在这环境恶化，生活艰苦的情况下，组织上多次派我到盖村、大坞、望冢、城关、级索一带的日军据点与我军联络员联系，取得了重要情报，不失时机地打击了日伪军。

一九四四年，我们由地方部队升级为鲁中南武工队。我们武工队，也叫短枪队，每人备有长短两种武器。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顽占领军，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们也严惩了一批死心踏地投靠日寇的汉奸顽敌，同志们把这种活动叫作“枪打出头鸟”，也就是说谁出头破坏抗日，屠杀革命军民，就先除掉谁。当时这种活动对打击威慑敌人，振奋群众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我们又升级为华东第三野战军。这时陈毅军长和鲁南行署主任李乐平亲自视察我部队工作。首长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看到了，为了更好地迎接这个胜利的到来，为了当前形势的需要，决定建立一支骑兵，建立骑兵，就必须有军马，可是这军马到哪里去弄呢？首长说，就是给你武工队要，经首长研究决定：夜袭济宁南郊的日军军马场。这个马场离敌人的货场不远，货场南面有一个碉堡，这个碉堡里有日本人一个小队，他北可以看货场，南可以监护这个马场。马场占地近百亩，北、东两面是墙，南、西两面是铁丝网，四周环绕一条水沟。马场大门朝西。这里不仅是敌人喂养放牧军马的地方，也是敌人训练军马的场所。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因为我们地理熟悉，又早有准备，在深夜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消灭了敌人，缴获战马七十余匹。老八师成立了骑兵连，连长是刘杰同志。后来在对敌作战中骑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九四五年，在高粱晒红米的时候，奉陈毅同志的命令，我军攻打闫村，在追击穷途末路的敌人时，我骑兵驰骋战场，其势无挡，生擒活捉了申宪武，为民除了一大害。我们部队在滕县以东，由王吉文同志亲自指挥，先后攻占了羊庄、土城等伪军据点。有一次，我和一班长郭继胜同志一起与日军进行了肉搏战，我一口气刺死三个日本兵，自己也负了重伤，在沃里村住进了二分院（王永昌同志家里）。当我的伤基来治愈，即马上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为了和平、民主，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订了双十协定。

停战后的政治谈判，是我党、我军同美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华东地区派出了参加徐州、济南、淮阴等地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的代表，陈毅同志也亲自出马，在临城北城墙之下与国民党的代表陈诚谈判。为了和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他从没考虑个人的生命安危。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在美帝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蒋介石调动了全部兵力，向我华东、华北、中原、东北各解放区疯狂进攻。凭着他那暂时的军事优势，妄想一举摧

毁我解放区。当时蒋介石数百万人马，在日伪顽的接应下，向我华东解放区逼近，妄图以重兵打通津浦铁路进军华北。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陈毅同志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根据山东的地形、地物，掌握了国民党疯狂进攻的特点，提出了“扛龙灯、爬山头”的战斗口号，增强我军的运动性，迷惑了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运动。

在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上连战连捷。宿北战役歼灭敌军整编六十九师，击毙敌师长戴之奇；在鲁南战役歼灭敌二十六、五十一两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莱芜战役歼灭敌四十六、七十三两个军，所辖七个师，生擒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陈毅同志在指挥作战中，随时寻找敌人的弱点，利用我军的优势歼灭敌人。

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阻击沿津浦路北上之敌，一方面分击敌之主力，还出其不意地去打击敌人的两翼。一九四七年四月，在解放泰安城的战役中，首先要肃清外围，一连连长郭继胜亲自指挥，命令我一排占领岱庙附近的碉堡群，我带领全排战士，进入阵地后只用了二十分钟，即智取了十九个碉堡……很快攻占了泰安城。全歼敌军整编七十二师……。

在解放宁阳县城时，我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只经过两天的战斗，就消灭吴化文部队的一个团。

我们部队出奇制胜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对山东解放区实行了所谓重点进攻。蒋介石在徐州

及其附近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的兵力，并以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十一师，新五军的第七十四师作骨干，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从临沂到泰安为一线，以王牌军七十四师为中央突击兵团，用六个整编师为左右两翼，分三路北上进攻……。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因经常受蒋介石的“嘉奖”，骄横不可一世，当它抵进到蒙阴东南孟良崮地区时，陈毅同志命令我部队突然插入敌人两翼之间。五月十三日，孟良崮战役打响了，陈毅同志亲临前线，调动千军万马，激战了四天，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敌七十四师，一向居功自傲的敌师长张灵甫当场被我军击毙。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吟诗颂反攻形势：

百万旌旗大展开，蒋匪到处成飞灰。空心战术今已矣，重点进攻安在哉？江汉飞信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陈谢挥戈下宛洛，聂杨立马薄燕台。关陕伐狐张天网，辽吉猎虎布火雷。谭许胶河收一战，苏鲁前线逼两淮。反攻形势见远略，动员群众见雄才。举国艳说新民主，土改狂潮遍地来。南天民变羽书急，准备审判蒋独裁。

敬爱的陈毅同志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亲自制订了战时党员守则十二条：

一、进攻在前，退却在后。

二、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

三、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

四、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

五、服从命令，完成战斗任务。

六、帮助指挥员，掌握部队。

七、帮助新战士提高战斗动作。

八、提高警惕制裁投敌分子。

九、加强爱民观念，遵守群众纪律。

十、不发洋财，严守战场纪律。

十一、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十二、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

陈毅同志英勇善战，智勇双全。一贯的爱将、爱兵、关心体贴同志。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出了卓著贡献，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作者简介

宋晓亭、男、1926年3月出生于滕县望家乡宋村。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革命军人。1941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4月入党。华东二级战斗英雄，二等乙级残废军人。现任滕县政协常委。

滕县抗日三老人

周乐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滕县名流、无党派人士、原福建省兴泉永镇守使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孔昭同先生，中共党员董尧卿，国民党滕县县党部书记兼县政府金库主任刘元甫三人，跋山涉水，奔走呼号，联络旧部和亲朋乡邻，组建了一支抗日部队——“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暂编第六师”。孔昭同任师长，董尧卿任旅长，刘元甫任师部秘书长。

为了进一步密切关系，精诚团结，他们三人仿效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形成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与无党派人士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率领部队在滕县东部山区，进行游击战，屡创日寇，受到乡里的称赞与敬重。

一九三九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抱犊崮山区之后，孔昭同令董尧卿和刘元甫携带大批慰问品，到一一五师部去欢迎慰问，并提出愿在一一五师领导下，共同打击日寇和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在罗荣桓政委的教导和八路军的影响之下，孔、董、刘

三人率领全体官兵，参加了八路军，在滕县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笔者奉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和罗荣桓政委之命，曾到该师二旅任参谋长，有幸和这三位同志共事一段时间，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深感他们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楷模。

孔昭同师长，一八八〇年诞生于滕县北柳泉庄，幼年聪明好学。十九岁时考入江北陆军学校，毕业后，历任连、营、团、旅长，福建省兴泉永镇守使，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等职。一九二六年解甲归里，移居滕县城内，开设了一座“同仁堂”中药店，以治病救人。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孔昭同先生在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感召下，愿为抗日救国贡献一些力量。于是他一面捐款、捐药，慰问驻防滕县国民革命军第41军的部队；一面联络旧部和亲朋乡邻，酝酿组建一支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日机轰炸滕县，孔先生的长子宪尧，三子宪刚不幸殉难。更加激起他对日军的仇恨，乃变卖家产，充当军费，身披“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带子，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为组建一支抗日部队而奔走不息。经一两个月的努力，初建了一支一百余人的部队，由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命名为“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委任孔昭同为副司令。这年夏季，孔昭同又被石友三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暂编第六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石友三奉命调赴河北省，石令孔昭同率部同去，为了坚持鲁南山区的游击战，孔昭同拒绝北去，当众撕毁石友三的命令，留在滕东地区，继续与日军作战。一九三九年三月，在龙山附近与日军遭迂，孔昭同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振臂高呼："尧纲两儿，其魂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日军狼狈逃窜，遗尸十余具。

一九三九年夏，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之后，孔师又直接配合一一五师进行了东江、白彦等战斗。孔师长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与纪律严明，十分钦佩。乃于１９４０年夏，率领全体官兵参加八路军，被八路军总部电委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司令。八月，当选为山东宪政促进会理事。十一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十一日病逝，享年六十岁。一一五师为孔老先生举行了隆重葬仪，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肖华送了挽联："孔老先生，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不惜任何牺牲英勇奋斗；齐鲁人士，应该学习，反投降、反内战、发挥伟大力量抗战到底"。

董尧卿旅长、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生于滕县沙沟村。因家庭贫寒，青年时投入北洋军中谋生。由于作战勇敢，屡被提升从士兵一直升至旅长。失意之后，归还故里。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郭子化、朱道南等同志。他的弟弟董一博是１９３１年的共产党员。在以上几个党员熏陶教导之下，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逐步转向革命。

一九三七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一支抗日部队，亦称“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八月，在郭子化指挥下的反顽战斗，遭受失败，滕东山区大部分被申宪武等顽军控制。为了应付当时的不利局面，乃率部与坚持抗日、反对摩擦的孔昭同合作，编为孔师的第二旅，与孔师并肩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张家山顶战斗中，左膀中弹，血流不止，仍坚持指挥，直到战斗结束。一九四〇春，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指示，率部与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合编为一一五师鲁南支队。由原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他任副支队长。后又调任山东抗敌自卫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特种纵队参谋长、炮兵师长等职。建国之后，调石油工业部办公厅任副主任。

董尧卿身体魁伟健壮，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诬为叛徒，身心受到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刘元甫秘书长，一九〇六年生于滕县南沙河镇中仓沟村贫农家庭，幼年在私塾就读，后入高小、师范讲习所，一贯积极学习，成绩优异。成年后，投效当时在福建任镇守使的孔昭同将军麾下，充当司书及科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了国民党。孔昭同弃甲归里之后，也随之回滕县，任国民党滕县县党部书记、县政府金库主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之后，刘元甫同志仍本孙中山先

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遗教，继续和中共地下党员李乐平、李叔铭、李景璜、王右池、董一博等同志交往，并给予一些帮助。七七事变之后，襄助孔昭同将军，组建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出任秘书长。多年追随在孔昭同身边，直至孔老先生病逝。

孔司令病逝之后，调任鲁南行署秘书。一九四七年，在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及快速纵队的战役中奉命带领民工支前，白天避开敌机轰炸，夜晚行动，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一九四九年，又奉命带领民工、民船，支援打舟山群岛的战役，沿途历尽艰辛，把民工、民船交付部队。一九五〇年，调任山东省民政厅秘书。一九五四年，奉命携带巨款，安抚外流到内蒙古喜挂图旗的山东人。一九五七年又奉命领队到青海慰问山东移民，均受到领导的表扬。

以后，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调任民革山东省委员兼秘书处长，现任山东省民革顾问。曾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刘老，现以八十之高龄，仍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工作。

〔作者简介〕

周乐亭，男，现年69岁，大学毕业，离休前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1944年著《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由大众日报社印单行本；80年代写了《罗荣桓同志初到抱犊崮山区》、《抱犊崮山区团结抗日之花》、《学习粟裕同志的精湛军事艺术》等文，分别在《星火燎原》、《山东文史资料选辑》、《大众日报》上发表。

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史略

党　史　办

“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是鲁南枣庄地区较早的一支抗日武装。

一年多来，我们走访了黄岱蚪、刘元甫、孔宪伦、张贻谋等老人；查阅了董一博、李作森、许在廉、王磊、朱道南、杜继贤、郭志远、朱平桓、张光中、李浩然、周乐亭、梁度士、纪华等同志的有关资料，对“自卫军”的来龙去脉有了初步了解。现整理成文，并愿以此就教于知情者。

一、组军枣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守。十月三日，德州陷入敌手，山东军阀韩复榘闻讯，弃城南逃。在此期间，外地逃难人士和一批批流亡学生，不断经滕县南下，而日机又时常来滕空袭，人心惶恐，形势紧张。

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滕县各界仁人志士及人民群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是年十月，滕文中学

校长杨士元（原为闫锡山部，落伍师长），与曾在福建任过镇守使的孔昭同及董尧卿、董一博就组军抗日一事几经酝酿协商。后从韩复榘处领了个番号，经第五战区批准，称以“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士元为司令，孔昭同为副司令，谭松艇（潍县人）为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孙殿英部师长，系盗慈禧墓之要犯）。大本营设在枣庄。大本营之所以设在枣庄，是因为：一是枣庄距津浦线较远，一旦战局紧张，可进入抱犊崮山区活动；二是有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驻守临沂）作靠山；三是在董尧卿、董一博的帮助下，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司令部主要设有政训处，招编处和联络处。联络处设在薛城。

政训处主要担负组宣工作，处长由滕文中学副校长朱银山（字景韩、东平县人）担任。其他领导成员，称政训员，有董一博、梁度士、纪华、张鸿仪等。下设组织部，部长张鸿仪，设宣传部，部长姚庆云，设民运部，部长梁度士，设总务部部长×××。中共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为了争取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纪华、李作森、李荣轩等共产党员到“自卫军”工作，并建立了秘密支部，纪华同志担任书记。先后在政训处参加活动的成员有滕文中学的教务主任史舜相、语文教师马曰川、外语教师史舜华、体育教师王冠周、美术教师魏向寿、物理教师李恒钊，学生黄岱岑、商景才、张国枢、孙德和、张贻谋、渠玉伦、刘思坦、徐冬和、马维汉、张鸿壁、孙延磷、孙延汾等三十余人；还有枣庄中兴职业中学的李作森、李荣轩、李克俭、李克恭、李吉祥、

李汝佩、张凯、白秀荣、金冠淑、戴维真、许在廉、汪国璋等；还有峄县中学的杨庆和、高世哲、徐鹏；峄县幼师的王磊、朱平桓等。招编处处长是董尧卿。

一九三九年底，“自卫军”已有五百余人，枪二、三百支。部队成份主要是杨士元的旧部下和滕、峄地区抗日情绪高涨的青年，另外还有些旧军队的散兵游勇。枪支来源，一、杨士元通过闫锡山，从山西搞；二、第五战区供给；三、当地乡农学校捐献，另外少数战士也有带武器入伍的。“自卫军”组建初期在大本营上军事技术课，每天坚持出操训练。后来，滕县“善崮农民抗日训练班”的军事教员于公也曾给“自卫军”上过军事课。

一九三九年九月。峄县的朱道南、刘景镇和朱玉湘（后叛变），以峄县五区为主，组织数百人，用土枪、大刀、长矛等武器，发动了邹坞乡农学校暴动。打死了当地的大恶霸、该校校长王效坤。缴获其部分枪支弹药，建立了拥有一百多人枪的抗日武装，命名为“鲁南抗日自卫团”，队长朱玉湘。组建后曾到滕县整训。这支队伍后来因供给发生了困难，经苏鲁豫皖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同意，暂编入以杨士元为主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序列中，但仍保持其独立自主权。当时朱道南同志，曾对董尧卿同志转告过特委的指示，说：“我们这部分人，利用杨士元的番号，编入其序列共同抗日。但保持独立性，部队调动必须经我们同意。另外，我们还可以帮助“自卫军”把政治工作建立起

来”。至此，邹坞暴动后组成的武装——“鲁南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就自然取消了。

二、北 上 泗 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特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枣庄支持工人开展“增资运动”，搞了一次全市的增资动员大会。“自卫军”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全部出动维持秩序，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为此，激怒了“中兴公司”的资本家。他们便向“第五战区”告状，说：“自卫军支持工人闹事，里面不仅有共产党、还有土匪，盗陵案的祸首谭松艇也参加了”等等。不久，“第五战区”电令“自卫军”，立即离开枣庄开赴敌后，并要杨士元押解谭松艇去徐州。三八年二月初，纪华、梁度士作了动员。大本营除留守处外，“自卫军”经马庙、北庄、徐庄、城前，北上泗水抗日。当部队行至滕县境内时，滕县的国民党“四、三”支队长申宪武，率百余人也参加了“自卫军”的行列，亦去泗水。杨士元委申以“自卫军”副司令之职。三月上旬，“自卫军”到达泗水东南张庄遂在土顽游击司令张显荣的防区内安营，准备与张合力抗日。时隔几天，张显荣部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企图吃掉“自卫军”。由于张显荣的反目，“自卫军”当即南撤至邹县城前。在那里一边整顿，一边宣传抗日。

三、杨 氏 逃 离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宣传队在集市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逢日军空袭，“自卫军”不及防卫，伤亡数十人；当地群众亦有百余人伤亡。“自卫军”出师不利，连连受阻，因此情绪消沉，思想混乱。在此期间，作为一军之首的杨士元不是安定情绪，鼓舞士气，反而心怀异端，暗中与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联系，欲将“自卫军”纳入国民党军队序列。为此，“自卫军”中的党组织和“民先”召开会议，决定即派员向特委报告。特委得此消息后遂派朱道南、刘景镇、纪华等同志去邹县城前，将邹坞暴动的峄县武装和政训处大部人员带了出来。军阀出身的杨士元，虽有抗日之意，但无敌后游击战的思想准备，更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当其投靠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时，便带着家人和滕文中学的部分师生去了徐州。尔后，到大后方去了。此时申宪武部亦离开“自卫军”去滕县冯卯。至此，以杨士元为首组织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四、整 编 易 名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滕县城沦陷，次日枣庄又落入敌手。这时由朱道南、刘景镇、纪华、朱玉湘等带领的从“自卫军”中

拉出来的人员，正活动在枣庄以北的山区一带。适逢“四川旅沪团战地服务团随鲁南中心县委也活动在这一地区”（四川“旅沪团”是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青浦县组织起来的。团长田拓夫、副团长易野原。下设：总部，负责人陈鲲；宣传部，负责人李浩然；还有财务部、救护部。全团都是四川人。其中只有李浩然同志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于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到达枣庄。开始，有二十余人，后来发展到六十余人。枣庄失陷后，该团也撤至枣庄北部山区）。遵照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旅沪团”与从“自卫军”中撤出的人员合并在一起，命名为“战地服务团义勇队，”活动在滕峄边一带。由于形势紧张，斗争艰苦，供给困难，“义勇队”中的政训人员，发生了分化。田拓夫带其情妇王建华等二十余人，经徐州到后方去了。体育教师王冠周带着十几个人，尾随其后也走了。滕文中学副校长朱银山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冀鲁豫。分手时坚持前线抗日的同志，怀着不满的情绪唱道：“到前线打敌人，大家在一起；到后方躲飞机，你们在一起……”。

同年三月底，根据特委指示：“战地服务团义勇队”所余近二百人与郭致远、邱焕文、褚稚青在北庄组织的四十余人，丛衍瑞从南泉带出来的十余人，在墓山经整顿，暂编为一个大队，队长朱玉湘、教导员纪华，整编后仍坚持在滕峄边一带活动。五月上旬一举歼灭蓄意搞磨擦的土顽司令马卫民部三百余人。其间也多次到邹坞附近袭击临枣铁路和公路上的日军运输部队。五月底，根据“特委”指示，沛、滕、峄三县抗日武装会师，组成

"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原峄县武装编为第三大队，队长朱玉湘、教导员纪华；滕县武装编为第二大队，队长于公，教导员渠玉柏；沛县武装编为第一大队，队长谢文秀，教导员宋学敏。至此，峄县武装无论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均与"自卫军"无缘了。

五、二 董 重 建

"自卫军"虽然解体，但董尧卿、董一博同志，还带着一部分人坚持在沙沟一带活动。为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重新组织起来，董尧卿同志根据特委指示，于三月底，到徐州找杨士元商议。杨同意用"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名义继续组军抗战。董尧卿同志返回后，重新组建了"自卫军"，董尧卿任司令，董一博做政治工作。时有一百余人。一九三八年夏，特委根据董尧卿、董一博的要求，曾派朱道南到"自卫军"中任政训处主任，李荣轩任组织部长，李克俭任民运部长，黄岱岩任宣传部长。同年六月下旬，滕县土顽申宪武，一再制造磨擦，阴谋吞没我"义勇总队"。特委为扫清抗日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土顽势力的气焰，决定讨伐申逆，"自卫军"也参加了战斗。后来，特委指示"自卫军"暂回路南，以牵制临枣路南敌人的活动。自此这支抗日武装一直在峄北滕南一带坚持与敌伪顽作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多次与日军及黄禧昌、孙茂墀等反动武装作战，并且清洗了混

进“自卫军”的匪性未改的李得胜等人。而后又转战在运河南北，薛城车站南北的津浦线两侧。一九三八年八月，“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东征后，滕峄地区形势恶化。“自卫军”中出现了徐传州营长被绑架、孙景文连长被暗杀，来泉庄八烈士遇难等事件，同时叛逃现象也时有发生。就在处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自卫军”仍坚持与敌伪顽作战达四、五十次。

六、编入孔师

原自卫军副司令孔昭同，虽有其副司令名义，但始终与杨士元并没有统一的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孔昭同在滕北顾庙村正式组军，并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以“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名义，在邹滕边区坚持对敌作战四、五十次。特别在滕北司堂、滕东羊庄、山亭等地给敌以严重的杀伤，大大振奋了抗日军民。同年秋初，孔昭同为抗日的需要，接受了早年与他结拜为盟兄的国民党第十军团军长石友三所给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暂编第六师”，孔为师长。到本年底，孔师发展到近千人。孔昭同虽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但始终与我党的关系很好。三八年九月，孔昭同得知董尧卿、董一博的“自卫军”仍在峄西一带活动，便派政工人员陈慕唐，从邹县东南的洼陡村，带着孔的文件和暂编六师的番号，经两次联系，在羊庄附近一个小庄见到了董尧卿。当时董尧卿、董一博认为：特委曾有决定，为了抗

日，用他人名义组织我们的武装是允许的，孔受委于国民党，坚持抗战是符合特委指示精神的。况且孔原来是“自卫军”副司令，今又派员专程前来联络，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同时认为双方处境都有一时的难处，两部统一是有利的。后经“特委”同意，率部直去邹东南黄土崖，与孔师会合。经协商，董尧卿、董一博二同志组织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取消原番号，编入“六师”序列。时“六师”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刘昭汉，第二旅旅长董尧卿，第三旅旅长徐广英，后委任董一博为独立旅旅长。至此，董尧卿、董一博所组织的“自卫军”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第十军团离鲁赴冀，石友三为扩大实力，妄图将“六师”带走。但是，孔昭同长期在共产党人董尧卿、董一博的邦助和影响下，抗日思想坚定，爱国热情高涨，认为不能跟石友三走，便果断地传令所部集结南下，脱离了第十军团，到达邹县城前一带。此时，刘昭汉、徐广英脱离了该部。但孔部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仍沿用“六师”的番号。

七、再易其名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一五师挺进鲁南。九月，孔昭同派二旅旅长董尧卿和秘书长刘元甫谒见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并请求派干部整训军队。随后，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和董旅合并为八路军鲁南支队，司令员张仁

初，政委刘西元，副司令员董尧卿，政治部主任黄玉昆。一九四〇年初，应孔昭同师长的请求，暂六师编为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支队，孔任司令员。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孔昭同病逝。孔部易名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大队。孔的次子孔宪绍任大队长。

“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虽存在时间不长，且几经起落，但从组建起，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并逐步纳入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序列，在鲁南抗战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简述高熙喆的两片奏折

詹剑石

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高熙喆，为德、英帝国主义强占山东胶州湾及威海等地方之后，肆意扩大界地，屡屡侵犯中国之主权，强修铁路，杀害百姓，而新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又无视国体、民生，一味屈膝媚外，姑息养奸，于是便上折奏陈，这就是，高熙喆的曾被人注目的《为防维后患请定界限以杜效尤折》及其《附片》。〈1〉

这片奏折及附片的原文是：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高熙喆跪奏，为防维后患，固结人心，请审定疆界，饬抚臣据理直争，以杜效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人强占胶澳，初次立约，仅索潮平百里，而委员王曾俊等指引德人，将胶州、即墨、平度、高密、诸城五州县地，圈入德界，蒙混电禀，销毁前约，而胶澳以外四百里之地，遂为彼有。当时平度州知州潘民表力争不获，而英人果因之乘间而起。

查英人租界在文登之威海地方，上年冬月英人又自威海以外

圈占文登、荣城两县地，于孟庄、桥头等处，张贴告示，令界内民向彼完粮，并于东滩地方，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而该县百姓不敢忘本，仍向县署完粮，纷纷投拒，官不敢收，皆流涕以去。伏思百姓食毛践土，各有天良，愿为朝廷之赤子，耻作异域之编氓，乃不能保护之，使归彼族，此真堪恸哭者也。

闻英人与特国〈2〉构兵，何暇与我再起兵端，特恐复有汉奸如王曾俊者，指引彼族，炯喝要求，复为所蒙蔽而不觉，含糊许之，又蹈胶覆辙，则沿江沿海省分，均有租界，各国效尤，均索界外之地，又将何以应之！彼族不损一兵，不折一矢，出一言而得数百里之地，又奚惮而不为也！此次之划界，臣诚恐山东抚臣袁世凯迁就了事，图目前之苟安，忘后日之大患，中一国之狡计，启各国之衅端，实于大局所关非细。既有所闻，用敢披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又　片

“再，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又去年三月山东日照县石臼所后数里住家，被德国人击死农人一名，被伤者一名。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

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合无饬抚臣据理责问，将凶犯按律惩办，以雪百姓之冤。不然百姓积怨已深，群起而与之为难，衅端恐自此而起。且民者国之本也，使洋人自此以轰毙华民为固然，相率效尤，我又何以立国！臣为民生、国体起见，据实附片并陈伏乞圣鉴。谨奏。”

从这片奏折及附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身任监察御史的高熙喆，在要求审定疆界、维护主权、保护民生计等方面敢于秉笔直言，并且对袁世凯又予指责和揭露，其思想和举措都是难能可贵的。

为进一步了解高熙喆的这两片奏折所反映的问题，现就其历史背景和有关的几个方面，作一简略介绍：

（一）当时的社会情况及背景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腐败的清政府，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与日本签订了另一个辱国的《马关条约》。接着，帝国主义列强，便以种种名目和借口，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自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开辟商品市场，改变为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所谓租借地，在中国建立起侵略的基地；通过设银行、筑铁路、开矿山、立工厂来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借债、筑路、开矿攫取中国的主权，并更进一步来支配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权。”〈3〉尤其一八九八年，德

国借口所谓曹州教案〈4〉问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更群起效尤。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六月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约》，七月与英国又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次年的十一月，与法国又签订了《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九年的四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片领土，以南到北、从沿海至内地，几乎全被帝国主义圈占为各自的势力范围。

山东，三面环海，地形突出，“大小海口二百余处”。而胶州、威海等重要港口，一向又为帝国主义者所觊觎。一八九八年，胶州、威海两地，先后为德、英强迫租借之后，又以“屯舰”、“驻扎”、“筑路”等为口实，不断向周围许多州县扩界，并且还凶狠地多次枪杀当地百姓。“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国不成国，民亦无国，“尚复成何事体”！

当其时，尽管高熙喆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反抗力量（象当时已经在山东各地暴发起来的义和团反帝运动），然而他能面对现实，敢于披沥上陈，且能直言不讳地向得到慈禧宠信，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挑战，确实是具有一定的胆识。他的这两片奏折，作为一份历史见证，流传、抄录，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二）《胶澳租借条约》和高密县民众的反筑路斗争

甲午战争的结果，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德国便在“还辽”〈5〉问题上趁火打劫，先是要求在天津、汉口设立租借地。一八九七年又借口曹州教案，派军舰强占胶州湾。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要求清政府承认：“（1）德国租胶州湾为军港，限期九十九年；（2）德国在山东建筑铁路两条（一条是胶济路，一条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未动工）；（3）铁路附近三十里内开矿权”〈6〉。

德国占据胶州之后，便于“一八九九年六月成立所谓“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开始修筑胶济铁路，沿路勘查设标，强占民田，挖掘坟墓，拆毁房屋，横行无忌。高密县西北乡是一片洼地，五龙河、柳沟河都向北流。当地群众虽然在田里修上沟渠，在河边筑起地坝，但仍常遭水灾，漂没庄稼，淹死人畜……当德帝国主义开始在这里修筑铁路时，沿路群众曾经要求，酌修涵洞，留好河道，而德寇置之不理。不修涵洞、不留河道。于是群众愤起，拔路标，围公司，竟被德寇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打伤多人。”〔7〕这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唯恐事态扩大，不顾高密人民的死活，反向德国赔偿兵费及筑路损失三千四百余两价银才息了事。毓贤为此去职，袁世凯继任了山东

巡抚，袁明白毓贤去职的原因，故而一到任便挥起屠刀指向山东民众。一九〇〇年二月，德国侵略者在高密南流地方，又“击毙华民二人，伤一人”的事件，就是在袁世凯派兵“弹压”下造成的。

在袁世凯的袒庇、纵容下，德国人不仅在高密县境横行无忌；平度、诸城、日照等州县的百姓，也同样遭此劫难。

但是，人民是不甘受屈辱的。这年初，以李金榜、孙文为首，并有当地义和团首领李惠芝等参加的，所谓“高密县民持械阻工”的斗争，就是一次反帝、反压迫的农民运动。

（三）威海卫专约的主要内容及文登百姓“不服界务”

一向“贪如狼，狠似贼”的英帝国主义，在德、俄强租胶澳、旅顺之后，又乘机而起。一八九八年七月，由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在这个专条里，“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限期为二十五年）。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又议定，现在威海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租地之武备有所妨

碍。”“又议定，在以上所提地方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应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须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8〕

即使“专条”中规定，所租之地只限刘公岛及其周围的群岛和沿岸十英里以内的地方，也承认中国驻扎威海城内的官员，有各司其事的权力还有在划定的地方之内，若“官工须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等。但是，在清政府昏愦、腐败，卖国求安的政治局面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体、民生和“抗争”。而贪婪成性的英帝国主义更无视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主权，只是尽其所欲地向文登、荣城等内地强圈、强占。文登百姓为阻止“英人自行履勘”界地，几次聚众抗争，但“英员竟置之不理”。为此事，光绪也下过旨谕，要军机大臣及袁世凯等，“迅速与窦纳乐剴切申论”，“暂缓勘办”，“是为至要”。〔9〕而袁世凯对此却阳奉阴违。这期间，特别使高熙喆深受感动的，是文登百姓宁作“朝廷之赤子”，不作“异域之编氓”的民族精神，和纷纷抗拒向英人“完粮”的爱国行动。

（四）袁世凯对胶澳、威海问题的态度及其他

被人称为屠户的袁世凯，是一个彻头彻尾、崇洋媚外的卖国

派。他来山东前的几任巡抚，李秉衡为曹州教案革职，张汝梅因民教不和及用人不当降级，毓贤又因高密县的筑路等问题撤换。袁之所以当上山东巡抚，除慈禧的尝识和荣禄的推荐外，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赞同。当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时，驻天津的美国领事拉格德里便给美国副国务卿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到："山东巡抚毓贤的撤职，是我们使馆要求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从他一般的名望来看，外国是希望能给予很好地帮助的。"〔10〕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毓贤被撤换，袁世凯来山东，是帝国主义直接插了手的。

袁世凯到山东，同时也带来了他私人的、七千多人的"武卫右军"。他清楚前任的革职、去职的原因，所以一到山东就杀气腾腾。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卜克斯的英国传教士，在肥城县境内偶而被击杀的事情。袁为了讨好英国，并在慈禧面前逞能，便故意扩大案情，大肆"捕拿"群众。结果，有两人被处死刑，一人终身监禁，其他有被关押和判徒刑的。袁世凯的除以中国人民的生命作抵偿外，还罚了出事地方居民五百两银子，为卜克斯立碑纪念，又赔偿教堂的损失九千两。因此，袁世凯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白朗等的称赞，说什么"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于卜克斯很表同情，而且热心办理善后。"〔11〕

这个一贯与人民为敌，又擅于变幻权术的袁世凯，在对付高密民众阻修铁路问题上如何呢？他一面说德人之恃强 逞 凶 是其

“惯技”。〔12〕“办理东省民教，以调和公断为治本之计，以兵力剿办为治标之计。”〔13〕一面却又调集各路军马对高密百姓残酷镇压，对德国人又保护、又慰勉。是年初（一九〇〇年），高密濠里一带的民众，又一次进行反筑路斗争，结果，被袁世凯派兵以“当场拿获六十余人，轰伤二人，夺获炮火枪刀矛多件……首要禁押、次要责枷”而被镇压下去。〔14〕不久，群众领袖孙文又遭其惨杀。

阴险狡炸的袁世凯，对威海问题，又施展了另一套办法。对上是推诿、蒙混；对英国是屈膝、迁就。这年三月，高熙喆的折片奏陈之后，光绪便旨谕军机大臣及袁世凯，要袁“详审地势，据理力争，毋得迁就了事。”〔15〕而袁世凯却另有打算，说什么，山东“匪徒惑众滋事”、“东省防营积弊甚深”借此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军队和权势，其用心叵测，由此可见。

五月，光绪又面谕军机大臣，同时电告袁世凯，说：“山东威海界务，英人自行履勘，文登百姓不服，聚众阻止。”要袁世凯“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伊戚。”〔16〕不几天，又将高熙喆的原折抄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令其“查核办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为了障人耳目，才不得不电告英员一下。

当其时，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山东已如燎原之势。一群帝国主义分子，预感末日临头，东藏西躲，惶惶不可终日。而袁世凯为了“保护”好洋人，除指令有关道台，召集各国领事研商对策之外，还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去寻找“避难”地点。袁世凯出

卖民族利益，讨好帝国主义的伎俩，得到了驻山东芝罘的英国军官卫德曼的赞尝。卫德曼在写给他的上司的一份报告中说："袁世凯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他派军队护送每一组到小河口上船的教士，并且非常周到而又仁慈地招待避难者。"还说："我们能始终留在芝罘，这应归功于本省巡抚袁世凯所持的态度，我认为他已尽了最大力量指示他统率的军队阻止外省的义和团侵入山东，并及时平定山东省内所发生的变乱。"〔17〕

显而易见，袁世凯对高密人民反筑路的斗争、对文登百姓"不服界务"的行动以及处理民教纠纷等问题，与其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不到两年，他手持屠刀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因而也换取了德英等帝国主义对他的青睐和支持。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卖国起家的李鸿章死去，袁世凯承其衣钵，又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

一时曾在朝野上下，有过一定影响，并且也包含着披肝沥胆精神的高熙喆的这两片奏折，随着清王朝统治残局的结束、袁世凯之流黄粱梦的破灭，而只好成为过去。但是，作为一份资料，它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注释：

〔1〕：这份奏折及附片，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70—7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史部分下册，页167—

168。

〔2〕：特国，即南非之特兰西瓦尼亚（通史资料原注）。

〔3〕、〔6〕：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人民版”上册，页244，页291。

〔4〕：曹州教案，又称巨野教案。1897年11月，曹州巨野县德国传教士，唆使教徒欺压百姓，激起民众的愤恨，张家庄的乡民雷协身等击杀死德国教士二人。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便以此为借口派舰队强占了胶州湾。一八九八年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5〕：所谓“还辽”问题，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除得到了台湾、澎湖等之外，还割占辽东半岛。因为这影响到俄德法三国在远东的利益，便起来干涉。结果，日本要中国再补充赔款五千万两为条件（后减到三千万两），把辽东半岛“退回”中国。俄德法据此，便自认为在“还辽”问题上“有功”。

〔7〕：见山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页75。

〔8〕：“专条”内容，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上卷第二分册，页112—113。

〔9〕、〔12〕、〔14〕、〔16〕：分别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页15、17、

18、。

〔10〕：林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页29。

〔11〕、〔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义和团史料》（下）页539，页553—555。

〔13〕、〔15〕：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下）页1961、1964等。

〔作者简介〕

詹剑石，男，58岁，滕县人，党员，大学毕业。现在山东化工厂厂史办工作（编委会副主任），前些年曾有文艺作品发表。现为济南教育学会，济南书法家协会会员。

生氏兄弟修志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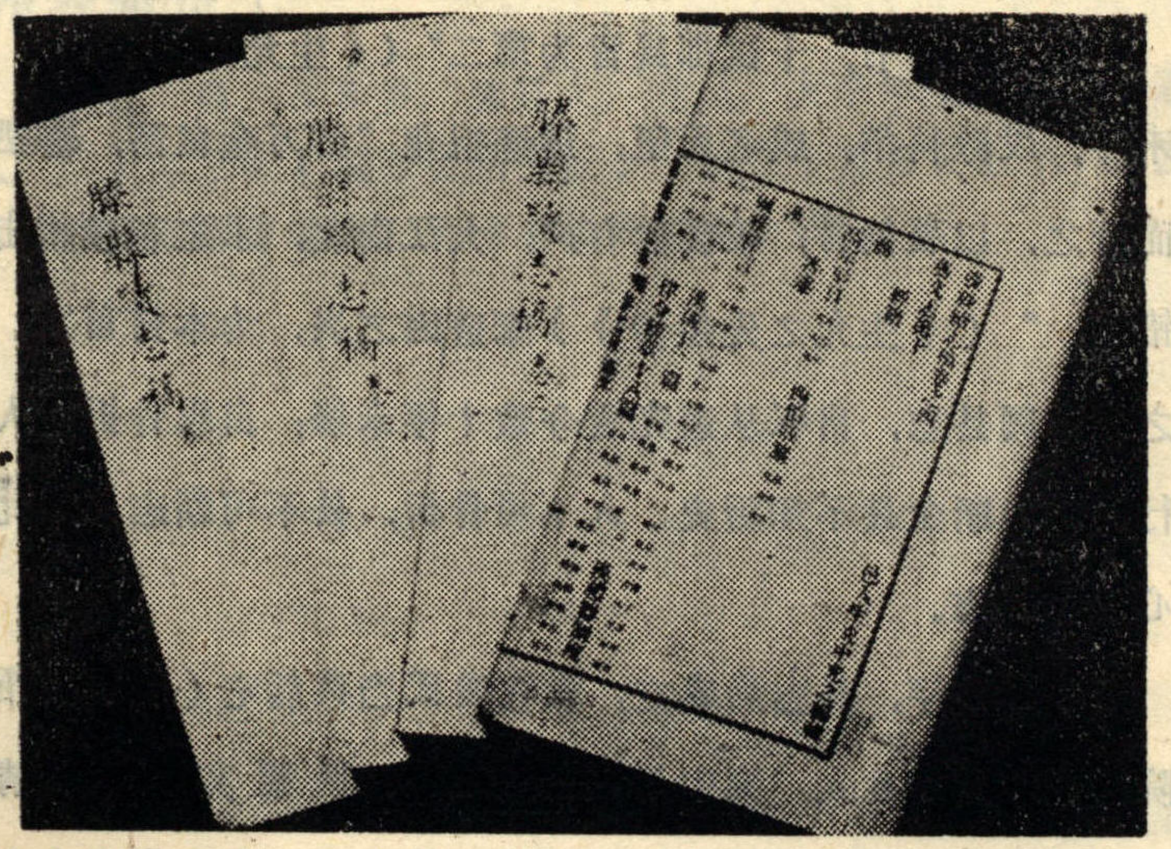
·李广星·

滕县李店生氏，以其“善接骨术”专治“跌打损伤”而闻名远近。祖创秘方传至十七世，克字辈中却出了“弃医修志”的同胞兄弟——兄为克中，字允之；弟是克昭，字介明。

克中“好读书，十试郡县皆为第二”（《生允之墓表》），光绪末年，废除科举，成名无望，遂继祖业“蓄万金良药，兼牺畜皮而膏之，以裹创骨，棱棱然有声，大江南北，求之者毂相击趾相错也。”（《生允之先生传》）家道因之兴，为本村首富。接骨之余常阅县志，自叹从道光至今数十年未修；自思骨折一人不能行动，志断全县不知历史，人不可骨折，县不可断志。因此，决心续修县志。

1926年，县志局成立，设在鲁氏当典后宅（现机关招待所院内），共18人，克中是其主要成员。夙愿实现，心情激动，遂把熬制膏药整骨治病之事交给二弟办理，自己集中全力修志。未及一年，政局动荡，战火四起，人心大乱，“局中人星散”（《滕县续志稿》）。不久，克中父亲去世。国难家忧虽集于克中一身，但其修志之志不衰。自认个人虽无补天之才，但可炼石以待。于是分门别类整理成册，以备后人续志使用。

为了写好志稿，克中“遍读通鉴二十四史旁及诸子百家文集暨史外书，虽盛夏汗流未尝露袒，如是者且三年”（《生允之墓表》）对资料查漏补缺，鉴别真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如写孟子馆于上宫，他实地考察遗址。编写志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文约事丰。每定一章，即嘱生昌琥、宋邦湖、方汉哲缮写（注：生已去世，宋在古巴，方住滕县）。历经三年艰辛，终于写成《滕县续志稿》。



滕县续志稿

克中平时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不品茶，粗衣淡食，自奉甚俭。但遇办学校、修城墙、印族谱等公益之事，则解囊相助。今志稿写出，如何印刷，仍是难题。政局不稳，县长无暇及此，克中便从地窖搬出瓷罐，倒出银圆，装进钱褡，拿起志稿，

来到印书馆。1930年，四卷《滕县续志稿》铅印出版（此书台湾成文出版社于1968年3月再版，每部新台币360元。前年，省社科院等单位设法购入此书）。

1933年，县志局重新成立，县长召集社、区、乡长开会，选清末翰林高熙喆续修县志，熙喆、克中分任总纂、分纂。生克中如愿以偿非常高兴，高翰林亦为得一良助深感欣慰，他在《生允之先生传》中写到："助余修县志……余时时以暮年得良友啧啧齿牙间。"经近二载努力，《续滕县志》前四卷定稿，手稿藏于县署。

1934年，农历六月初三，克中如常早起，用过早餐，与杨知性到县志局，缮写县志。是日，炎蒸如蒸，烈日当空，若张赤盖，克中汗如雨下，胸闷头胀，手中毛笔似有千斤，坚持写到中午。回家即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家中人、高熙喆等以为中暑，"以凉剂激之"（《生允之先生传》），医治无效，午夜，痰壅喀喀不吐，遂卒，寿六十一矣（其夫人李长修，现年八十一岁，被县政府送住城关镇敬老院，安度晚年）。

生克昭是克中三弟，自幼受兄影响较深，不以秘方治病为重，"性好书乘铁辎"（《生氏藏书记》）；年长助兄修县志，二人志同道合，都以修志为己任。克中死于修志，克昭要继承兄志，完成未竟之业。

1938年，日军侵占滕县，到处烧杀抢掠。克昭冒险赶回县城，寻找续志下落，"搜求久之不可得"。是毁于战火，还是

落入他人之手？克昭心急如焚。“一日，张金元、吴象揆二君来告之曰：‘书固在，今藏张君守彬家也。’”原来“张君守彬受谢县长锡文之命，奔藏无数，一邑文献赖以不坠”（以上三条引文均见《续滕县志》）。克昭闻讯大喜，急与杨知性抄录成副本，准备刻印。

克昭渊雅好古，观续志无金石一门，立志补齐。他“南至吴越，北走京师，数下里市”（《生氏藏书记》），往来数年，搜得“出土周金文四十事，汉印五钮暨汉晋唐宋画像碑碣拓本二十六通”（《续滕县志》），详加考核，作为卷五，附刊编末。

为保质量，克昭来往于京津之间，聘请专家学者审稿。先聘“邃于经史以治小学称于时”的张少元教授校阅通纪，又请天津王纶阁、东莞容希白、胶西柯燕船等“嗜古多识”之士为金石志“审慎抉择，别类编次，”再求翰林的高足陈墨香校对志稿，最后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为之题耑。

抗日战争期间，无人顾及修志，克昭决定自费刻印。先取“田五十亩，鬻钱得今币五千二百圆(注：１９４４年的货币)，以充剞劂之用。……不幸世乱日滋，物力逾绌曩者鬻田之资用犹不足，昭复废斥祖产，裒集十万余圆(注：１９４４年的货币”（《续滕县志》）。１９４１年秋，克昭请百余人，刻于北京法源寺。他亲刻金石志，未完，搬到西南园后，又请一人协助，按字付酬。于１９４４年秋全部刻完，由中华书局的詈瑞亨

印刷出版。《续滕县志》从编写到成书，历时１２年，共印６０部。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克中、克昭却知难而上：弃医修志，尽毕生精力；捐献家产，成两部志稿；存滕县文化，接古滕历史。精神可嘉，事迹感人，功在汗青，为此记之。

〔作者简介〕

李广星，男，３３岁，大学毕业。现任滕县史志地名办公室付主任。曾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王安石两次罢相说明了什么》等论文。



柳琴戏在滕县的发展

宋琦　董广元

柳琴戏，原名“拉魂腔”或称“拉后腔”，亦称“肘鼓子”。是一个带有地方色彩的较为古老的剧种。它是以滕县、枣庄、徐州和贾汪矿区为中心，流行于徐州、济宁、长安、临沂、新沂、菏泽、聊城、淄博的部分地区以及安徽的淮南市、河南商丘等地。柳琴戏具有鲜明的地方艺术特色，深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与欢迎的一种地方戏。由于人民的抚育，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使这朵鲜花开得格外清香、艳丽、沁人肺腑。

一、剧种的起源及发展

滕县柳琴戏早期流行于鲁中南一带。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柳叶形状的土琵琶，故称之为柳琴戏。其实它和苏北的淮海戏，安徽的泗洲戏，是同一剧种的不同流派。不论从其剧目、音乐唱腔和艺人的流动上来看，他们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只是受当地方言、风俗人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变的。

柳琴戏在滕县流传约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据老艺人王兆兴、孙广云、张子斌等人回忆说：“解放前滕县拉魂腔领班的著名艺人卜端品，拜袁玉美为师，袁拜高二为师。据此推算，约在清道光年间。

（一）柳琴戏初期的说唱形式

柳琴戏的最初阶段，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又是怎样成长的？据老艺人的回忆和引证，柳琴戏是从说唱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戏。至今还流传一些“篇子”和“小段子”，这就是柳琴戏的基础。例如：

1、在一些剧目中，还保有说唱形式的痕迹，如：生和旦唱的“溜口”、“接唱”则采用第三人称，如生唱上句：“不说小姐回楼去”，旦接唱下句：“再说公子张万郎。”再如唱生的出场先念几句引子，“计谋高超诸葛亮，五虎上将数马超”。而后念道：“众位明公纳福蹲坐，听我慢慢唱来。”

2、解放前，艺人们以说唱代替乞讨，三三两两结伙说唱在农村。农忙时，耕种田地，收割庄稼；农闲时，自动相聚，结合成伙，走街串乡“唱门子”。其形式既无音乐伴奏，亦无服装行头，艺人们用竹板或柳木梆子掌握节拍。所唱的内容多是一些“庄稼话”，或“乞讨话”，如“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吃饭我来到”。“掌柜的，大发财，金子银子一齐来”等等。由于这种形式颇受群众欢迎，艺人们就在原来唱腔的基础上丰富和改进，后来便产生了自制的土琵琶（即柳叶琴）并自弹自唱，或一弹一唱，或艺人一家的父兄丈夫伴奏，妻子儿女说唱。另外还有三、两个异姓的艺人自动结成一伙沿街串乡，到处说唱，因而由于群

众要求艺术丰富多采，艺人们为满足听众的希望和要求，所以，逐步发展了“对子戏”（即七装）直到班社。

上述的说唱形式，艺人们叫做“跑坡”。

在旧社会，艺人们的生活不但十分凄苦，更受统治阶级的鄙视，胡说什么：“戏子、王八、吹鼓手，生者不准入科场，死者不准入祖茔”。

（二）拉魂腔班社的形成

1、解放前，拉魂腔在形成戏曲的初期，虽然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摧残，但它深受劳苦大众的喜爱和支持，所以，并没因此而被淘汰，相反，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护和支持下，经过艰难的历程而在发展壮大。到一九二〇年左右，开始才形成了这一剧种，创建了固定的班社。同时也有了比较简单的剧装和行头。当时滕县有卜家班（卜端品班，又名常胜班），张家班（张增法班又名常春班）。另外还有徐家班、赵家班。以后，由于艺人的流动和自愿结合，滕县只存留下了独占鳌头，家喻户晓的卜家班。

2、班社建立之后，艺人们除在农村演唱外，有时也到比较大的集镇或城市去演唱。但无固定剧场演出，仍然采取唱地摊的形式，有时为茶棚招揽茶客，有时在小土台上演唱。看客先付完茶钱之后，再由演员下台来向茶客要钱，这样逐步改变了收钱方式。

由于扩展到集镇和城市演出，观众的不同，在音乐方面也有了丰富和发展。如武场增用了锣鼓，并吸收了京戏和梆子戏的锣鼓经。女声唱腔亦吸收了洋琴、坠子等优美音调，来丰富了柳琴戏的演唱艺术。

（三）柳琴戏的唱腔特点

1、自由的旋律：柳琴戏的唱腔，起初极不固定，演员只能掌握它的风格特点，可随意转接，用各种腔调进行演唱，同一段词，演员各有其不同的唱法。即使在一个演员的保留节目中，也很难使他（她）的唱腔固定下来。

2、特殊的节奏：柳琴戏所有的板式都是有板无眼的四分之一拍的节奏。按一般的戏曲音乐规律，这种流水状的四分之一拍的节奏，应该是节奏感最鲜明的，但柳琴戏偏偏在节奏感方面最不强烈，甚至常会使听者找不到板。其原因主要是过多的用了切分音，因而形成了一连串的变节奏，旦角多如此。

3、丰富的转调：柳琴戏的板头变化作过场用的伴奏曲牌都不多，但却有丰富的转调。几乎在每段唱腔里都有转调。其转调多为转四、五度近关系调。转调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据人物的情感及演员的嗓子好坏而决定的。

4、南北路（即唱腔的流派）的不同之处。柳琴戏的语言和演唱风格习惯，分为南北两路。一般说来，南路的曲调柔和，装

饰音和花腔多，唱腔变化大，节奏复杂；而北路的唱腔则较粗犷，注重词句的清爽流利，音程跳越较大。南路女腔丰富，北路男腔丰富，各有特点。滕枣派属北路，徐州派属南路。

（四）柳琴戏的表演特点

柳琴戏是在民间说唱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它的表演具有明快、爽朗、粗犷、有力等鲜明特色。柳琴戏的老艺人多系农民出身，他们种过地，讨过饭，扛过活，受过苦，对农村生活（旧社会的）非常熟悉。因此，他们在表演上，特别是表演反映农村生活的现代剧目，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表演得也相当逼真而动人。

柳琴戏扎根在农村，进入城市比较晚，搬到舞台上更晚，因此，它受到程式化（为程式而程式的表演方法）的影响也较浅。在表演上保有更多一些乡土气息和朴实粗犷的风格。这是它的特点。但也有它不足之处，如在程式上动作的掌握和运用方面，就显得非常不够。解放后，它们虽然也向其他剧种（主要是京剧）学习一些表演程式。如王丽英同志就在尚小云举办的水袖表演培训班学习过。特别是一些武戏的表演，就更显得缺乏功力。不可否认，在一些袍带戏或宫廷戏的表演上，就显得缺少文雅，显得粗俗。但是在演现代剧目中，它有深厚的表现潜力，尤其是现代生活戏表演得特别逼真而感人。

二、柳琴戏的艺术特色

（一）柳琴戏的舞台艺术

柳琴戏的音乐伴奏，柳琴戏的音乐基本上是一种说唱形式的音乐。滕县柳琴是属于“北路”的，它与邹、滕、枣庄和徐州的一带民间的生活语言紧密地揉合在一起，听来亲切易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它的伴奏形式也非常活泼，乐队弹奏的过门，没有固定的曲牌，可长可短，灵活自如。乐队在弹奏过门时，演员只要能掌握不荒腔，不掉板，就可以任意起腔，自由咏唱，丝毫不受伴奏的限制。艺人把这种伴奏的形式，叫做“弦色音”。现在音乐术语叫“即兴伴奏”。意思就是指丝弦要跟着唱腔的变化而变化，而不约束唱腔的自由发挥。解放后，在音乐工作者和演员的共同努力下，边演出，边吸收，边改革，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定谱定腔，演员的音乐水平也逐渐提高。

（二）柳琴戏的伴奏

柳琴戏的伴奏，是以弹拨乐（柳叶琴）为主的。唱腔多从后半拍起音，女声唱下句，落尾音翻高度，听起来热烈、跳动。具有一种粗犷、豪放的感情和特殊的风味。其伴奏乐器，解放前比较简单，起初没有乐器，更没有打击乐。开始两叶板打击节奏，后

来自制了土琵琶，逐渐添置了一些打击乐，如：大锣小锣、大钹梆子等一个人掌握三、四件乐器，解放后，各剧团都有了专职的乐队。乐队包括：

①文场（也叫管弦乐）：柳叶琴、三弦、大胡、二胡、板胡、坠琴、笛子、笙、唢呐、闷子（又名大笛）多用于悲凄的场面，后来又添置洋琴、大提琴、小提琴，也有钢管、木管等。

②武场（也叫打击乐）：板鼓、堂鼓、大战鼓、云板梆子、大锣、小锣、镲锣、铙子、碰铃、大钹等。武场所使用的打击乐器，基本上与京剧相同，锣鼓经也多半是从京剧或梆子戏吸收过来加以运用的。

（三）柳琴戏的板和唱腔

柳琴戏的固定，一般说只是根据男女声唱腔不同的速度，而产生不同的“板”，这种“板”又不能仅仅单纯理解为节奏的快或慢，它包含着较为复杂的变化。

“板”艺人称之为“梆子”，是用一粗一细两段檀木棍互相敲击，而发出清脆的声音，“板”在柳琴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演员唱腔的变化，感情的抒发和控制，特别是节奏的变化，都和打梆子的人有密切的联系。所谓马前板，马后板，就是艺人指打梆子的人打得过了或不及的行语。

后来慢慢根据提高的需要增加了“司鼓”，又名“打鼓

佬”。有了打鼓佬，有的剧团就把梆子去掉了。一切听鼓和手板，“司鼓”是全场的总指挥，前后台都得听他的，除节奏外，后台晚场和前台忘词错场全用鼓来示催和提醒。如后台晚场司鼓人用鼓条点堂鼓，后台听到堂点，全场精神贯注，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柳琴戏的板，大致有下列几种：①慢板②二板（分快二板、慢二板）③数板④紧板（也叫飞板）其节奏非常快，艺人唱这种板，讲究唱得快（节奏），咬得准（咬字），听得清（吐词为最佳），⑤五字紧是数板的又一形式，唱词多半是五字韵。

柳琴戏的唱腔，可以叫出名字的大致有下列几种：

①哈腔，女演员用于亮嗓子，碰位用的。

②起板，又名听板，演员上场时用的。

③哭腔，也叫哭皮。

④含腔，表现少女害羞，欲言而又止的情态。

⑤柔腔，又名连环花腔，表现人物心头喜悦之情。

⑥射腔，表现奔放之情，高亢有力，男演员用时叫扬腔。

⑦停腔，又名行腔，留口，用于有动作的唱句，多停在上句做完动作再接唱，或者别人接下句。

⑧高腔，多用于情感高昂之处。

⑨跺句，多用于加强语气之处。

⑩调板，调节奏唱腔速度的一种唱法。

⑪闸板，又名缩板，死板，用于唱腔告一段落之处。

⑫连板起，有许多不同的唱法，如各种行当都有他们的独特唱法。

⑬撩崖子，又名起腔，嘹亮高亢。

⑭一哟调，女声花腔的一种。

⑮叶里藏花（又名海底捞月），唱起来若隐若现，意境深远。

⑯冒调花腔，悠扬婉转。

以上几种唱腔都是从民间小调中吸收来的。演员可以自由选用，由于没固定，难以记忆，便边唱边丢。是一种极为自由运用发挥的戏曲音乐。究竟如何发展，经音乐工作者和演员的努力，现正逐步地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定调不定谱，后来重点唱腔定腔定谱，一直发展到今天，全部定腔定谱，音乐性节奏快慢，感情变化，配合非常紧密。

（三）柳琴戏在群众中的影响

解放以来，随着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柳琴戏在鲁南山区和平原地区已成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精神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在滕县、枣庄、济宁及苏北、豫东一带，它拥有较雄厚的观众基础，农民在家里干活或田间劳动，哼的唱的经常听到的是拉魂腔，可见当地群众对柳琴戏的熟

悉和喜爱。

解放后，柳琴戏之所以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能由唱“地摊”的简陋演出形式发展到象今天这样已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地方剧种，这是与党及政府对柳琴戏的爱护、重视、支持和关怀分不开的。柳琴戏的成长和发展，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早在一九五一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尔后山东依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对全省的戏曲艺术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工作。滕县地区（原滕县专区）由当时负责戏改工作的宋琦同志带领全地区演员到济南参加了省举办的艺人训练班。以后专署又根据省训练班的精神，在滕县荆庄举办了艺人训练班，以及在民间职业剧团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典型试验等。这对推动戏曲艺术事业向前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五二年中央文化部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当时滕县剧改工作由文化馆负责。文化馆派宋琦、任际时二位同志具体负责。一九五八年配备了专职干部深入剧团，加强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的领导。这对提高广大演员的政治觉悟，明确戏剧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澄清丑恶的舞台形象，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戏曲艺术传统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发掘、纪录并整理一部分优秀的传统剧目和一部分优美的音乐唱腔，而且使柳琴戏的广大演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表演艺术水平都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

步。

一九五四年华东地区举行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使柳琴戏演员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他们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加强基本功的锻炼，以便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满怀政治热情，密切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积极地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

为了扩大戏曲队伍，培养新生力量，在当地党委的关怀指导下，剧团有计划地吸收了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员，随团培训。运用这种一面学习，一面实践的培养方法，也培养出一批较为出色的优秀青年演员。如：王丽英（花旦）、吴家骥（老生）、王传亮（长于小生）、赵恒城（小生兼武小生）、王传玲（青衣闺门旦）、罗莉（闺门旦）等……都为当地群众所喜爱，已初步显露了他们在表演艺术上的才华。

柳琴戏由于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因此它以崭新的姿态飞跃地向前发展，进入了她的黄金时代。演员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主动而热情地深入生活，深入农村、工矿和部队，把戏送上门，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充分发挥了戏曲的宣传鼓动作用。

三、经 营 方 式

解放后的柳琴戏，真正的结束了它过去的唱门子，溜乡、跑坡、串集镇的流浪生活。在党和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下，

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和行政改革。一九五〇年，滕县拉魂腔卜家班后改称为“四平剧社”。由原来班主制，改为社长制，社长孙广云，付社长张子斌，并组建了社委会。从此，走向剧场，登台演出，开始了售票的经营方式。即开始从售票的总收入中，除去剧场的提成之外，再提取原来班主的戏厢钱、灯油钱；剩余的部分，采取评分定级（按艺人的演技高低或主次），分发演员们的生活费。直到１９５３年时，才正式归滕县人民政府领导，命名为新建剧团。这时，即开始进入了剧场售票，演员们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工资制。

四、活动范围及代表性剧目

滕县柳琴戏一百多年来常常活动在鲁南、苏北、豫东、淮北一带地区。

其代表性剧目有《拦马》、《打乾棒》、《书观》、《思凡》、《四告》、《喝面叶》、《状元打更》、《姊妹易嫁》等。

现代戏剧目有《红色种子》、《红松林》、《红姐妹》、《红霞》等。

十年动乱之前，经常编演歌舞、曲艺等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午台、田间、厂矿等演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为中心工作服务。

五、主 要 演 员

①当地有影响的演员有：老艺人卜端品和卜玉平（已故）、宋玉春（已退休）、刘长春（现任付团长）、吴家骥（现任付团长）、王丽英、徐家伦、王兴山、王传玲等。

②老艺人卜端品演的《拦马》，《打乾棒》等剧目，说唱流利，表演精湛，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欢迎。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卜拉门的拉魂腔，卜端品腿上拴铃铛，东村唱戏西庄看，赶集串镇唱满场。

③青年女演员王传玲于一九七〇年进剧团，她在《山乡锣鼓》剧目中，出色地扮演了方老师。一九七二年被省里评为优秀演员。

④演员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孙广云，于一九五一年被选为徐州市贾汪区人代会代表。卜端品，一九五五年被选为滕县人代会代表及滕县政协委员。王丽英，一九八一年被选为枣庄市人代会代表。刘长春一九八一年被选为滕县政协常委。吴家骥被选为滕县政协委员。吴家骥、王丽英一九八三年被选为滕县人代会代表。

六、机构、人员、党团组织

一九五六年华东戏剧会演之后，该剧种定为“柳琴戏”。因

此，滕县的新建剧团定名为“柳琴剧团”。

在一九五七年之前，艺人流动性较大，人员多不固定（约八十人左右）。整风之后，国家规定剧团五十人的名额，并先后派去负责人有王凯、刘元、文伯珍、王育才、李子金、吕克茂等同志。同时逐步建立了正、付团长，团委会、艺委会、业务股、行政股（包括财会人员），下设男队、女队、职员队（包括舞美队），乐队。一九五八年后党员一名（文伯珍），至一九八二年调入和发展了四名党员。共青团员从八人发展到现在的二十人。并建立了党、团组织。历任团长的有孙广云、孔德顺、文伯珍等。

七、戏剧改革日新月异，舞台景象生机盎然

由于国务院１９５３年颁发了“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接着中央文化部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之后，省、地连续举办了艺人训练班。这对于推动戏曲艺术事业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上述两个文件的学习讨论，艺人们认真贯彻执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由于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柳琴戏的舞台上，有效地革除了低级庸俗，淫荡色情，鬼笑妖骚毒害观众的剧目。陆续编演了健康有益的历史剧和传统戏，继而兴起了大演现代戏的

热潮。

一九五六年山东举办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滕县柳琴剧团参加演出了创作剧目《宝瓮》及传统戏《王龙爬城》。这两个剧目分别获得编剧三等奖和演出二等奖。演员徐家伦获得三等奖。卜端品获得老艺人奖。同时省观摩会上录制了由卜端品、刘长春演唱的《王龙爬城》的唱片。

一九六四年，滕县柳琴剧团排演了现代戏《新风曲》（姚奇、张悟创作，宋琦作曲），当年参加了省、地现代戏会演，获得了演出奖，并在省级戏曲刊物上印刷出版。

一九七八年，滕县柳琴剧团排演了《麦花飘香》（王中、孔祥光创作）、《金凤展翅》（燕玉峰创作），两个剧目，同年参加了济宁专区调演，获得演出奖。演员吴家骥、王传亮、王丽英、王传玲获得表演奖。

一九七九年，排演了《瑞云》（张晶、姚奇、王牧天、王中创作），参加省市调演并获得剧本奖及演出奖。

一九八〇年，排演了《山村柳》（张晶创作），《风雨路上》（王中创作），参加枣庄市调演后，《风雨路上》获得创作奖和演出奖。

一九八二年，又编排了《山乡锣鼓》（张晶、孔祥光、王中创作），参加了省、市调演，获得省创作奖、导演奖、音乐奖、舞美奖。演员王传玲获得优秀演员奖，王兴山、王传亮、罗丽、赵恒成获得表演奖。

一九八二年，山东电视台为《孟姜女》、《状元打更》、《麦花飘香》录像在全省播放。

一九八四年，山东省广播电台将《新风曲》、《关不住的姑娘》、《红霞》录音播放。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经济上的日益繁荣，滕县柳琴剧团亦随着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解放前乞讨粮饭，伸手要钱，演变到由班、社、团发工资。艺人们除了齐心协力的演出之外，他们都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演员们说："忆往昔，上无片瓦遮身体，怀抱琵琶走四方，挣点粮钱养儿女，夜间睡在破庙里"。还有的说："旧时受尽人间苦，今日倍觉甜上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作者简介〕

宋琦，男，现年61岁，离休干部。高中毕业。1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一直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擅长音乐，现从事地方戏曲音乐研究工作，已被吸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山东省分会会员。1962年从事柳琴音乐唱腔研究，1964年、1984年先后对《新风曲》、《山村柳》两个小柳琴戏的音乐唱腔设计，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董庆元，男，现年52岁，初中毕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连队文化工作，1956年复员。现在文化馆行政组工作。在部队期间经常编写歌曲、曲艺开展文娱活动。

滕县汉画像石

刘继忠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的政治经济不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汉画像石就是汉代人民创造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画像石，尤以河南、山东为最多。山东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２００多石，选入《山东汉画像石选集》１１４石，１４３幅，占全书画像石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如此之多，并非偶然。它丰富的内容、高超的技艺，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滕县汉画像石产生的背景

滕县位于鲁中南丘陵的西南边缘，旁尼山系南支西侧，县北及东境，群山环绕，重峦起伏，县境之内良田万顷，土质肥沃，水源丰足，四季分明。从“北辛文化”的发现，可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发展，从称其“善国”可知道当时的人们对“滕小国”的刮目相看。时值西汉，这里的人们随“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更是积极的发展生产。从１９５９年滕县张汪乡皇殿岗冶铁遗址的发掘，出土遗物相当丰富，证明了两汉时滕县冶铁业就已出

现。西汉初年高祖封夏侯婴于此，称“滕公”；武帝元朔三年封鲁恭王之子刘顺为“公邱侯”。当时豪强、地主、富商多辐凑于此。由此可见，两汉之际滕县一直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两汉时期基本上可说，儒家思想盛行，武帝时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优秀的五经博士加官进禄。在此世境中的滕县，倍受鲁国邹人韦贤、韦玄成父子以明经而位至丞相的影响。后滕人睦弘、曹褒、寒朗均都以“好经学博通书传入仕”②，象曹褒那样“昼夜研经，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之所适”③的儒生大有人在。滕县小王庄村出土的《讲经图》，正说明了汉代儒学兴盛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西汉中叶以后，地主阶级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恶果严重，它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豪强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的势力膨胀。从而形成了“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域”④滕县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中，那些车马出行图、宴乐六博、农耕图的画面，就是当时墓陵主人所占物资财富的有力证据。是滕县汉画像石产生的物资基础。

东汉时期，汉代统治者更都是家财巨万，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谓死如生”。一般社会风气就是“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见《后汉书。光武本纪》）以厚葬来显示自己的孝行。当时的“公卿墓前皆起石室而图其生平宦迹于四壁，以告后

来”。⑤社会上妇为其夫、子为其父，竟相仿效。这种厚葬之风的盛行，促使滕县汉画像石的产生达到了鼎盛。

滕县汉画像产生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绘画雕刻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追溯我国绘画雕刻艺术发展的前身，可从我国文字起源而论。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绘画的雏形，到商周青铜器的纹饰，逐渐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器物上的画像纹和狩猎纹图案。战国以后宫殿壁画及墓室画像有所出现，到了汉代人们便创造出了一种耐久的雕刻绘画形式，即画像石。从考古发掘的滕县汉画像石看来，无论从构图布局，线条的运用，都表现出这一发展的轨迹。从出土的数量来看画像石这一种耐久的绘画形式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并热衷于喜欢用它来展示亡者生前生活的诸多方面。

二、滕县汉画像石的题材与内容

滕县汉画像石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它是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以及自然风物等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又不啻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据我国目前发现的有记年的汉画像石看来，汉画像石的流行约始于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90年左右，尽管它的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了汉代社会的广阔生活，而它产生的旨意，不能不说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为他们歌功颂德，炫耀他们的显赫地位，夸耀他们的富贵豪华。为当时的封建道德，政治主张或宗教迷信作宣传。但是，汉画像石大多数又是出于民间艺人之手，他们站在劳动者

的立场上观察反映生活，将自己的立场，观点寓于画面之中，在描写贵族地主享乐生活的同时，也表现了被奴役的人民紧张繁忙的艰辛劳动场面，抒发他们对生活的热爱理想的追求。据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看来，主要题材、内容有如下几点：

1、讲经图

滕县小王庄村出土的《讲经图》，正反映了汉代儒学兴盛的局面。画面是：经师凭几高坐宣讲，一群学生手捧简册，席地跪坐静听。从这个图示中我们知道这座墓葬中的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经学大师并占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东汉时豪门大族，掌握地方实权，垄断察举制度，许多人为了规图仕进，便投靠名门望族门下做“门生”，那些经学大师面前的听经受业者，很多就可能是“门生”一类的人物。

2、冶铁、纺织、农耕图

在汉代的冶铁、煮盐、纺织三大手工业中，滕县境内尤为发达。滕县弘道院内的《冶铁画像石》正表现了当时冶铁的“炉橐垂坊”的“吹垂”情况。左边是鼓橐吹风冶炼，其右是锤锻，锻打之物虽不清楚，但墙上挂满了长刀利剑，可见是制造兵器的作坊。滕县黄家岭村出土的《冶铁图》画像石上，更清楚地刻画了制造兵器的情形；中间一人锻打，两边二人在砺石上磨制加工，

墙上列挂制好的环首长刀，那些藏刀、勾镶、戟、弩、箭、盾牌的武库画像，可能是地主豪强兵家的军事装备。东汉时期地主聚族而居，他们把众多的依附农民按军事编制为部曲，家兵以镇压农民反抗和对付政敌。在东汉时期的大墓中发现农夫俑，有的衣着与武士俑一样，佩着环首长刀，生动地刻画出亦兵亦农的“部曲”形象，画像石中所展示的作坊所造，武库所藏，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同时也反映了两汉时武帝收盐铁为专卖垄断组织的一个缩影。

滕县龙阳店墓中出土的画像石《纺织图》，石面纵77厘米，横139厘米，画面四层：一二层楼阁、水榭、主仆，宾客盈门。左下表现出有众多的人纺织的繁忙景象，有络车，摇纬。右下角有兵库，从这一《纺织图》刻画在楼阁庭院左下角看来，说明纺织是地主庄园经济的组成部分。表现出当时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纺织女工，客观的反映出纺织女工在那楼阁主仆，宾客盈门的地主豪强之家的奴役生活及她们“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的悲哀。

滕县画像石中的《农耕图》，农夫三人耕耘，其后是一人抱一物似在撒种，一人扶犁驾一牛一马耕田，其后一人使牛拉一横长之器物，似在耕田碎土。左端有三人挑食而来，右端一大树，树下一人执杖而坐。可以看出农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情景和“田疃至喜”的得意嘴脸相对比，感人至深。这一画像石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而且形象地揭示了汉

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展示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3、战争图

滕县龙阳店出土的汉画像中的《战争图》，石面纵28厘米，横199厘米，中间断裂，内容正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北方匈奴等族进行战争的景象，双方人马奔驰，短兵相接，流矢如雨。中间一人躺地无头。右端山丘藏兵、左边殿前有跪着的武士执刀，再看中间一人上悬首级，大鼻子突现。从中可以看出这次战争，胡人战败，汉人胜利。这正说明了汉代封建统治者把对外战争的武功视为荣尚。置战功嵌刻墓门横额，夸耀他们生前的显赫战功和尊贵的地位，然而这幅图画还客观的反映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及他们发出的“乱后凡人还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的哀怨。

4、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神灵图

滕县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神灵图》这些图画正是汉代神话和迷信思想，在汉画像石中的表现，滕县大郭村出土的《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神灵图》都鲜明形象地表现出这一思想内容。神话传说和迷信都是古代人民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幼稚认识，一种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什么”西王

母”、”东王公”、“人头蛇尾”则是消极的引导人们屈于神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至于人们幻想的女娲、伏羲则是劳动人民在原始社会时认为的人类始祖，也是人们的保护神，是幻想的改造社会的巨人。而滕县城关出土的《驱魔舞图》则是汉代劳动人民朴素唯物主义的表现。那些填补画面的《羽人图》、有的人面兽身、乘龙骑鹿、驾云车、龙车、鹿车遨游太空，是升天成仙的幻想，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受“淮南得道，鸡犬升天”一说影响之深。

5、车马出行、宴乐、六博图

滕县汉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宴乐、六博图》，是汉代统治者酗酒赌博剥削寄生生活的真实写照。骑马田猎在官宦子弟中相习成风，他们游手好闲“连年骑猎田猎出入，毕弋捷捷”，吃饭有酒樽，羽觞、肥鸭、烧鱼和烤熟的肉串、摆满酒席、酒席之中还伴有乐舞表演，炫耀他们“钟鸣鼎食”之家的生活。此外，还有奴婢端灯、执壶，捧杯、提卮、端奁、抱盒、执盾、操檠戟、持斧钺、持金吾。还有执笏、拥彗的门吏。从这些图画中可以透露出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荒淫无度。

6、百戏、舞乐图

滕县汉画像石中的《百戏、舞乐图》正反映了汉代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当时除有宫廷、庙宇的

雅乐之外，大量是民间散乐，称之“百戏”。有的演奏于高堂，有的表演于街巷，还有的伴随出车马行，列演于旅途，到处可见精彩的演奏、绝妙的技艺。滕县马王村出土的《舞乐图》最为突出，竖于乐队中央，两名鼓手尽情地跳跃击鼓，指挥乐舞节奏，即谓“聂节鼓陈，舒意自广”舞姿丰富多彩。另外还有滕县龙阳店出土的画像石，上层中间二人舞，两侧有倒立，飞剑，跳丸，摇鼗鼓舞蹈诸戏。再如：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中，又有二人叠案倒立耍剑弄丸，相扑摔跤，还伴有乐器，故事内容寓在其中。从这些图画中明显的表现出汉时戏曲已有雏形及人们对于杂技、舞乐已有较高的演奏和欣赏水平。

滕县汉画像石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遗产，而且在自然风物，迎宾问礼，历史故事，星辰等方面也有所表现。有的画面把汉时自然景物、建筑模式、刻画的形象逼真，活龙活现。滕县马王墓中出土的《迎宾图》《门阙楼阁图》，正反映了汉代迎宾之风和汉代建筑型式的这一主题。滕县西户口墓中出土的《孔子问礼老子图》和滕县城关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表现了孔子与老子的一个见面场景而《周公辅成王图》则将周公忠实于成王的真实情况刻在其中，表现出当时忠君思想的内容。另外，还有滕县马王村出土的《凤凰星辰图》、凤凰与星辰在汉代象征着幸福和光明。同时这个图画也表现出“天人感应思想”，为天文学家考查古代天文系的星系座标，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三、滕县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

滕县汉画像石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平面图画。先画后刻，具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故事情节、它是绘画的一种耐久形式。它的题材及作法、是继承了战国器物上画像纹和狩猎纹图案的风格，又与战国以后的宫殿壁画及墓室画像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滕县汉画像石不论从它的内容安排、布局结构，绘画雕刻的技巧运用等方面，都表现出它的不朽艺术魅力。

（一）写实手法的运用

从滕县汉画像石的题材与内容之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的能工巧匠，以古典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展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这种写实手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绘画发展的又一新起点。滕县汉画像石虽然以古典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为基础，但并没有停留在写实的基础上，在表现人物、动物形象上，能做到主次分明，形象生动逼真。虽不重视人物，动物的细部表情，而是在轮廓上追求生动、奔放、豪迈的形式，他在刻画每一个人物和动物的形象时，既富有想象力，又大胆地予以塑造。如滕县城关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整个画面有

众多的人物，如何表现周公对君主的赤诚，看来作者是挖空了一番心思的，让“周公”立于众臣之前，以显示出周公的尊严和高位，将成王置于垂幛之下、台座之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看出周公这个人物，面对成王年幼，不是篡夺权位，而是在臣下面前，表现出他忠于成王的赤诚之心。体现出艺人们的匠心所在。

再如另一《战争图》中双方人马奔驰，短兵相接，流矢如雨。中间一人上悬首级，大鼻子突现，滴滴鲜血落地。从一这图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汉代对匈奴频繁用兵的情景。在表现手法上，整个画面显得奔放，豪迈，线条健劲有力，造型生动逼真。艺人们为了表明这次战争汉人的胜利，炫耀墓陵主人的战功卓著，利用了匈奴人鼻子大的象征，去点破这一主题，真是奇妙无比。在《乐舞、百戏图》中，把舞伎的细腰刻成有如束素，使舞者在画面上显得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在出土的《驱魔舞图》中艺术家往往用夸张的手法表现野兽的凶猛，把史书记载的方相氏这个披着熊皮的驱魔武士，画在群兽之中，下层的行人骑马稳步行走，毫无惧色，表现出邪不压正的无畏气概，迄今仍浮现在画面之上。在表现动物形象方面，更是千姿百态，生气勃勃。艺人们以写实为基础，虽然没有较强的透视感，但由于线条运用的成熟、雕刻的精美，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虎的凶猛、鹿的飞奔，所雕各种动物形神兼备，画面动静相成，互相呼应，显示了汉代民间艺人和匠师们丰富的生活实践和高超的艺术造诣。

（二）有变化、有统一的分层创作和空白填充

滕县汉画像石在构图方面，是既有变化，又有统一。虽然有的几块连成一个整体，或有的一块分成几层，有的一块分成多达八层，每层都表现出一个小的内容，但都无损于作品的主题完整和明确性。如滕县后台村出土的画像石，凸面线刻，石面纵７９厘米，横８１厘米，画面六层。一层主人凭几坐，列侍者与左右；二层六博。三至五层，二人击鼓，顶上一人舞，左右人物，倒立、纺织。六层车马出行。从这一画像石中，我们明确的可以看到这位墓主人生前显赫的尊位和霸占的物资财富。一层表现一个内容。第一层、第六层，表现墓陵主人占有较多的侍人、动有侍人侍候，出入有大量的车马，三层至五层，则完全是为炫耀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和占有的纺织工业。从这个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在创作上的高度组织才能，能在较小的石面面积上，表现较丰富的内容。

（三）滕县汉画像石所采用的雕刻制作形式

总的来说，滕县汉画像石的创作技法，它不象帛画和壁画那样，通过细致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它是通过线条的刻画展示人物的地位、动作、姿态。滕县汉画像石的

制作：既不同于山东孝堂山的凹面阴刻，还有别于山东武氏祠，沂南画像石基和河南密县的减地阴线刻。一般的说，滕县汉画像石早期的作品以阴线刻为多，加以锥刺纹。有的画面部分采用减地的手法，多不分层，画面疏朗。并为突出人物或景物的形象，在图像轮廓的外缘刻有较粗深的阴线，画面很少有透视感，图案性较强。如滕县马王墓中出土的《双阙图》不光具有早期汉画像石的特点，而且还可以看出在比例的运用上失调。滕县汉画像石中期开始有浅浮雕和弧面浮雕，在浮起的画像上刻以阴线构成人物或景物形象的细部，构图基本采用写实的手法，但略予夸张，画面的内容多表现当时地主阶级的奢侈生活和封建迷信思想。还可以看出中期的汉画像石在汉画像石的空白地方多刻画点缀园点，鸟头、瑞云等物，增强了人物或动物的动态感。晚期的画像石出现了高浮雕和透雕等制作形式。这一时期的画像石在制作上继承了前期的传统技法。不过有的过分追求对称和图案化，造型呆板，不如前期富有生气。如《孔子问礼老子图》线条的运用不够准确、多象儿童画、显得非常古朴。但这并不代表滕县汉画像石民间画工艺人绘画雕刻技能的深厚功力，无损于对以后版画产生的深远影响。

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数量居全国县级之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广阔画面。雕刻技法灵活多样、人物、动物、景物刻画的形象逼真。在我国的汉画像石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对我国的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起着巨大的作用。

注释：（1）引《十三洲志》语

（2）《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儒业》

（3）《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儒业》

（4）《后汉书、仲长统传》

（5）叶昌炽：《石语》

〔作者简介〕

刘继忠，男，28岁，电大学生，山东社会学青年协会会员，现从事地方志的编写工作。由于潜心于收集整理“滕县民俗”，被山东大学聘为风俗调查员。



汉画石片拓大郭村出土

华北弘道院

龙厚昙

一、创办至1937年

华北弘道院创于1913年，初名新民学校，是美国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乃兄狄考文而设立的。校址座落在滕县北关外，开初占地八十余亩，后来又一再扩充，与赫士创办的华北神学院一起总计校基约300亩。有礼拜堂、钟楼、藏书楼、课室、女神学院、备课楼、男女学员宿舍和作为教职员住宅的六座西式楼房，以及其它附属建筑，共有房舍二十多栋，约三百余间。在七十多年前的滕县县城也曾蔚为壮观。主要大楼上嵌有“民国三年狄氏遗爱”和“××捐款”字样，以为狄考文和其他美国人歌功颂德。

滕县新民学校的开创委办为美国人“赫士和罗密阁(H·G·ROmWg,)美北长老会牧师，1901年12月来华。在建校施工中，罗密阁曾抓土撒到建筑工人锅里，邓天锡老师的外祖父是参与创办的中国教会人士，因此事愤然与罗决裂退出差会”。校董会由六人组成，三中三西。第一任校长为基督教中国牧师刘廉卿(思义)，这是当时英美基督教所办学校的第一位中国校长，不少外国人曾为此大肆吹嘘。其实，乃因辛亥革命刚爆发不久，我

国朝野人士（特别是教育界）关于“收回教育主权”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呼声甚高，让中国人任校长，实在是掌握实权的美国传教士们以退为进掩人耳目的策略，而且他们选任的校长正是基督教会学校培养的“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统治地位”（《在华传教士１８９０年大会报告书》４５９页）的人。按，刘思义登州文会馆毕业，是狄考文的学生，曾任自立会牧师，青州神道学堂教习，青岛明德书院院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代表，还作过冯玉祥第二方面军的随军牧师。他是“山东自立会”的发起人之一，该会成立时，他曾明确表示：“本会虽为自立，然与西人毫无冲突，彼此分工合作，感情融洽。”委派这样的人为纪念狄考文而设立的学校校长在美国人看来当然是很理想的了。

按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七八十年间，西方传教士兴办教育，第一阶段多是先办：“义塾”（收买一些破产者，流氓、乞丐加以培养使之成为亲外、媚外的洋奴），第二阶段又办书院（书院的课程以道学为主，英文、数学次之，国文、史地则更次之）。废科举以后，基督教教育已走上第三阶段。由培植传教士的教育，进而成为培养普通人才的教育了。新民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在造就信仰纯正之传道士与教员”（刘廉卿、赫士与罗密阁在华北弘道院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看来是介乎上述第一、二阶段之间，当然也是体现了狄考文的办学思想的。该校当时设有圣经科，师范科和神预科。据民国三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一期第十二页“中国各学校校名地点学生及信徒各项调查表”记载的新民学校简况是：

校名	地点	学生名数	教会学生
新民学校	滕县	六〇	六五
愿洗学生	青年会友	查经班	查经班学生
四三	二五	六	六〇

学生多来自“基督家庭”，不交学费，在校食宿。主要课程有国文（请当地宿儒黄以元、黄以凯讲《古文观止》、苗子久讲《庄子》）、英文、圣经、代数、几何、史地(西洋史)等，开头是四年制，第一班学生二十多人，后来有所增多。

滕县新民学校—华北弘道院的经费来源，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差会寄钱，先存在北关某户的钱庄里，按时支取供学校使用，该户也借以发了财。看来偌大一个学校只靠收学杂费是难以维持的。

山东滕县华北弘道院于１９３４年6月3日下午二时半，在该院大礼堂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及狄氏纪念楼重建落成典礼（时距该楼“走电焚毁”已八年）到会校友来宾四五百人，匾联盈壁，盛况空前。大会主席为美国牧师申乐道（R＊M＊RQy 1911年来华），第一任校长刘廉卿、第二任校长(至弘道则改称院长）潘子丰，第三任校长（委员长）何赓诗（HO PKni M＊A）以及开创委办赫士、罗密阁和美国博士卜德生（Patte rSOn B。C，１８９１年来华，属美南长老会）分别发表讲

演，来宾代表致贺词。从这份资料看、截至１９３４年该院二十年之历史，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１９１３年开创至１９２５年，刘廉卿任校长时期。如前所述学校分设圣经科，师范科与神预科。任课教师先后有中国人翁楚望、陈敬吾、管西屏、孙奎阁、任宇治、吴崇三、郑达三、侯敬敏、郑长松、于子懿、李德辰、胡敬武、胡乐德、潘子丰、秦耀周、马介亭、潘右人等；外国人有何赓诗、卜德生、申乐道和何美兰（ＨＯＰＫｅｎ Ｓ，Ｈｅｉｅｎ，Ｍｌ Ｓ Ｓ，任女子部主任）。１６１５年新民学校的简况是：

校名	地名	全体学生	学道学生	青年会友
新民学校	滕县	六二	三三	五六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１９１５年第二期３２５页）

这两年，新民中学没有任何发展，而且愈往后就愈走着一条艰难的路程。

据有关统计，当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全国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有十万二千九百八十三人，到了１９１５年则发展到十六万九千七百人。但民国肇造，爱国思想大发扬，国人对基督教教育掀起了日渐激烈的批评，主要指责“太西洋化，对于国文不太注重，课文欠有系统，科目缺乏实用，教师多无相当的训练”等，后来甚至发展成为反基督教运动。

据缪秋生文章记述：中华教育改进社于民国十三年七月在南京开年会时，有余家菊等十二人提议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孙恩

之等四人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对于中华人民施行国家教育；吴士崇提议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三案。是年十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开年会时，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及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两案。

综之，反基督教运动攻击基督教教育的理由，有下列几大点：

"……

6、教士的居留地往往视为享有特殊权利与保护的租界。

……

8、由于西教士不肯把重要的地位给中国人，以致引起反对。

9、因'盎格鲁撒逊'人的专横，往往引起了中国人的怨愤。

由于当时社会的，政府的以及学校内部的种种原因，新民学校是步履维艰的。幸而校长刘思义既在教会有一定地位，又圆滑世故，竟能领导该校十多年之久。

这个时期学校尚无高级科，圣经、师范和神预科所培养的初级传道人员和教会学校师资共约二百人。

第二、1925—1932年

刘廉卿校长因传道事去职，由副校长卜德生代理之。卜德生（PattS On, ᵾ, C）系美国博士，南长老会传教士，1891年来华，其妻是医生。从他的言行看，确是一个地道的帝国主义分子，文化特务。兹举两例：一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形成了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中国师生当然欢欣鼓舞，

学生在校内放鞭炮庆贺。第二天上课，王孝善同学见了卜德生说："卜老师，我们中国怎么样？"卜德生公然侮辱说："呶，什么怎么样？你们中国已经象剁了头的鸡，扑拉不几翅膀了！"王孝善同学听了怒不可遏，当胸拷了卜德生两捶，就走了。这位美国博士立即暴跳如雷，马上召集教职员开会要开除王孝善，但中国教职员拒不参加，弄得卜灰溜溜的毫无办法。一是，卜德生是搞地质的，连弘道院基建用的石头他都左看右看不忍释手，除搞了不少的中国矿物标本，还大量蒐罗中国文物字画。卜兼弘道、神学两院的课。1935年他已七十岁，是年五月一日的神学院董事会的记录，对卜的讨论曾有"照例如无挽留，必须回国。"但"本会一致挽留，举议准定接收通过"的记载，使这个贪婪的传教士又留了下来。当他于1937年回国的时候曾带走中国标本，文物六大箱，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宋画原件！

1926年，院董事会聘中国牧师潘子丰为院长，增设高级科。同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私立学校规程》，有几条是这样规定的：

"十、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之宣传。十一、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十二、凡未经立案之学校，应于本规程颁布后依限呈请立案。"所以，《华北弘道院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志盛》一文有这样的记载："1927年教育厅着令立案，后经许多波折，一再解释，旋蒙谅解，指令既非学校，即不得沿用学校名义，乃将新民学校

改易今名。然后教育当局又复干涉，更经一度疏解，得安然至今……”

看来，学校名称由“新民学校”改为“华北弘道院”确是经过“许多波折”的。民国十八年（1929）下半年山东省教育厅即为弘道院立案事下达两次训令：

十月卅一日“训令滕县县长，据该县教育科长呈报，新民学校不遵定章立案等情，饬转饬该校于文到十日内，结束停办”。

十二月九日，“训令滕县县长及教育科长，为奉教育部令，该县私立新民学校，既系招收神科学生，与私立学校条例不合，应转饬该校迅将学校名称取消。”

这一年下学期，山东省教育厅视察滕县教育有这样的记录：

（七）私立教育

甲、何国人或团体创办何等学校？

美国人创办新民学校。

乙、学校数经费设备学生数：

有新民中学一处，经费充裕，设备完善，有学生二百六十八人。

丙、是否立案如未立案是因何故？

并未立案，前由教育科迭次询问，据云不是学校乃是神道院，教友就此讲道查经，无立案之必要。”

从学生数字等项可以证明，学校虽改为“弘道院，”名义上是“讲道查经”或说是神学预科，实际上高、初中班并未停止授课，而且有越办越兴旺之概。民国廿四年上期《华北神学志》发表的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张学恭的文章即足证明。张文的题目是：《山东滕县华北弘道院之新面目》，文字较短，全文照录如下：

“华北弘道院与华北神学院毗邻，礼拜祈祷，常在一处，对于灵性学识各方面，彼此助益不少，近两年来，气象兴隆，规模扩大，院长何赓诗、卜德生、秦耀周，规划完美，教员申乐道、孙奎阁、潘子丰、于子懿、胡敬武、郑达三、马介亭等赞助得力，聘得潘右人、胡乐德两先生系齐鲁大学毕业来院担任重要学科，内容外观，均有日新月异之概。教室大楼，瓦砾成堆者近十年，现已修完整，焕然一新。学员增至一百九十五名，皆努力课业，尤注重灵修，校具校址设备亦极完美，近南北长老会差会及学校当局为帮助教会贫苦子弟及栽培教会领袖起见，愿提高加长二三年之课程，以资深造，请热心同道，多为代祷，阿们。”

第三、１９３２年，潘子丰院长休假，由本院职员推举美国牧师何赓诗为委员长。按，何赓诗（ＨＯＰkin，Ｍ，Ａ）系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１９１７年来华，是以圣经反共的专家，著有《旧约圣经神学》和《启示录讲义》等，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特别写了一本叫《耶稣基督的启示》，利用圣经《启示录》中的一些故事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骂共产党是“兽”，甚至公然指名辱骂列宁、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由何赓诗代表在美国的“顾问委员会”（相当于董事会）重返中国恢复华北神学院。因何赓诗敌视中国的解放战争，他把华北神学院由滕县迁至徐州，又由徐州迁无锡。无锡临解放前，何赓诗曾打算继续南迁福建再逃亡台湾，因受到爱国师生的抵制而未能得逞。

何赓诗上任伊始，即致力于狄考文纪念楼之重建，（该座楼房于１９２４年，“走电起火”焚毁），很显然是出于维护其前辈的“荣誉”。当年拨得南长老会江北大学基金两万余元，动工修复。地处江苏的南长老会为什么那样慷慨把筹办“江北大学”的款子拨给华北弘道院呢？原来，“南长老会江北差会，向来均送学生到各都邑读书，但学生回来，多习于奢华，南长老会素知北方崇尚俭朴，及本院开办，乃先遣学生来此试读，藉以考察。至１９１７年南北两会即实行合组。今则南长老会江北区会之人才，大都倾向本院，其子女亦多愿来此深受造就。院址扼津浦之要冲，仰信握纯粹之中心。本院前途，将来不免长足进展也。”（民国二十三年下期《华北神学志》第６８页）

何赓诗任华北弘道院院长期间，（１９３２—１９４０），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侵略我国的时候，中国师生同仇敌忾，非常关心时事。但美国牧师不让学生参与政治，一遇有国耻等政治事件，敏感的学生爱国热情澎湃，个个磨拳擦掌，一旦受到压抑，总是感到极端郁闷，甚至愤然罢课。据弘道老校友黄伯华工程师回忆，当北方学生南下请愿路过滕县时，他们冲出校

门到火车站表示声援；有时，美国牧师不让出门，他们就在校内游行。院长何赓诗等帝国主义分子是压抑不了中国师生火一样的爱国热忱的！

华北弘道院自１９２６年增设高级科以来即有一项规定：高中学生必须愿洗入教成为正式基督徒。美国传教士何赓诗任院长就更加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借以控制年龄较大学生的思想。但有的学生仍是千方百计地阅读进步书籍，探讨中国出路，毕业后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王成林早期参加革命，后来在“肃托”中死去。有的为保卫祖国光荣捐躯，如吴运清，抗战初期投笔从戎，参加空军，１９３９年在云南驿机场一次空战中，驾起教练机英勇迎击敌人，壮烈牺牲。当日本侵略军于１９３８年春攻打滕县时，弘道院师生掩护川军伤兵多人；并于是年麦子成熟季节配合共产党派来的人员于公炸毁北河大铁桥；介绍我地下人员高某到滕西“开银楼”掩护工作；又把川军丢掉的十几支枪转交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等等，充分说明在外国人掌权的教会学校里并不能泯灭中国师生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精神。

二、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日军侵占滕县时期

１９３８年三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滕县，川军１２２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英勇抵抗，不幸失守，官兵几全部殉城。当时弘道院因悬有美国国旗，房顶上又有用红瓦摆成的大“十”字，未遭破坏，战争激烈进行中，中国军队伤兵有邱、王、李、宗等姓

氏的八人爬过铁丝网（弘道院垣墙）得到了师生们的治疗和保护，一个姓李的还被送到华北神学读书，其后几年才被资助回四川原籍。

在日本侵略军的势力范围内华北弘道院进入了另一历史阶段。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尚未触及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英美传教士当然是随着他们国家立场行事，基本态度是袖手旁观，必要时搞一点“慈善为怀”，如何赓诗就曾经打着美国的旗子与张兆玉大夫一起到华北医院取药替中国伤兵包扎。

日本侵略军占领滕县之后的１９３８年秋季，华北弘道院继续正常开办。当时该校有初中三个班，高中三个班，楼下还有一个小学班(小学班学生都是教职工子女)，另有一个“中级班”培养初级传道人员，约学员二十余人。高初中班的课程设国文、数学、英文、日语、理化、重力、植矿物、史地、音乐、道学(圣经)等，其中英文、理化和音乐按学生程度各设专科教室供学生选修。日本侵略者当局派了日籍“牧师”佐治、大森、田头等来弘道、神学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还派教官关德昌来“训导”学生，实际上是监督师生行动，钳制学生思想。一次，师生集会做礼拜，关德昌在后面打学生的耳光很响，惊扰得大家齐向后看，关德昌说是因为一个男学生做祷告不闭眼睛偷看女生。就是这个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连女生他也施以残酷的体罚。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教官兼教日语的关德昌还和训育主任一起多方压制学生，学生罢课。以何赓诗为首的校方竟决定请日本

宪兵把学生赶出学校。中国教职员和日本牧师都不同意，经过一段僵持的局面才恢复了常态。

值得记述的是当时日本人很喜欢照弘道院楼房的像，其目的外人不大明确，但是不难揣测：他们是在为后来的事件做准备——日本牧师的特种使命。

这个时期的学校职员有：院长何赓诗，副院长秦耀周，教务主任于子懿，训育主任胡敬武(后来换了侯安邦)，总务邓天锡、李在云；教员有何碧西（美）、申乐道（美）、华以德(美)、姬庆元、朱毅敏、马介停、黄支田、海光荣、秦汉符、马宝赢、于鼎修、孙光斗等。

至于学生人数，初高中每班三十人左右，女生约占三分之一，加上中级班，全院总数约二百余人。一般学生都须交学杂费与伙食费，副食较简单，早餐咸菜，中晚餐一个菜，细粮馒头可以随便吃。只有较贫困的牧师、长老，执事的子女和专修神科（中级科）的学员由教会出钱供应膳宿。

1939年，日伪统计的“山东省公署调查教会设立各级学校状况表”中，关于华北弘道院是这样记载的：

校长姓名：何赓诗

设立之教会：美国长老会

班级数：道学科、初级圣经科、中级圣经科、高级圣经科。

所学科目：以道学为主，常识为副。

每年经常费：经费无定，多系美国信徒捐助。

教职员人数：互兼十二人（共计十二位）

学生在校数：男１２２位，女２９位，共１５１位。

毕业生：男２０位，

设备概况：教授教材、仪器、图籍略是敷用。

校舍概况：教室 大楼一座、卧室四排，教师住宅六所，普通教室一列。

已否备案：否。

表列情况似有不真实的一面，可能因为是没有备案的私立学校。学校当局把高初中学生都填报成主要学习圣经的神预科学员了。

当然这时的院长仍是后台很硬的美国牧师何赛诗，纵然与日伪、虚与委蛇，当局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对英美传教士及其所办的教会学校就采取了行动。

一天，驻滕县日本宪兵队班长大内带领日伪武装人员和狼狗等杀气腾腾地闯进两院校园，集合师生“训话”，提出不少禁令。不久，即把英美籍教士押往潍县关进了集中营，把副院长秦耀周押进驻滕日本宪兵队四十多天，追问他川军伤兵的下落，后被保释出来。学校因之停课三个多月，打乱了正常的学级学年秩序，使学生学习蒙受很大损失。后来秦耀周担起了院长职务，把校址迁到华北医院北面的平房崇道堂，对日伪当局乃称为“华北基督教学院预科”，与中国教职工一起惨淡经营，使学校得以维持到

1945年抗战胜利。

华北弘道院自1926年增设高级科以后，至“1935年6月11日举行第五届毕业典礼”（《中国基督教会年鉴》十三期183页），十年时间毕业五届，看来中间有空缺的年份。1936—1945又是十年，又有数届毕业班。前后共约十届，按每届三十多人计，共有高级科毕业生约三百多人。这些毕业生中有的升入大学深造，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有的高中毕业后即投入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工作，至今仍在医药、教育和政协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徐州、青岛、南京、上海等地为最多）至于称为“中级科”的圣经班，结业者也在十届左右，共约二百多人，他们大都是初级传道人员，属于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在华北弘道院培养的上述人员和各个时期的中国教职员中，那种认为“月亮还是美国的圆”的人只是极少数。

三、1945—1948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弘道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秋，弘道院师生和其他驻城中小学师生一起欢庆抗战胜利，迎接“国军”北上。但以“劳苦功高”自居的国民党山东保安二师申宪武部和国民党游击县政府周同残部以及摇身一变的汉奸麇集县城，敲诈勒索，局面混乱不堪，曾使师生们大失所望。当时，蒋介石调兵遣将，依靠美国积极准备打内战，美国传

教士如何赓诗等人又活跃起来，他往返与徐州、滕县之间，又是整顿校务，又是领做礼拜，散布“美国如何富强”“蒋介石如何伟大”等适应美国需要的言论。一部分接受其宣传并对国内局势认识不清的弘道、神学师生即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滕县第一次解放前后纷纷跑到徐州，使华北神学院完全停办，华北弘道院却在一百多位师生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又继续办学了。

当时的校长是于子懿，其基督教会内的职务为长老。教师有侯安邦、官耕汶（原神学教授）、李在云，孙元一等。另聘请老秀才、中学国文教师赵蓝斋教国文课。学校为私立性质，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多斤小麦为学杂费，教师月薪小麦二百斤。四六年春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至暑假后又招了新初一，计初中三年级一个班十八人，初二一个班四十五人，初一一个班约五十人，全校共有学生一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女生约三十人。学习初中的全部课程，利用旧课本选讲，外加每周两节“道学”由李在云老师摘录讲解《圣经》章句。老秀才赵蓝斋热情洋溢地给二、三年级学生讲授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读起来音韵铿锵；老校长于子懿教唱《解放区的天》情绪激昂欢快；老教师孙元一送儿子孙光天光荣地参加八路军，学生们排演《大生产》等剧到文庙前广场演出，都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革命政权的由衷拥戴。

鲁南行署教育处派了一位弘道老校友张同志驻校协助工作，这位同志在学校办公室有时友好地与老师们辩论有神无神问题，

引得学生围观。当时做敌工工作的董开夫同志（即董一博，当时名义上任滕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现任中国地方史志学会副会长）在北关教会楼上养病，就主动到弘道院兼教初三国文课，他重点讲鲁迅的《故乡》和《桂公塘》、《送胡适博士赴美》、《文学与科学》等，（后三种均系解放区编印的教材），特别是他结合《故乡》的讲授，引导学生认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对克服当时学生中的某些“正统观念”起了很好的作用。董开夫同志又用学校每月发给小麦二百斤（薪金）换成北海币领学生到设在滕县东门里路北（大汉奸龙振标宅第）的书店里全部购买了课外读物，如邢肇堂的《时事两面观》和王力的《晴天》以及《评中国之命运》等供学生阅读，让学生写题为：“给流亡徐州同学的一封信”的作文，关怀引导青少年走革命的道路。

1946年夏，内战全面展开，董开夫等同志又与教会、学校商量召开了“祈祷和平反对内战大会”，邀请党政部门同志与教会信徒，学校师生一起参加，发表演讲，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会后在县城主要街道示威游行。

1946年冬天，北关基督教会代表马宝贤牧师和弘道院学生代表龙厚昙、王修蕴携带学校自制肥皂、学生编结的袜子、手套等物品到驻扎桑村的鲁南军区政治部慰问，由政治部罗野岗主任接待。上述种种活动使华北弘道院呈现了一片革命生气。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鲁南，于2月间占领了滕县城。作为基督教会办学的弘道院仍正常上课。这一年暑假

前，原初三班共１８人毕业。暑假中，学校经过整顿，正式备案，改称为私立弘道中学，校长仍为于子懿，教务主任王诗徐，训育主任方万里，后来换上了王宝成，又聘请了教师周长伦、仇有基与盖宣三等。民社党曾派员到校想在教师中发展成员，但遭到抵制。学生共有四个班，其中初一一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计１８０人。这时的私立弘道中学有一张颇为名气的董事会名单：

“名称：滕县私立弘道中学董事会。

目的：本会以筹设本校负担经济上一切责任，并力谋其发展……。

事务所所在地：滕县北关教会西楼（滕县基督教区会办）

资金：伍亿元。

附董事会表：

董事会

姓名	张之江	贾玉铭	赵德修	海先荣	郭金南	尹任先	许学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66	68	60	39	47	57	52
籍贯	河北盐山	山东昌乐	山东临沂	江苏铜山	山东沂水	浙江	山东济宁
职业	国民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	南京北平重庆三处灵修院长	临沂区会主任牧师	徐州培正中学教员	济南青年会总干事	苏州圣光中学校长	济宁区会牧师
经历	中国国术馆长、中央执行委员	齐鲁大学毕业道学博士	齐鲁大学毕业神学士	弘道院毕业神学修业	齐鲁大学毕业	留美河南财政厅长等	华北神学毕业
住地	南京廖家巷号	南京山西路81号		徐州培正中学	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	苏州圣光中学	济宁牌楼街教会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编者注：校董会九人，因原件残缺，第八、九两位只看清地址：第八位住徐州王陵路２７号，第九位住徐州。

（济宁市档案局旧政权档案９卷２０页）

滕县基督教区会和弘道中学办学人员虽然有这样一个牌子硬，名气大的董事会，但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内战愈打愈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弘道中学经费还是大成问题，于子懿校长不得已又于１１月１１日具文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南办事处主任彭国栋："……现在教职员共十名，学生一百七十余名，分四班教授……百废待兴，需用浩繁，加以物价奇昂有增无已……请赐予补助以维教育。"该办事处批转兼县长戴九峰，"本处无案可稽，"碍难照转，希饬该校速将办理情形应报表册各造三份呈报来处再行核办。"看来这个阶段的弘道也是困难的，按当时旧政权的办事效率及其财政状况，于校长的这份呈文也只能是"只听楼梯响"了。

华北弘道院从易名立案，在艰难环境中只维持了十个月，至１９４８年5月，因我人民解放军将要再一次解放滕县，学校南迁徐州，南京后和其他流亡学校一样已不能自成体系，于１９４８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把鲁南一带私立中学编为岱南中学，迁往常州。滕县新民学校—华北弘道院—私立弘道中学自１９１３年创办以来，走完了它三十五年的曲折历程。

古薛史琐议

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知寒

薛国是位于今天山东省境内较著名的古国之一。它从夏代建国起，到秦统一六国止，存在于我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年之久。在它存在的这两千多年里，曾对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作出了十分优异的贡献。遗憾的是：人们却早把它忘记了！过去的人们忘记了它，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今后我们不应再把它忘记了。特别是历史工作者，又怎能“数典忘祖”呢。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说，我们应该把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文化，作出过贡献的古代各民族，各古国以及各个历史人物，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代历史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基于这点，我也就不揣浅陋，撰写了这样一篇粗浅的《古薛史琐议》。敬请史学界的老师们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地理环境与居民

薛国故地，在今天的枣庄市滕县、官桥、张汪和薛城区境内。薛国的地理环境，成出于战国时代的《禹贡》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

猪，东原底平。厥土赤殖坟，草木渐包。厥土惟上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从这条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薛地，确是个有山，有水，有丘陵和平原，而且是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的好地方。

有人可能要问，《禹贡》里这条资料不是说的徐州吗？对，是说的“徐州”。但是，应该知道，《禹贡》里的“徐州”就是“薛”。《后汉书·地理志·郡国二》说：“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

《禹贡》记载的薛国的地理环境，是战国时代的情景，能与夏、商、周三代的情况一样吗？我们说，相差不多。因为从三代到战国，人烟稀少，可耕的荒地很多，人们尚未有毁林开荒的要求，森林破坏不大，生态尚能保持相对的平衡。前几年，我们曾亲到薛这个地方看过，在薛地的东面，确有绵亘不断的群山，林牧业十分发达；它的西面有滔滔不绝的泗水，贯穿四个湖而南达江淮，北连济漯和黄河，舟楫交通非常方便；它的中部一片平原，有方百里的沃野，薛河横卧境内，自东向西流入微山湖，不仅便于灌溉，又利于防洪排涝，很宜于农业的发展。经过两千多年人为的大破坏，其自然环境尚且如此之好，想当年未破坏时，这里的地理环境不是更优越吗。“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１３２

页）薛这个地方的原始居民，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其发展速度，确比周围的其它地区要快。约在夏代，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

我们再概括地说说薛这个地方的原始居民。我国古代史籍，对薛地原始居民的先祖问题，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记载：第一、宗·罗泌的《路史》说："薛之先祖出自黄帝。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为任姓"。地方志书多袭用此说。第二，《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上两条史料，前者说薛之先祖是黄帝，后者说薛之先祖是帝俊。其实，这些都是司马迁所说的："其言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的事。在今天来说仍难以考定。但是，在古籍里也有一条相同的记载：它们都承认奚仲是薛的先祖，而且也都承认"奚仲居薛"。薛这个地方至今尚存有不少有关奚仲的遗址。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说："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滕县志·古迹考》说："薛城，……古奚仲所封国"。除此之外，还有奚仲墓。仲虺墓等等。在群众中仍有不少关于奚仲的传说。这些，足以证明，薛，实系奚仲居地。在奚仲居地的周围统统是东夷族的支系，难道在这些东夷族的中心地带，会有别的氏族在这里生息发展吗？按理来说是不会的。今就奚仲的邻居们的情况来看，《山海经》说奚仲是帝俊的后代倒有可能。俊、舜、甲骨文的"高祖夔"，王国维、郭沫若均认为是一个人（神），也就是鼎鼎大名的"虞

舜”。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袁珂说：“帝俊亦殷人所祀上帝”。（《山海经·海内经》注）殷，也是东夷之人。由此可知，以奚仲为首的薛族，也和他的四邻一样，同为东夷族的苗裔。近几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古薛国境内，发现了好几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我们认为，以奚仲为首的薛族，很有可能就是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人们的后代。（大汶口和龙山文化，考古学界认为是东夷文化。）

二、薛在夏、商两代的贡献

（一）发明舟、车；（二）帮助夏、商两代建国。谨概述如下：

《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说：“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郭璞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说文解字》第十四说：“车，夏后时奚仲所造”。《管子·形势解篇》说：“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说：“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以上资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奚仲父子确

为我国最早创造舟、车的人；第二，说明薛，确是我国最早的制造舟车的重要基地。制造舟、车，在古代来说是一种尖端技术。《考工记》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这即说明制造车子乃是个综合性的科技工作。这种工作没有很高的数学和力学知识，想使所造的车子达到"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奚仲父子为首的薛族人民会造舟车，说明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其它各族人民。他们发明的舟车，在古代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比近代发明的火车、轮船还要巨大。由于车子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很多生产工具的改革，有不少旋转式的器物都按车子的原理创造出来。如缫丝用的工具叫缫车，纺纱用的工具叫纺车，纺绳用的工具叫拧车，制陶器用的工具叫轮车，除外还有轧车、搅车、水车、风车等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便大大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以奚仲父子为首的薛，对古代史的贡献是多么巨大的了。

春秋时期的薛宰，说他的皇祖奚仲做过夏代的"车正"，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对薛宰的说法从没有人发生过怀疑。足见这一说法是可靠的。何谓"车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交通部长或制造舟、车的总工程师。夏后氏有奚仲做他们的"车正"，他们就能够充分利用薛族人民的舟、车之力，发展壮大自己。夏后氏之所以很快地把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展到江淮的中下游，并把各地不同文化迅速地勾通起来，建立了比较统一的夏文化，创建我国

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大王国，是以奚仲为首的薛族人民的舟、车之力分不开的。薛族人民对夏王朝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历史又怎能把他们埋没呢？

薛对商代的贡献。史载：奚仲的十二世孙仲虺，曾积极地参加了成汤的革命，並还替汤制定了一个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仲虺之诰》。《尚书》卷八说："汤归至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左传》定公元年："仲虺居薛，为汤左相"。《史记·殷本纪》"……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泰卷陶，中[illegible]作诰"。中[illegible]即仲虺。根据荆三林先生的《殷商源流考》来看，薛当时正处于商起家和建国的中心地带。以仲虺为首的薛，能积极参加"革除夏命"的活动，对于商王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确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仲虺之诰》，可以说就是商王朝的生命。遗憾的是，仲虺所作的诰，原文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古代文献，传说所整理的《仲虺之诰》，还保留在《尚书》一书里。在这份《仲虺之诰》里，还可窥见原始的《仲虺之诰》的一点影子。谨将后人所整理的《仲虺之诰》抄在下面，以供参阅。其原文如下：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聪明时。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智勇，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有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莠，若粟之秕。大小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如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奚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偪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宝天命”。

这个文件，不仅简要地指出了夏桀腐败的一生以及他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且扼要地说明了汤的优秀品德和汤成功的主要经验。同时，还恳切地劝告成汤以及汤的子孙们，应该如何立身、主政、用人，接物等等，其具体措施，都是十分正确的。汤有了仲虺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左相”，不仅使商兴旺发达起来，并使其子孙享国六百年之久。

三、薛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地位

西周时期，史籍对薛国的情况没有什么记载。但是，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了。据近年来，在薛故城一带发现的商代和春秋时期的墓葬来看，说明薛国在西周，仍然在不停地发展着。西周初期

的势力未越过今天的豫西，如周初的封国多在关中和河南一带，后来才向东方推移。当时，他们对东方各国的事，知之甚少，史籍无从记载。在西周势力逐渐控制了东方各国之后，周便把东夷族建立的众多小国，一般的都封为子爵，但对薛却很特别：封薛为侯爵和伯爵。其地位与郑国相同。

至春秋时期，史书对于薛的记载多了起来，仅见于《春秋》经、传里的资料计达四十条之多。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薛在“春秋三十六国”中，还是较著名的一个。鲁隐公十一年，“滕薛争长”。当时鲁侯虽长滕侯，但在《春秋》经、传里，凡提到薛的地方，仍称之曰“伯”，而多称滕侯为“子”。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薛在国际事务中非常活跃，光参加诸侯盟会，就有二十四次之多。这可以看到，它的地位不仅高于其它小国，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特别在文化上，更高于其它国家。春秋时代的学者曾有这样一个评论：“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左传》定公元年）说明薛国高于宋国。前几年在薛城发现的春秋时代的一套完整铜器（礼器），从它的制作型制和纹饰来看，其技艺都还高于同时代各国的青铜器。这也证明，薛国的文化确乎较周围各国先进。

到春秋晚期，薛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北方的齐、鲁，东南的吴、越，西南的楚、宋，西与西北方的晋，都已强大起来，而间于这些强国之中的薛国，从此一筹莫展。周围这些强国，都把在经济、文化上的高度发展的薛，看成是块肥

肉，馋涎三尺。公元前四百八十一年，齐国乘机将薛国占领。如《左传》所记："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即田常）执其君，置舒州"。《史记·齐太公世家》说："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史记·索隐》注曰："舒者，徐也。徐州在薛县"。这些史料都说明薛国被灭了，并改名为徐州。（《禹贡》里的徐州，就是在薛这个基础上放大的。）自此之后，薛国即由一个独立的小国变成了齐国的下邑。

四、薛地的重新兴起和灭亡

薛这个地方，自夏商以来就是古代中国东部的水、陆交通的中心地带和制造车、船的重要基地。到了春秋末年，诸侯们都看中了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四百七十三年，越王"勾践已平吴，乃以兵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史记·越世家》）这里所说的徐州就是薛。因为薛，可通过泗水，南下江淮而挞荆楚和吴越；逆流而上，可控齐鲁和燕晋。由于薛这个地方可以左右各国，薛地的政治地位、战略地位就更加高了。各国常到这里盟会。梁惠王、齐威王以及楚、曹等国也都曾占有过当时名为徐州的薛。但从《春秋》、《国策》、《史记》等书来看，薛，绝大部分时间均为齐所有。齐威王曾封他的少子田婴于薛，称为薛公，（《战国策·齐策》）"田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史记·孟尝君列传》）。

薛，这个地方，在整个战国时期很少有平静的时候。据《竹书纪年》和《史记·孟尝君传》记载："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田婴相齐，齐宣王与魏襄王会于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闻之，怒田婴。明年，楚伐败齐师于徐州"。《战国策·齐策》也有同样的记载："楚威王战于徐州"。《吕氏春秋·首时篇》说："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这条史料说明，在齐湣王时，徐州的首府薛，也曾一度为鲁国所占有。

田婴主管的薛国，一方面由于不断战争，另一方面也由于田婴的腐败和守旧，薛国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位，（田文即孟尝君）便一反其父之所为，积极利用地利、人和这两个有利条件，对薛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措施大略如下：①"礼贤下士"。采用了新的用人办法。"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士"。（《史记·孟尝君传》）这些人才，对薛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②治民以义为本。减轻剥削，"焚债券"，"以债赐诸民。民称万岁"！（《齐策·齐人有冯谖者》）民众的拥护，使薛得以岿然屹立于诸侯之间。③加强军事防御，增修了周长二十八里的薛城。教民勇于征战，故"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史记·孟尝君传》）诸侯不敢轻易犯境。经过孟尝君的改革，薛国又重新兴盛起来。齐湣王死后，"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

（《史记·孟尝君传》）当时孟尝君名震天下，不可一世。遗憾的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孟尝君死后，诸子争立，齐、魏乘机联兵灭亡了这个正在兴起的薛国。其后，又为楚国占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薛这个地方，设置了薛郡。作为独立政权的薛国，便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文后赘语

薛国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早熟而发展迟缓的国家。它早熟而发展迟缓的原因是什么呢？据我看，多半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优越，易于丰衣足食，进行文化教育有条件，所以民智开化就早。

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福里面含有祸患，好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的一面。易于丰衣足食是个好事，但是"富岁子弟多懒"，进取心差，使薛的发展就迟缓下来了。等到它的四邻把广阔荒地开垦起来，变成了泱泱大国之后，就把薛牢牢地围困在中间了。从此，薛便丧失了开疆扩土的一切可能，发展更加受到了限制，遂慢慢地落后下来。由于落后，故常常挨打。内外压榨，迫使民众，常铤而走险，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生产无法进行。到孟尝君把薛与齐联结在一块，并进行全面改革后，薛才又复兴起来了。可惜的是，仅昙花一现而已。

薛的复兴和灭亡，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孟尝君的个人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当孟尝君与士民同甘苦、共忧乐、励精图治、

进行改革之际，薛很快地振兴起来。后来，他傲慢起来了，在对内对外的事务中，变得不慎重了，故出现很多重大错误。如他在处理外交问题上，始终分辨不清敌友，故朝秦而暮楚。他既想结识秦昭王，“入秦为相”，（《齐策》）又联合韩魏攻秦伐楚。他的门客曾说：“齐秦雌雄之国也，势不能两立而为雄”。（注同上）但孟尝君始终不予理睬，而且还使齐与秦联合起来，任意宰割邻近小国，终于孤立了自己。除此之外，在外交上，据《史记·孟尝君传》）说：“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观之，乃渺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为了一点小事而动杀机，不惜破坏与赵的友好关系。这哪里还有什么政治家的风度呢！

孟尝君对内部事务，错误更加严重，最主要的是：“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史记·孟尝君传》）齐是他的父母之邦，竟因一朝之愤而毁其根本。这是不能宽恕的罪过。历史曾明确地表明：“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且也“未有弃亲即异，危其根本，而能全躯长世者”的。（王粲《为刘荆州谏袁谭书》）换句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这些道理来看，孟尝君想使其子孙长治久安，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论者常把薛的灭亡，归罪于孟尝君的不肖之子。这个说法虽

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根本原因。俗话说："无本之木，难得复荣"。纵令孟尝君的诸子都像汤武，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也可以"霸诸侯，一匡天下"的薛国，竟因孟尝君的失误，而功败垂成。真可说是万古憾事！

〔作者简介〕

张知寒，男，58岁，大学毕业，中共党员。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曾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说》、《司马光哲学思想简析》、《司马光思想的几个问题》、《司马光的用人思想》等。还著有《中国妇科识要》。曾获山东科研荣誉奖和二等奖，又被选为"教书育人"的优秀代表。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召见。

有关“临城劫车案”的报刊资料辑要

一、辑录者的话

一九二三年，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劫案，劫的是京沪特别快车，掳的是英、美、法、意、墨等国的几十名洋人。（另有几十名华人）。

为此事件，帝国列强对中国大肆攻击污蔑，扬言要出兵干涉、共管津浦铁路，并向北洋政府勒索巨款，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北洋政府被洋大人的震怒恫吓得惶惶然、纷纷然，内阁总理下令停止其他一切国务处理此案，营救洋人。为此案撤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的职，惩办了有关人员，充分暴露了军阀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无耻！

劫车者是自称“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的一支鲁南农民起义军。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即自治军第一任总司令）孙美珠，是峄县（今山东枣庄市所辖峄城区）的富户，是前清的秀才，他焚家举事，固然也是官军、土匪相逼的结果，但实质上是忧国忧民的

反军阀反压迫的革命义举。他最喜爱的诗句是，“酿成万家合欢酒，同与苍生共醉歌。”他战死后，连军阀的报纸上，也不得不说：”峄县人提起孙美珠，有为之泪下者，盖其生时曾劫掠贪官污吏，救济贫民，颇有古任侠风，故乡里尤多称颂之也”。（见1923年6月4日《晨报》）

这支队伍的政治灵魂是美珠的四叔孙桂枝，任自治军总参谋长，人称之为“老当家的”。他初则隐居山林，积极鼓励支持美珠兄弟举事。他是孙中山的热烈崇拜者，他想把这支队伍引向国民革命的轨道，发宣言，定年规，扩大力量，据险以守，等待孙中山先生的北阀，队伍失败了，他重归故里，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鲁南运河支队，(与朱道南同在一个党组织中）故而他算得上一位为农民解放不断求索的典型人物。

正因为这支农民队伍不同于一般的“土匪”“马子”，而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拥护者，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北洋政府和军阀们绝难容忍的眼中钉，非拔而除之毁而灭之不可。于是调集了重兵把自治军赶上了抱犊崮，一直围了十八个月，要把自治军困死、饿死、干死!

为了解围，第二任总司令孙美瑶（孙美珠之五弟）悍然组织了临城劫车巨案，以洋人为人质逼军阀撤兵。当中国公园门口挂着“洋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年代，在统治者事事仰洋人之鼻息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快人心的壮举。但遗憾的是劫车后孙美瑶为利禄蛊惑，违背建军初衷，违背孙桂枝的意愿，招了

安，当了军阀统治下的新编旅旅长，半年后，即被军阀设“鸿门宴”诱杀，这支轰轰烈烈战斗了四年多的农民队伍遂告覆灭。

这支农民队伍的兴起和覆灭，反映了辛亥革命在北方农民中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由于“左”倾路线和其他历史局限，在史学界、在文学作品中，都还缺乏应有的正确的反映，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这一事件从农民斗争的角度，道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表明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正义性，社会基础的雄厚，同时也表明了他的领导软弱无力，说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帝国主义者以此事件辱骂中国成了“匪世界”，中国的媚外者也称此事件为“国耻”，但就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的陈独秀的文章就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指出：“土匪掳人不分华洋，毫无媚外的心理，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说此事是国耻，我敢说只有你们这样媚外才真是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

文章还愤慨地说：“一班洋商洋律师在中国欺吓敲诈，无恶不作，现在受点小小委曲，这算是很轻的报复，重的报复还在后来……”看，旗帜何等鲜明，爱憎多么强烈！

至今，还有人说：“不管怎么讲，孙美瑶反正是个大土匪.诚然，在旧中国，在几千年的反动统治时期，除了官军，除了顺民，一切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大众，统统都被骂作“匪”，共产党不就被反动派骂了几十年的“匪”吗？在中国最

昏暗的军阀统治时期，号称孔孟礼义之邦的中国竟成了“匪世界”，其原因何在呢？《向导》周报第二十七期，春木的文章《临城案件和兵工政策》说得甚好：”……本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同是一个失业者；当兵当匪，同是为了一个饭碗问题。这个失业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中国这个失业问题是欧洲资本制度的势力所造成的。”真是一语破的！

何况自治军这支队伍，不仅仅是为了“饭碗”，更有其“国民革命”迎接北伐的堂皇目标呢！

由于舆论工具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些“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们的偏见和谎言，蒙蔽了不少国人和外人现在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以“临城劫车案”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民国第一案》已由《小说界》发表，《南京日报》全文转载，《文汇报》七月廿七日发了故事梗概，《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梗概。同名长篇小说即将出版。这就引起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和兴趣。为了帮助大家弄清历史真相，我们特辑录了部分报刊资料，以资借鉴。

二、报刊资料辑录

（一）孙美瑶兄弟举事之原因

孙美珠，字明甫，乳名大珍，因以为号。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下同）西沙棚村人、清末秀才、大地主、门第宽广、楼房甚多、骡马成群，世据良田六顷，为峄县望族。与该县齐村的晚清

（崔为本县望族系崔翰林之侄孙女）告曰：嫁否由汝，不得志今生勿相见也。孙氏兄弟当以旧产之数千元招兵买马，仿宋江之大兴梁山，据豹子谷为根据地，数日之内集聚亡命四千余人，众推美珠为大都督，美瑶与周天伦副之，此外郭其才、褚思振分任各路司令。客岁美珠战死，（此刻临枣各站尚悬其像片）众复推孙美瑶为总司令，以周副之，并改名“建国自治军”。

摘自《晨报》民国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二版《石小川不满官军与当局之报告》

注：石小川为军阀陆军少将

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孙。为告示军民等知悉：溯自近以年来，国事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则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然沓来，使农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贩，兼以贪官污吏，乾没剥削，恶董劣绅，表里为奸，真令我英雄豪杰郁郁而难平也。今天中国或为士而夤缘者，终南有径，或为军而绅者，捷足先登，或为商而多财，奇货可居。独是我同仁等，一腔热血，胸藏大略，而当轴上峰，反待之若草芥，若奴隶，人非扳茸，谁肯仰仰俯俯，俯首贴耳！故我之所以啸聚山林者，盖有以驱之耳。吾同仁奋然起义，纵横齐鲁，人强械广，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等为主义，均产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恶董劣绅，将我中国腐烂病民政策，滌刷一新，熙熙攘攘，打成一片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岂不

美哉！……（下略）

中华癸亥年

摘自：１９２３年5月２２《晨报》第二版《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影印）

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孙美瑶为通告事：吾同人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而吐气也。今军人等欺我太甚，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前数年，湖南招安，吾同仁兄弟未尝不额手相庆，色然而喜曰："天生我等以钢筋铁肋，今而后可以效忠于国家矣！名垂于竹帛矣！"不知张督敬尧一经塌台，立将吾等尽行遣散，如栗凤羽等一时豪杰，皆郁而不平，衡情而论，谁肯甘心！不但此也，迨同仁等回籍安度，又被一般人面兽心，衣冠败类，可恶绅董，反造黑白，信口告讦，诬为故匪，有家不得归，到处无立足。我非木石，能不重蹈大海为蛟螭耶！由是集合同志，占领君山保主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天地之根据地也，（下略）

摘自孙美瑶与官府谈判时发表的通告载于：

山东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１１１页。

翰林崔子湘有姻缘关系。后以父母遭当地土匪吴臭、范营屡次绑架，苦无对策，遂与其友人王翼民密商求计，王说："我们秀才既不能揭竿而起，就只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兄既已进步为谷，倒不如变卖田圆，剥掉秀才皮，入伙当土匪。"孙听了正的话，颇感痛快淋漓。并当即对王说、"与其坐以待毙，就不如铤而走险"。至此，孙便决意从匪。辞行前，王又赠孙以言：宁为跖之盗，不如惠之贤。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西守获麟，食其肉寝其皮"。

孙美珠回家与乃弟孙美瑶商量，孙美瑶也完全赞同王翼民的主张。于是他们便召集族人商定了如下落草从匪的计划……（下略）

摘自　刘子衡　《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如是我闻》载于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孙美瑶之历史：孙号明亮、美瑶其名也。年二十五岁，生于峄县之白庄。兄弟五人、孙最幼，故乡人称为孙五。其长兄名美珠，号明甫，旧为毛思忠部军官，自毛军解散后，回乡度日，当地军警目为匪党，屡扰其家，七、八顷良田，荡然破产。美珠大愤，当召集众弟，谓与其为民而为官逼，诚不如索性草以与官抗。左右产业已空，日子亦不得过。举此以征诸弟之志，二、三、四弟均各愿外出谋生，独孙时年仅弱冠，愤然愿与美珠入山。因变卖余产，得钱四、五千元，将房舍焚烧，以五百与其妻崔氏，

该匪等近曾连函驻防该地之二十旅。兹觅其第一函原文略，谓：

……国家多故，权奸当路，心怀报国，志与愿违，幸天假我崇崖之险，铁壁之崮，一夫当关，万夫难入。凡本崮四方居民，皆供我劳役，济我军需，卧榻之旁，理当抚而有之，爱之护之，如保赤子。不期第六旅之军人，勾串本地劣绅，鱼肉小民。无论穷富，任意欺凌，甚至奸淫焚掠，无恶不作。此等无赖，诚土匪之不若；适足以驱民为匪，小民何以得安？吾辈虽以放抢为本位，然就富而不仁者，打其油水，於贫苦人民秋毫无犯。贵队此临，如苟不我侵，我亦不尔为难。倘其攻我本崮，我即扰其防区。特恐枪林弹雨中，仍我小民遭殃也。……（下略）

摘自《晨报》民国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请看山东之兵祸与匪祸》

（济南特约通迅员危微）

"……吾侪皆血性汉子，不幸而膺兹时代，为时势所迫，遂入岐途。但窃钩者罪，窃国者候，我国文武各官僚，皆掳掠民财之辈！此言相责，窃为不可！至云缴械赎罪，择优录用等语，此时尚觉甚早，一俟大局稍定，国家演出真是非，吾辈自当敛亦：望祈稍安勿躁。……

摘自孙美瑶致官军出载于《晨报》民国十二年

四月廿八日第六版《请看山东之兵祸与匪祸》

（续）

（二）官兵与“匪众”之比较

至于驻防之第五旅军士，不惟不能剿匪，反而骚扰人民过土匪数倍：兹据莒县友人云：抱犊岭票匪之抢劫莒县，虽属凶狠强暴，然实较白昼轮奸抢掠之第五旅九团，尚慈善一筹！……最可令人痛恨者，即奸淫良家妇女，为土匪之自好者所不屑为，该队则坦然为之！某村之某姓女年甫十六，因病不及逃，遂被六个兵轮流强奸！哀号之声，达于户外，该女母因护其女、被毒打后，捆而置于别室。迨该兵去后，某姓女即毙命。……又该村黄姓孀妇年六十余，老而且贫，股匪过时，怜其老而贫，给以铜园十余串，迨第五军队至时，指为通匪，抄抢一空。临行时，并杂以秽言，黄孀妇忿急，报以恶声，遂被该兵用刺刀扎死，虚掩其而门去。

摘自《晨报》民国十二年四月廿八日
第六版《请看山东之兵祸与匪祸》

去年孙美珠被六旅击毙，吾闻友人谈，峄县人提起孙美珠，有为之下泪者，盖其生前曾劫掠贪官污吏，救济贫民，颇有古任

侠风。故乡里尤多称颂之也。

摘自《大公报》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三版《临匪劫车案之始末》（驻枣代表刘震洲君返济之报告）

（三）被掳洋人之实况

昨日被掳之亨来氏偕译员一人至枣庄，今日仍回山，据云，被掳之人分三处居住，待迁均好。穆安素仍患病，梅丹医生已赴山诊治，匪首尝告亨来氏“予所欲者吾人在此地之政治权耳。”氏出山时，匪给以洋二十元作零用费。昨日匪购糖果各物，给被掳者，且还其衣服。匪等连日行动甚忙，且为被掳者备驴。匪甚信赖亨来氏，并予以一所猎野味，又请其估计赃品价值。

摘自《临城劫车案纪事》第二编

《枣庄十日记》

华北明星报五月十三日特讯：昨日美人亨利氏由匪穴放回……据亨氏报告谓，在匪穴诸人均蒙土匪优待，精神上并不感何种痛苦。

摘自：《同　上》

外人此次被掳者，土匪待之尚厚，对西妇均许放回，现在寨者，只有威利亚之妇一人，因其本人欲随其夫不愿行也。当初劫之数日因官军进剿，日易数地，各被掳者，均随之步行。颇觉困顿，然匪等对肉票则未尝虐待。

摘自：《同　　上》

大陆报载：苏洛芒氏二十四日自山颠来函云，余辈在山巅又组织一小小俱乐部。兹将日行部务详述于左。五时半起身，折叠寝具搜捉蚤虱。六时向一果子罐内浴洗、六时一刻余司炊生火，炉系煤油箱制成。约经三十分钟后炉火始旺，遂煮早餐。八时许餐毕。亚伦、品格尔二人温水涤餐具。九时收拾信件，因送信人于九时三十分下山。九时三十分至十时，余煮水供洗涤用。十时至十一时，品格尔、亚伦洗衣。十一时半，余准备午餐。十二至一时进餐。一至二时待送信人回山。有时向衣服寝具内搜捉不欢迎之小朋友。二至三时阅书，三至五时写信，或与匪嬉。今晚，余与匪众雀战九副，余赢其四，得香槟焉。五时至五时半在山巅散步。六时余制餐。六时半至七时半进餐。七时半至八时司涤整理餐具。八时半燃灯，写信、唱歌、打牌。九时整理寝具，十时就寝。以上即为余等每日之起居注也。

摘自《大公报》民国十二年六月四日第三版

《匪窟西人之起居注》

（四）中共中央《向导》周报的评论

前周中外报纸所宣传的题目，就是临城事件，火车被抢，绑票许多洋人……北京外交团立刻干涉……各国公使大活动，他们要北京政府设法援救受难的洋人，惩罚负责的当局，甚至说要褫曹锟、吴佩孚的职。可怜的北京政府：

许多传说总长要到土匪巢穴去解决这问题。日本报说中国元首应亲自去说服土匪……

《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孙铎《土匪和外交团》

山东临城的匪案，吵得天翻地复；外国人说中国已成“匪世界”，中国人自己也认为“国耻”……其实，这般吃洋饭的家伙，做惯忠臣顺民，哪顾几百万颠连无告的平民流为兵匪，所以偏要故意装点文明的幌子，才说出这种无耻的话来。

摘自《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巨缘：《文明的列强　野蛮的中国？》

土匪掳人不分华洋，却毫无媚外的心理，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说此事是国耻，我敢说只有你们这样媚外真是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这班无耻下流的新闻记者，实在比土匪

还不如。

一班洋商洋律师在中国欺㈠赫敲诈，无恶不作，现在受点小小委曲，这算是很轻的报复，重的报复还在后来；他们在中国搜刮了堆积如山的金钱，使中国人穷而为匪，可怜无用的土匪们，只知道分润这一点，还算是小小的光复，全部的光复还在后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独秀：《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

……本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同是一个失业者；当兵当匪，同是为一个饭碗问题。…这个失业问题是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中国这个失业问题是欧洲资本制度的势力所造成的。

《向导周报》第二十七期

春　木：《临城案件和兵工政策》

〔作者简介〕

耿献桂，女，52岁，现为枣庄市艺术馆资料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

〔作者附言〕

此材料系在协助姚奇等同志从事小说《民国第一案》创作时查阅辑录的部分资料。以此资料为基础创作的中篇纪实体小说《民国第一案》已于1985年第四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发表。《文汇报》《新华文摘》编发了故事梗概，《传奇文学选刊》、《南京日报》进行转载。现已扩展为长篇，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后

承蒙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滕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得以如期出版。在此，特向为我们提供稿件和史料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辑首篇《落木萧萧思先君》，系孔繁霱先生长女、钱伟长校长的夫人孔祥瑛同志在百忙中为本辑提供的专稿；《爱国将领孙兰峰先生》一稿，同是白震同志为本辑专门撰写的稿件。在此一併致谢！

德高望重的董一博同志所撰《何一萍同志事略》，既是对先烈的缅怀，又是对本刊的支持，附此一併致谢！

循“求实存真”要求，本辑所选稿件，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期望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并望知情者惠予补正意见。

水平所限，疏漏讹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教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书名题字：　李剑晨

编　　辑：　王牧天　　吴子颐



（内部资料）

滕县印刷四厂印